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学友文库

民国兴衰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民国兴衰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宣统三年（1911 年），岁值辛亥。孙中山在美国各地华侨中宣传革命，他在一封信中写道：“现时各省民心切望革命军起，以救彼等脱离清朝之苛政者，已若大旱之望云霓；而十八省之新军，亦多倒戈相助……吾党无论由何省入手，一得立足之地，则各省望风归向矣。”此信发出，短短两个多月，他这高瞻远瞩的预言就在湖北实现了。

1911 年 10 月 10 日夜，湖北新军在武昌发动起义。一夜之间，革命义旗插遍黄鹤楼头，龟蛇山下。第二天，成立了湖北军政府，向清王朝宣告独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绵延 2000 余年的专制皇权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一块雄伟的里程碑。

孙中山是在美国中部科罗拉多州的旅途中，在报纸上获悉“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消息。其后，许多外国报纸认为，中国革命胜利后，共和国首任总统将由孙中山担任。其中有篇报导甚至说：“武昌革命军为奉孙逸仙命令而起者，拟建共和国体，其首任总统，当属之孙逸仙。”

孙中山对湖北新军的活动并不知情，也没有策划湖北新军起义，但起义将士把他奉为精神领袖，把他视为“革命之北辰”，“中国的华盛顿”。孙中山的崇高声誉并非偶然，而是他艰险卓绝的革命斗争和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受到全国民众普遍崇敬的结果。

孙中山（1866 年—1924 年），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名文，字德明，号日新。由于“日新”在粤语中与“逸仙”谐音，学生时代他就以逸仙为号了。1894 年，他在檀香山创立了一个救国团体“兴中会”，首次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政治口号。1905 年，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的领导人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相继到达日本。孙中山诚恳指出“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倡议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黄兴等人一致赞同，8 月 20 日，在东京成立了“同盟会”。确定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从此，革命运动在国内风起云涌。

从 1895 年起，孙中山及其领导的革命党，策划、组织、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就有 10 次之多。例如广州起义（1895 年）、惠州起义（1900 年）、萍济醴之役（1906 年）。1911 年爆发的震惊中外的黄花岗之役，离武昌起义还不到半年。孙中山领导的起义虽然十起十落，但是革命志士前仆后继，慷慨悲歌，英勇就义的英雄形象，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民众反清斗志。孙中山虽然没有直接参加武昌起义，但是人们不能不承认，辛亥革命的胜利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十多年来革命宣传鼓动和革命起义暴动所结出的丰硕果实。事实上，湖北军政府成立之后，立即以“中华民国军政府大总统孙”的名义发表布告，号召全国各地奋起响应，以共和代替帝制。仅仅一个多月，全国 24 个省就有 14 个省宣告反清独立。剩下的 10 个省革命烽火四起，清朝统治岌岌可危。

革命党人翘首盼望孙中山回国，孙中山也极想返回祖国，然而他意识到在国外展开外交活动，断绝清朝后援实乃当务之急。于是他推迟归程，前往英国，为阻止四国银行团向清朝政府提供巨额贷款进行交涉。经过孙中山的努力，英国方面表示，不再贷款给清朝政府。这一外交活动，无异釜底抽薪，给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沉重一击。

1911 年 12 月 25 日，孙中山抵达上海，受到黄兴、陈其美以及各界代表的热烈欢迎。

当时报界盛传孙中山从欧美借得大宗贷款来支助革命军。孙中山到达时，记者蜂拥而上，纷纷询问：“ 您这次带来了多少钱？ ”孙中山淡淡一笑道：“ 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 ”

孙中山回国消息传开后，全国许多团体和美洲的同盟会员，纷纷致电在南京的各省代表，吁请选举孙中山为总统。1911 年 12 月 29 日在南京的 17 省代表开会，正式选举临时大总统。一省一票，开票结果，孙中山得 16 票，当选为临时大总统。选举结果揭晓，全体代表连续三次高呼：“ 中华共和万岁！ ”

消息传出，国内外贺电雪片般飞来，“ 为日盈尺 ”。安徽、福建、南京等地，有的万人集会，有的提灯游行，全国沉浸在一片欢腾之中。

1912 年 1 月 1 日上午，孙中山离开上海，前往南京。当天下午 5 时孙中山所乘花车到达南京下关车站。这时，紫金山下欢声雷动，石头城里华灯齐放，绚丽的焰火冲天而起。当晚 11 时，孙中山在南京总统府宣誓就职。誓词说：“ 颠覆满清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短短 3 句话 81 个字，言简意赅，而第二句话中的“ 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 ”尤其令人深长思之，何以宣誓任职就许诺解职？不了解内情的人，以为这是孙中山“ 天下为公 ”的高风亮节；明白内情的人，更加掂量到斗争形势的严峻，欢庆的笑容上不免平添一片愁云。

袁世凯东山再起

武昌起义的枪声传到北京，清王朝惊恐万状。他们决定出兵讨伐，但是派什么军，遣什么将却叫他们左右为难。

当时，宣统皇帝溥仪只有 5 岁，朝政由他的父亲载沣（音 féng）掌管。载沣是光绪皇帝载湉（音 tián）的弟弟，位居监国摄政王。为了“ 皇权永固 ”，他编练了一支满人组成的禁卫军，自封为陆海军大元帅。但是这支军队既非久经训练之师，又要拱卫京都保护皇室。能够迅速调动而又具有战斗力的只有北洋军。北洋 6 镇是汉人组成的军队，用汉人打汉人，载沣实在放心不下。尤为关键的是，派谁去统帅这支军队前往镇压。

徐世昌奏道：“ 臣以为非袁世凯莫属。北洋军乃袁世凯所创，将领多为袁世凯部属。若派袁世凯督师，可收指挥若定之效。 ”他的话一出就遭到满族王公大臣的强烈反对。

袁世凯（1859 年—1916 年）字慰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早年投靠庆军将领吴长庆。1885 年李鸿章保荐他任“ 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 ”的全权代表。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回到国内。次年底被派往天津小站督练新军。1898 年戊戌变法期间，他伪装赞成维新变法，骗取了维新派以及光绪皇帝载湉的信任。光绪皇帝载湉密诏他杀死荣禄，他却向荣禄告了密。结果，维新变法失败，维新派六君子被杀，光绪皇帝被慈禧太后幽禁在瀛台。从此，袁世凯受到慈禧太后宠信，官运亨通。1905 年北洋新军六镇练成，其中除第一镇外，均为袁世凯的嫡系。北洋军阀武装政治集团至此大体形成。

1908 年 11 月 14 日，光绪皇帝载湉与慈禧太后一先一后死去。两人同一天死去，为中国近代史一桩疑案。有人说，光绪皇帝是慈禧太后临死前毒死

的，因为她不能容忍“他死在我的后头！”有人说，是袁世凯下毒害死的；还有人说，是慈禧太后与袁世凯合谋害死的。

光绪皇帝没有后嗣，即以其弟载沣的3岁儿子溥仪为嗣皇帝，载沣则以摄政王名义代行皇帝职权。

戊戌政变后，光绪皇帝把袁世凯恨得要死。囚禁瀛台期间，终日写着“袁世凯”三字，然后撕成碎片，以示碎尸万段之意。载沣是光绪皇帝的亲兄弟，现在执掌了大权，就有杀袁世凯之心，为乃兄报仇。但是袁世凯羽翼丰满，他不敢贸然动手，于是召见张之洞商谈。张之洞虽与袁世凯不和，却跪下磕头道：“太后，皇上新崩，国家遭逢大故，不宜诛戮旧臣。”

载沣不敢造次，只得发表上谕道：“袁世凯患有足疾，着即回籍养疴。”免去他的职务，打发他回老家。

袁世凯没有回原籍项城，而在河南卫辉停下来，次年迁往彰德洹上村，过起了“隐居”生活。

彰德在太行山脚下，是京汉铁路经过的地方，交通十分便利。他在城外洹上村筑有精舍，门前洹水流过。他架起一道小桥以通往来，题名为“圭塘”。他自称“洹上老人”，不时披上蓑衣，泛舟烟波之中，拍成小照，题诗一首，名为“烟蓑雨笠一渔翁”。他经常与亲朋幕僚饮酒赋诗，刻有《圭塘唱和集》，做出一副超然物外，闲云野鹤的姿态。

不管袁世凯做出什么姿态，摄政王载沣也是不信任的。现在，徐世昌上奏起用他，载沣十分反感，脸色顿时阴沉了下来。

恭亲王载伟忿忿说道：“袁世凯脑后有反骨，万万起用不得。当年好不容易把他赶下台，怎么可以又把刀把子交到他手里去呢？”

满族王公纷纷附和，否定了徐世昌的提议。载沣决定任命陆军大臣瘗昌为督军。瘗昌是满人，曾经做过北洋武备学堂的总办，跟北洋诸将既有师生之谊，又有荐举之恩。似乎唯有他才可以取代袁世凯统驭北洋军。同时决定从北洋军第二、第四、第六，三镇中各抽调一协组成混合军，以冯国璋为军统。开赴武汉前线，镇压革命军。另外，又下命海军提督萨镇冰率长江水师前去助战。

载沣任命冯国璋为军统，颇费了一番踌躇。冯国璋一再表示忠心皇室，跟宗室大臣良弼交情很深，是北洋诸将中最为可靠的将领，谁知，就在任命发表的当天，冯国璋就悄悄窜进洹上村，向袁世凯作了详尽的汇报。

袁世凯这只闲云野鹤顿时变成了凶残狡猾的鸱枭。他赠给冯国璋六字真言：“慢慢走，等着瞧。”

瘗昌在湖北孝感扎下了南征大营，原想一鼓荡平革命军，抢个头功。不料北洋军先头部队开到汉口郊区刘家庙后，借口兵力尚未集中，不肯展开攻势；后续部队走一站停一站，在京汉线上摆成一字长蛇阵，前头的军车开不动，后头的军车过不去。瘗昌空有一腔壮志，却无可奈何，毫无办法。

这时，袁世凯的老朋友英国公使朱尔典大造舆论，必须起用袁世凯才能指挥得动，否则夜长梦多，前途堪虞。庆亲王奕劻（音 kuāng）过去一直与袁世凯沆瀣一气，收受过袁世凯大量贿赂，当即出头唱和。载沣优柔寡断，懦弱无能，不敢作主，向隆裕太后请旨定夺。隆裕太后是光绪皇帝的遗孀，远远不像慈禧太后那样杀伐果断。她拿不定主意，只好召集御前会议，请满族王公公议。奕劻在会议上力排众议，极口称赞袁世凯“忠心耿耿”，“才足勘乱”。10月14日，清王室下诏起用袁世凯为湖广总督，“会同”瘗昌

节制前方军事。

圣旨到达洹上村袁府养寿堂，袁世凯听说叫他当瘾昌的副手，不禁连连冷笑。他貌似恭谨，叩谢天恩，却说：“足疾未痊，尚难启程。”载沣曾以“足疾”为由，轰他下台；此刻他便以“足疾”为由，拒绝效命了。

消息传到北京，举朝百官惊疑不定。尤其是奕劻大感意外，好不容易保奏他出山，他却端起架子不肯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奕劻只得请徐世昌到彰德去劝他出山。

徐世昌 10 月 20 日从彰德回来，气急败坏向奕劻说道：“不要再找他了，难道少了他就不成？”奕劻忙问：“怎么回事？”徐世昌忿忿说道：“袁世凯太过份了：他提出了六个条件，他说，如不依他六个条件，前方的仗没法打。与其丧师败绩，不如在家‘养疴’。”奕劻问道：“哪六个条件？”徐世昌把六个条件说了出来：一明年召开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开放党禁；四宽容武昌起事人员；五宽筹军费；六授与指挥前方军事之全权。

徐世昌这番表演，实际上是与袁世凯串通好了演出的双簧戏。他们是想借奕劻之口把条件摊到清廷面前，向清廷要权要钱。而且选择的时间极佳。就在徐世昌回京的前一天——10 月 19 日，清军在汉口前方与革命军发生接触，北洋军没放几枪就败下阵来，瘾昌指挥不灵，弹压不住，只得退守滠口；萨镇冰所率长江水师也吃了败仗，向下游撤退。”

形势清楚地摆在清廷面前：要么答应袁世凯的条件，要么眼看大局靡烂，社稷倾危。平日反袁最力的满族王公大臣气得哇哇大叫，但隆裕太后，摄政王载沣却不得不仔细权衡了。然而，形势的发展不容他们迟疑，武昌起义的影响迅速在全国扩大，湖南、陕西、江西等省纷纷宣告独立，清廷上下一片惊慌，隆裕太后、载沣只得饮鸩止渴，答应袁世凯的条件。10 月 27 日降旨将瘾昌调回，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兼钦差大臣，全权节制前方各军。

这是袁世凯借用革命力量胁迫清廷屈服让步，抬高自己身价的一次尝试。他成功了，尝到了甜头，从此，他就在清廷和革命军之间，两面其手，玩弄起一套套鬼蜮伎俩来。

边打边谈窃权窃国

袁世凯受命为钦差大臣的那一天，就决定给革命军一点颜色看看。冯国璋秉承他的旨意，向部队发布了总攻击令。10 月 28 日，北洋军沿铁路线向刘家庙反攻，经过一天激战占领刘家庙、大智门。10 月 29 日，冯国璋猛攻汉口，下令炮兵轰击市区，人烟稠密的汉口市陷于熊熊火海之中。

前方捷报频传，袁世凯踌躇满志离开了他“息隐归田”的洹上村，启程南下，于孝感萧家港扎下前线指挥所。袁世凯住下来的第二天，冯国璋就攻下了汉口。

袁世凯出山之前，早就想好一套“两面三刀”之计。他既为“督师”，前方将士不打胜仗，清廷能看重他吗？革命军能把他放在眼里吗？所以，他必须封官悬赏鼓励冯国璋等北洋将上为他卖命，给革命军一个下马威，显示他的威风，显示他的力量。另一方面，他并不想击溃革命军，消灭革命军，这叫做“养敌自重”。试想，如果不是武昌起义，他还会出山吗？如果迅速消灭了革命军，他还能在朝廷立足吗？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到时候说不定“回籍养疴”犹不可得，枉抛一条老命。上上之策，莫过于一方面利用清廷对付革命军；另一方面利用革命军对付清廷，从而火中取粟，乱中取胜。于是，打下汉口后，袁世凯下令停止进攻。

汉口之役，袁世凯捞足了政治资本。3 天之后，11 月 5 日清廷御前大会，决定任命他为内阁总理大臣。10 天之后，袁世凯组成了清政府第一届也是最后一届“责任内阁”。载沣解除了摄政王职务，退归藩邸；毓朗解除了满族军谘大臣职务，交出了禁卫军的指挥权，由徐世昌接任。民政部大臣由号称袁府“师爷”的赵秉钧升任；军部大臣由号称“北洋三杰”之一的王士珍担任。至此，清政府的军政大权大部分落到了袁世凯手里，甚至紫禁城的警卫权也落到了袁党手里。

11 月 11 日，袁世凯在英国驻汉口领事葛福的支持下，派人过江与革命军“议和”。袁世凯的代表被革命军一些将士轰走，但把袁世凯的信留下了。信上写道：朝廷已经实行“君主立宪”，何必还大动干戈。如果起义将士“悔罪投诚”，朝庭将“不究既往”。

武昌革命军首脑人物黎元洪、黄兴各写了一封回信。黎元洪劝他“倒戈反正”，推翻清廷，革命军将推举他为“汴冀大都督”。黄兴劝诱他做“新中国的华盛顿”。

袁世凯诱降不成，认为革命军还没受到足够的“教训”，又玩弄起军事手段，下令冯国璋进攻汉阳。11 月 27 日，北洋军占领汉阳。袁世凯不但没有乘胜进攻武昌，反而请英国领事出面，建议停战 3 天，再次发动“和平攻势”。

袁世凯的和平攻势，是他窃权之后进而窃国阴谋的组成部分，这是因为革命形势发展迅猛，上海、苏州、浙江相继光复，先后宣告独立，革命军在南京又开辟了一个战场。北洋军即使拿下武昌，也不能扑灭革命烈火。何况北洋军未必有这个能力。所以，袁世凯认为：“角力不如斗智。”更重要的是，他的和平姿态是向革命军表明，他并非死心塌地作清廷鹰犬。只要满足他的要求，凡事都可商量。

这一信息，首先是满族王公大臣替他“义务”发出，迅速传遍天下。他们疯狂反对议和，大肆攻击袁世凯，甚至有人主张推翻“奸细内阁”，另组“战时内阁”，继续对南用兵，把革命军斩尽杀绝。

另外，袁世凯利用汪精卫把信息传给同盟会，汪精卫于 1910 年刺杀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捕入狱，曾作绝命诗一首：“慷慨歌幽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大英雄”。1911 年 11 月 6 日，汪精卫获释，“袁府师爷”赵秉钧见他很有利用价值，把他留在北京。11 月 12 日，袁世凯从孝感前敌指挥所回到北京，召见了汪精卫，见他英俊潇洒，谈吐不俗，大为赞赏，便叫他的长子袁克定与他结拜为异姓兄弟。汪精卫出入袁府，很快了解了袁世凯的政治野心和两面手法。他用密函报告给上海同盟会。汪精卫说：袁世凯并不是清朝的“忠臣”，不可把他视为敌人，如果能够推举他为民国总统，袁氏“举手之劳”即可推翻清廷，革命大业可以“兵不刃血”而“大功告成”。

汪精卫还与袁世凯的亲信杨度组成“国事共济会”，以“同舟共济，调停南北，促进和平”为宗旨。杨度公开说：“现在南北和议，不是革命党与清朝皇帝议和，而是革命党与袁项城（袁世凯的敬称）议和。袁不想做曾国藩李鸿章，你们切莫把他逼上梁山。袁的问题解决了，你们的革命也就成功了。”他的话十分露骨：袁世凯也是汉人，不像曾国藩、李鸿章甘做满人的奴才。你们革命的目的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吗？只要袁世凯倒戈反正，革命就成功了。关键在于解决“袁的问题”。

11 月 30 日，革命军 11 省代表齐集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召开第一次革命军各省代表会议。12 月 2 日，作出决议：“ 虚临时总统主席以待袁君世凯反正来归。 ”对袁世凯发出的信息作出了反应。

12 月 5 日，袁世凯通知 11 省革命军代表大会，他已任命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前往进行和议。南方革命军代表伍廷芳提出以上海为和议地点。12 月 18 日，南北议和代表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举行。双方谈判的实质内容就是，袁世凯倒戈反正，推翻清廷，革命军保证推举他为总统。

12 月 25 日，孙中山回国，到达上海，12 月 29 日当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 年 1 月 1 日在南京宣誓就职。孙中山就职，对于革命军各省代表来说，不过是个“ 激将法 ”。这些代表大多属于同盟会和立宪派。他们早把推翻清朝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借以刺激他早日动手，逼迫清帝退位，以免夜长梦多，再生枝节。就在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时候，他们作出了这样的决议：“ 如袁君世凯反正来归，则临时总统当选人即当让位于袁，以符本会议之诺言。 ”孙中山本人也在就职之后打电报给袁世凯：“ 暂时承立，以待贤者。 ”

逼迫清帝退位，不得不提到日程上来了。袁世凯建议南京临时政府，制订一项优待清室的条例，让清帝“ 光荣退位 ”。

1912 年 1 月 11 日，北洋军全体将领，由直隶提督、淮军老将姜桂题领衔通电清政府：“ 现值军情紧急，请求皇帝命令王公大臣捐献私财，毁家纾难，共济时艰。 ”这是袁世凯压制满族主战派的一条妙计。满族王公大臣气势汹汹，大话炎炎，天天叫嚷南征勘乱，但是要他们出钱筹饷，一个个就噤若寒蝉了。主战高调一下子就压了下去。

同时，袁世凯派人四处散布谣言，把革命党人说成三头六臂，凶神恶煞，“ 他们已经派人钻进北京城里来，布下天罗地网，一旦发生爆动，主战派谁也休想活命 ”。更加把那些主战派吓得不敢开口了。

1 月 12 日，袁世凯终于把牌摊了出来。他指使奕劻在宫廷会议上提出了皇帝退位和民国政府优待清室条例。大多数王公哑口无言，但以良弼为首的少年亲贵坚决反对。会议意见分歧，不欢而散。

1 月 16 日，袁世凯终于粉墨登场，亲自出马了。他上朝向隆裕太后奏道：“ 自古无不亡之国。亡国之君，身受杀戮，古今中外，班班可考。 ”他先把隆裕太后吓了一通，接着劝诱道：“ 今天大清皇帝退位，仍能保持尊号，享受岁费，这是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创举啊。 ”隆裕太后听了这番话，吓得心惊肉颤，只得往后推延，说道：“ 从长计议吧。 ”

谁知当天上午，袁世凯退朝回家，路过丁家街三义茶馆门口，猛可间一颗炸弹从茶馆楼上扔了下来，马车慌忙疾驶而过，刚刚走到祥宜坊酒楼门口，义一颗炸弹从酒楼飞了出来。一声巨响，卫队营管带袁金标及排长 1 人，亲兵、马巡各 2 人，顿时倒在血泊之中。袁世凯所乘马车安然无恙。他的卫队一面开枪还击，一面拥送他逃离现场。

行刺的人是同盟会员和其它革命团体成员。他们认为袁世凯一日不除，民主共和一日不能实现。他们的行动是自发的行动，同盟会并不知情。结果 10 人被捕，3 人判处死刑，袁世凯却毛发未损，安然无恙。

从这天起，袁世凯称病不朝，却让他的亲信赵秉钧、胡惟德、梁士诒代他逼宫，胁迫清帝退位。

满族王公大臣载沣、奕劻等人主张或者被迫同意退位，但是以溥伟、良

弼为首的青年亲贵结成了一个以保全皇位为宗旨的“宗社党”。他们坚决反对退位，主张继续用兵，并且派人警告载沣、奕劻，如果再言退位，他们将采取“激烈行动”。载沣、奕劻吓得不敢吭声，宗社党人气焰更加嚣张。

清帝退位是袁世凯当总统的先决条件，不意受到宗社党的阻挠，袁世凯不禁忧心如焚。他一直避免采取强硬手段逼宫篡位，夺天下于孤儿寡妇之手，背上千秋万世骂名。于是想出了一条借刀杀人之计，除掉良弼，威吓宗社党。他让他的长子袁克定去请汪精卫帮忙。袁克定把宗社党阻挠清帝退位的内幕告诉了汪精卫，指出，“杀一人而全局可定”。汪精卫心领神会，满口答应。

汪精卫经过一番策划，刺杀任务落到老同盟会员彭家珍头上。1 月 26 日，彭家珍在良弼家大门口碰见良弼，扔出一颗炸弹。良弼中弹倒地，彭家珍也被弹片击碎头骨，当场身亡。良弼伤在腿部，送进日本医院抢救，于次日死去。

良弼一死，宗社党以及满族王公大臣吓得魂飞魄散。隆裕太后哭哭啼啼对赵秉钧、胡惟德说：“你们快去对袁世凯说，保全我们母子二人的性命要紧。”

1912 年 2 月 12 日，清室以清帝名义奉太后懿旨下诏，宣布退位，由此结束了清朝 260 余年的统治。

2 月 14 日，孙中山向参议院提出辞职。

2 月 15 日，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参议院电文中称袁世凯为“世界之第二华盛顿，中华民国之第一华盛顿”。

孙中山辞职时，提出了三个条件：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不能更改；二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解职；三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制章程。这里，他把“辞职”与“解职”分开。也就是说：他虽辞职，但袁世凯必须实现这三个条件，他才“解职”。孙中山的三个条件，只有第二条是实的。袁世凯必须到南京来就任临时大总统之职。孙中山以为调虎离山，使袁世凯脱离他的北方老巢，就不至于“为害民国”了。其实，他过高估计了首都所在地的意义。袁世凯“为害民国”无论在南京或在北京，效果都是一样的。但是，这样的条件，袁世凯也不接受。

南京派蔡元培、宋教仁、汪精卫等五位专使到北京。他们又让了一步，不谈首都问题，只求袁世凯南下就职。袁世凯一面隆重欢迎专使，“恳谈”南下就职事宜，一面密令北洋旧属曹锟率部在北京哗变。2 月 29 日北京东安门、前门一带突然枪声四起，火光冲天。北洋军第三镇士兵因欠饷闹事，抢劫商号焚烧房屋，奸淫妇女，虏掠市民。把住在迎宾馆的五位专使从睡梦中惊醒，慌忙躲进六国饭店避难。

第二天，天津、保定也发生了兵变。形势变得极其混乱。日本军部调动军队，准备向北京推进；北方各省督抚纷纷通电劝阻袁世凯南下，否则无人坐镇京师，北方前途堪虞。袁世凯大言不惭地说：“我若一走，必将引起内忧外患，北方将陷于不可收拾之局。”

五位专使惊魂甫定，电告南京参议院：“不妨尽量迁就。”孙中山的条件全部落空。

3 月 10 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4 月 1 日，孙中山宣布解除大总统之职。至此，辛亥革命的全部果实全叫袁世凯摘去了。

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袁世凯窃取了临时大总统职位后，革命党很多人并没有识破他的真面目。孙中山积极筹建铁路，声言要修 10 万里铁路；黄兴主动解散南京临时政府的军队。宋教仁虽然对袁世凯抱有幻想，却看出了共和国面临的危机，指出：“不良之政府虽倒，而良政治之建设未尝有也。”他为民主政治努力奋斗，争取利用宪法规定的民主权利，精力充沛地、热情满怀地奔走呼吁，力图通过议会道路掌握政权，建设名副其实的共和国。

宋教仁（1882 年—1913 年）字钝初（一作遁初），湖南桃源人，别号桃源渔父。1904 年，他与黄兴、陈天华、刘揆一在长沙创立了华兴会，被推举为副会长；1905 年，他努力促进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的联合，成立了同盟会。宋教仁任同盟会司法部检事长，并负责《民报》的编述工作。

宋教仁在日本先后进入东京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广泛接触西方政治学说。翻译了一些西方国家制度的书籍，如《英国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俄国财政制度》，并对西方国家发生的革命运动作了介绍，如《一九〇五年露（俄）国之革命》、《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这些译著，他认为是救中国的“良方”，对革命宣传起了推动作用。

1907 年春，宋教仁返回祖国，在东北联络反清义军，于奉天（今沈阳市）发动起义。1910 年，宋教仁提出了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成立“中部同盟会”，致力于长江流域的革命运动。他往返于上海、武汉之间，创建中部同盟会各地分会，筹款项、办武器，促进了武昌起义的爆发。接着，发动上海、南京等地起义，策应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的胜利，许多革命党人都缺乏思想准备，宋教仁却拿出了厚厚三大册《共和国中央制度》、《地方政治机关设施》等法制文献，为民主共和国描绘了蓝图。他期望成为民主共和国的“叔孙道”（汉朝礼仪制度的制订者）。

1912 年 1 月 1 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式成立，宋教仁任法制局局长，主持制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他依据西方民主制度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原则，规定了国家权力、政权组织形式和公民权利。

“临时政令，多出其手”，宋教仁是中华民国民主与法制的鼓吹者、制订者、捍卫者。

宋教仁主张“政党政治”或“政党内阁”。他企图通过在国会中成为多数党，从而掌握政权。于是，他促进同盟会与几个小党合作，成立了“国民党”。1912 年 8 月 25 日，国民党召开成立大会，他与孙中山、黄兴等 9 人当选为理事。1913 年 2 月，国民党党员在众议院 596 席占了 269 席；在参议院 274 中占了 123 席，成了国会中第一大政党。各方面预测宋教仁将被推举为内阁总理。

1913 年 3 月初，宋教仁路过杭州，俯瞰钱塘海潮，心如潮涌，引吭高歌：“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不久，袁世凯急电，邀他赴京，“商决要政”。3 月 20 日晚 10 时与黄兴辞别，10 时 40 分搭车北上，正当他“欲挽强弓”，大展宏图之时，一颗罪恶的子弹射进他的胸膛。凶手是个矮个子男人。

宋教仁送进了沪宁铁路医院，子夜，他口授电文，致电袁世凯：“请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确定不拔之宪法，则仁虽死犹生。”两天后逝世，年仅 32 岁。

袁世凯得知宋教仁死讯后，又是颁布命令盛加赞颂他“奔走国事，缔造

共和，厥功甚伟。迨统一政府成立，赞襄国务，尤能通识大体，擘画勤劳”，表示哀痛说，“方期大展宏猷，何意遽闻惨变？凡我国民，同深怆恻”，又是电令江苏都督程德全“立悬重赏，限期破获，按法重办”凶手。而政府御用报纸则大造国民党内部倾轧的谣言，惑乱社会视听。

就在宋教仁逝世的第二天，即10月23日，上海一个名叫王阿发的古董商人向捕房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说是10天前，他到法租界文元坊一个老主顾应夔丞家去兜售古董，应夔丞却拿出一张相片，要他“办”了此人，给予重赏。王阿发虽慕赏额，但无杀人胆力，所以没有应允，而那张相片，跟报纸上所登宋教仁的相片一样。当天夜晚，捕房在英租界迎春坊三弄的一家妓院拘捕了应夔丞。第二天清晨，又在应夔丞家逮住了凶手武士英；并搜查出一支五发手枪，枪膛里剩下的两颗子弹跟宋教仁身上取出的弹头完全一样；还搜出了应夔丞同袁世凯政府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国务总理赵秉钧的往来密电本和电报、书信材料多件。

应夔丞原为上海流氓、帮会头子，改组青红帮为“国民共进会”，自任会长。袁世凯得知此人历史，认为可以利用就派洪述祖到上海，以商谈解散共进会的名义，秘密加以收买。从此，应夔丞投靠袁世凯，成为袁世凯在上海对付国民党人的一条恶狗。武士英本名吴福铭，山西人，是个毫无政治头脑、唯知金钱的亡命徒，流窜上海不久，就被应夔丞诱骗收买，拉入了共进会。

应夔丞、武士英落网后，袁世凯于3月29日密电程德全探询案情暴露情况，并催促报告“证据”，他的机要秘书也多次密电程德全，要他把“牵涉中央证据向英厅索取”，派人送京，并特别叮嘱“可不作正式报告”。当时凶犯和证据还都在英租界法厅。通过交涉，4月下旬才移交中方。在孙中山、黄兴的强烈要求下，4月25日，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不得不将查获的函电证据公之于世。其中最重要的有以下各件：

1913年1月14日，赵秉钧致应夔丞函：“密码送请检收，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可也。”

2月1日，洪述祖致应夔丞函：“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指暗杀）方有价值也。”2日，应夔丞致赵秉钧电：“孙、黄、黎、宋运动激烈，民党忽主宋（教仁）任总理。已由日本购孙、黄、宋劣史，……用照辑印十万册，拟横滨发行。”同日，洪述祖致应夔丞函：“紧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弟（称应夔丞）须于题前经电老赵（秉钧），索一数目。”4日又函：“冬电到赵处，即交兄（洪述祖自称）手面呈，总统阅后颇色喜，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

3月13日，应夔丞致洪述祖函：“《民立》记遁初在宁之演说词，读之即知其近来之势力及趋向所在矣。事关大局，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同日，洪述祖致应夔丞电：“毁宋酬勋，相度机宜，妥为办理。”14日，应夔丞致洪述祖电：“梁山匪魁（宋教仁）四出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转呈候示。”18日，洪述祖复应夔丞电：“寒电立即照办。”19日又电：“事速照行。”21日凌晨两点，即武士英刺杀宋教仁不到4小时，应夔丞致洪述祖电：“二十四分钟所发急令已达，请先呈报。”同日又说：“号电谅悉，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堪慰。望转呈。”23日，洪述祖致应夔丞函：“电悉，不再另复。鄙人于4月7日到沪。”

虽然武士英于 4 月 24 日被毒杀灭口在狱中，应夔丞于 7 月 25 日劫狱逃往青岛藏匿，但以上证据公诸报端，袁世凯的元凶面目还是大白于大下，警醒许多国民党人。他们指出，杀害宋教仁实质上是“打击平民政治、伸张专制政治”，袁世凯如果当上正式总统，“四万万同胞之生命财产将悉为所断送。”因此国民党人强烈要求传讯赵秉钧，逮捕洪述祖，“严究主名”，矛头直指袁世凯。宋教仁的被杀和政党政治的破产使孙中山提出了“非去袁不可”的坚决主张。这表明南方国民党人同袁世凯北洋集团的矛盾已公开激化到了刀枪相见的程度。

八十三天皇帝梦

袁世凯暗杀宋教仁后，1913 年 4 月非法大借外债，准备发动内战，消灭革命势力。孙中山等人看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决定起兵讨袁。由于内部意见不统一，迟迟不能举行。袁世凯采取先发制人手段，6 月间免去国民党员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等人职务，派兵南下。革命党人被迫仓促应战。7 月 12 日，李烈钧在湖口宣布独立，发布讨袁檄文，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二次革命”。

7 月 15 日，黄兴在南京成立讨袁军，安徽、广东、福建、湖南、四川宣布独立。但他们并没做好军事准备，彼此又互不统属。在袁世凯南下军队压力下，江西、南京反袁武装迅速瓦解。不到两个月，二次革命就失败了。

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有的被袁世凯收买，有的退党，有的离京南下，在国会中丧了多数党地位，大有风流云散之势。进步党成了国会中的大党，袁世凯组成了以熊希龄为总理的内阁。进步党人梁启超为司法总长，张謇为农商总长，汪大燮为教育总长。梁启超、张謇、汪大燮等人从清末到民初，都是社会名流，这届内阁史称“名流内阁”。

1913 年 10 月 6 日，国会进行正式大总统的选举。当参、众两院议员鱼贯进入会场时，发现会场已被数千个全副武装的军警团团围住。一种大敌当前的紧张气氛钻入议员们的心头。选举开始之前，会议主席王家襄还郑重宣布，议员不得自由离开会场。这么一种高压气氛，不仅使幻想运用议会斗争继续与袁世凯较量的国民党议员们愁容满面，就连进步党议员们也感到难堪。第一次投票结果，袁世凯得 471 票，黎元洪得 154 票，其余的人仅得几票、十几票、三十几票——选举无效。因为国会制订的《总统选举法》规定，候选人必须获得总票数的四分之三的绝对多数才能当选。当天到会的议员共 759 人，袁世凯虽然得票最多，但跟法定数还差 99 票。只得按照《选举法》进行第二轮投票。第二轮投票的议员共 745 人，结果袁世凯得 497 票，离当选仍差 63 票——选举仍然无效。

两轮投票后，时间已经过了中午，有些议员要求回去吃饭。正在这时，一千多个上穿便衣，下穿军裤，脚登皮靴，腰挂短枪的人冲进会场，把住前后门，声称是“公民团”，大声吼叫起来：“今天不选出我们中意的大总统，就休想出院！”议员们一见“公民团”的军裤、皮靴和短枪，知道情况严重，叫苦不迭，便放弃了消极抵制的意图，接着举行第三轮投票，袁世凯以 507 票当选。于是，“公民团”连声三呼“大总统万岁！”便振旅凯旋。这时已到晚上九点，饥肠辘辘的议员们才仓皇离开会场。

在袁世凯看来，这个国会并不是得心应手的工具。既然它已经使他“合法”地成为了正式大总统，这个工具的作用已经用完了。11 月 4 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员议员资格。这样，国会议员人数就不足法定

开会人数的三分之二，国会就无法召开会议，因而瘫痪，熊希龄的“名流内阁”也就只好下台。进步党的梁启超、张謇从此与袁世凯分道扬镳。

1914 年 1 月 10 日，袁世凯以他亲定人员组成政治会议取代国会。5 月 1 日，他废除了孙中山领导制订的《临时约法》，颁布袁氏《中华民国约法》。按照袁氏《大总统选举法》，袁世凯实际上成为终身大总统，而且有权子孙世袭。这一天还撤消了国务院，建立了相当于清廷军机处的政事堂。至此，一个彻头彻尾的北洋军阀政府开始了它的专制独裁统治。

然而，袁世凯并不满足这种相当于皇帝的总统职位，他一心要当真正的皇帝。当时参政院里有个叫杨度的人，完全摸透了袁世凯的心思，1915 年 4 月写了一篇鼓吹帝制的大块文章《君宪救国论》呈递给袁世凯。袁世凯如获至宝，一方面题写“旷代逸才”的横幅赏赐杨度，一方面安排付印广为散发。袁世凯有个美国籍的宪法顾问古德诺，按照袁世凯的要求写了一篇鼓吹中国适用帝制的文章《共和与君主论》，8 月 3 日发表在袁氏政府机关报《亚细亚日报》上，连日本、英国的重要报纸都先后转载。袁世凯在紧锣密鼓大造恢复帝制舆论的同时，还加快了内政外交的实际步伐。为了得到日本政府在军事、经费上支持他当皇帝的承诺，5 月 9 日，他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签署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8 月 14 日，他又授意杨度等六人联名发起成立“筹安会”（筹一国之治安）作为推动帝制的办事机关。自 9 月初到 12 月中旬，“筹安会”策划导演了请愿、选举、推戴三部曲闹剧。

1915 年 9 月 1 日，“筹安会”趁参政院开会之机，带头递交请愿书，呼吁恢复帝制。于是乎，从北京到地方，各种各样的请愿团包括“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纷至沓来，闹得沸沸扬扬。接着，“筹安会”一边密电全国各省军政长官限期回电回函表态赞同恢复帝制，另一边电令各省选举国民代表大会代表。于是，10 月 25 日，各省选举国民代表；28 日，各省国民代表举行国体投票。投票地点一律设在将军或巡按使公署，将军和巡按使是法定投票监督人。会场内外布满军警。票面上只印着“君主立宪”四个字，要投票人写上“赞成”或“反对”，再签上自己的姓名。投票前发给每个代表 500 元大洋作为盘缠或公费，将军或巡按使发表一通诋毁共和、称颂君宪的演说。在此情况下，当然无人敢写“反对”二字。紧接着，各省将投票、推戴情况上报参政院。

在全国文武官吏和“商民”的一片劝进声中，参政院于 12 月 11 日上午 11 时开会，举行解决国体总开票，结果是各省国民代表共 1993 人，全票赞成君主立宪。各省的推戴书上一致写着“谨以国民公意，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运，传之万世”。于是在杨度等人的提议下，秘书长立即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总代表推戴书当众朗读一遍，参政员全体起立，一致通过。11 时 30 分，在欢呼声中散会。当天中午，袁世凯接到推戴书，立即退回，并发下咨文说自己如果登极，一是对不起前朝国君，二是违背了大总统的誓言，申令“另行推戴”。按照预谋，当日下午 5 时，参政院再次开会，报告了袁世凯的咨文。参政员公推秘书厅起草第二篇推戴书。仅用 15 分钟时间，2600 多字的推戴书又写好了。这篇推戴书帮忙袁世凯诡辩说，以前民意共和，大总统的誓言是顺乎民意；现在民意君宪，袁氏登极当皇帝也是顺乎民意。于是第二天（12 日）一早，袁世凯发出申令，引述推戴书全文，宣布自己为中华帝国的皇帝。

1915 年 12 月 13 日，就是袁世凯承认帝位的第二天上午 9 时，他在居仁

堂接受京城及附近地方文武高级官员的朝贺。被召去朝贺的人，有的穿军装，有的穿长袍马褂，有的穿便服，形形色色，无奇不有。袁世凯本来预先打了招呼，朝贺时行三鞠躬礼，但朝贺的人们却仍旧跪拜，很多人还如见前清皇帝一样行三跪儿叩首大礼。袁世凯朝南站着，对跪拜者不时点头，表示接受。12 月 31 日袁世凯正式下令改民国五年即 1916 年为洪宪元年。

袁世凯卖国求荣，悍然称帝，不仅打破了国民党中一部分人运用议会斗争限制袁世凯的幻想，也打破了进步党中梁启超、蔡锷等人通过袁世凯建立“开明君宪”的迷梦。于是一场以蔡锷为军事骨干讨袁护国的政治军事运动在全国风起云涌。

蔡锷（1882 年—1916 年）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1898 年入长沙时务学堂，做了梁启超的学生。1900 年参加自立军起兵，失败后留学日本士官学校。1904 年归国在江西、湖南、广西、云南训练新军，1911 年（宣统三年）升任云南三十七协协统。武昌起义爆发，在昆明举兵响应，建立军政府，任云南都督。并派唐继尧进军贵州，由唐继尧接任贵州都督。1913 年被袁世凯调到北京，暗中监视。1915 年 10 月下旬，正当全国各省举行国民代表投票赞成君主立宪、推戴袁世凯称帝时，蔡锷与梁启超秘密策划反袁。12 月 19 日，蔡锷金蝉脱壳离开北京，途经日本，到达云南。23 日，云南省军政要人在蔡锷的领导下电促袁世凯取消帝制。25 日，云南省宣布独立。31 日，云南护国军正式对北洋军作战。紧接着，贵州、广西、广东、浙江纷纷响应宣布独立。与此同时，孙中山在日本组织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人也在广东、四川、湖南、湖北、江苏、安徽、山东等地频繁地发动起义，有力配合了护国军的军事斗争。1916 年 1 至 3 月，日本政府出于自己的利益采取了倒袁行动。在此形势下，连袁世凯北洋军队中的心腹段祺瑞也于 1916 年 2 月底公然提倡南北停战，维持共和，另组新政府；驻守南京的袁政府总参谋长冯国璋与江西将军李纯、山东将军靳云鹏、浙江将军朱瑞、长江巡阅使张勋等 3 月 10 日联名致电袁世凯取消帝制。

面对军事连连失利，内部众叛亲离，财政拮据无援，帝国主义列强反对的局面，袁世凯不得不于 3 月 22 日正式宣布撤消 1915 年 12 月 11 日“承认帝位案”，23 日告令废止洪宪年号，恢复 1916 年为中华民国五年。至此，袁世凯的皇帝梦宣告破灭。从袁世凯 1916 年元旦洪宪改元起到 3 月 23 日颁令废止洪宪年号止，总共不过八十三天。即使从 1915 年 12 月 11 日承认帝位算起，至 1916 年 3 月 22 日明令取消帝制，也只有一百零三天。当年 6 月 6 日，袁世凯这个自以为不可一世的窃国大盗便在护国军的隆隆炮声和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满怀忧惧一命呜乎了。

复辟丑剧十二天

袁世凯死后，《临时约法》恢复了，国会也重新开场了。曾任副总统的黎元洪当选为总统；冯国璋当选为副总统；段祺瑞为内阁总理。

黎元洪虽然登上了总统宝座，但北京政府的大权落到了段祺瑞手中。段祺瑞俨然以北洋首脑自居，哪里把黎元洪放在眼里？两人之间，发生了尖锐的矛盾。1917 年，他们就要不要参加欧洲战争（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了公开的争执。

段祺瑞主张参战，黎元洪反对参战。国会也由此分为两派，闹闹哄哄，吵得不可开交。当时，国民党议员组成“宪政商榷会”，他们拥护黎元洪；进步党议员以梁启超为首，组成“宪政研究会”，简称“研究会”，拥护段

祺瑞。国民党反战拥黎派为多数派，处处与段内阁为难，“参战”案无法在国会通过，段、黎矛盾更加尖锐。

黎元洪看出北洋军并非铁板一块。段祺瑞、冯国璋两个首领之间就存在巨大裂痕。于是他与冯国璋暗中勾结，于 1917 年 5 月，下令免除段祺瑞内阁总理职务。段祺瑞立即跑到天津，唆使安徽、奉天、山东、福建等八省军阀宣告“独立”，组成各省总参谋部，打出反黎旗帜，威胁出兵讨伐。黎元洪原以为冯国璋会出面支持，谁知他与湖北、江苏、江西三省军阀坐山观虎斗，黎元洪势同骑虎，处境十分危险。于是向驻守徐州的张勋求助。张勋慨然许诺，以“调停”为名，带兵向北京开去。

在清朝，人们脑后留着一条长长的辫子。民国之后，人们纷纷剪去辫子。张勋为了表示忠于清王朝，自己不剪辫子，也禁止所部将士剪辫子。因此，称为“辫子军”，他本人也被称为“辫帅”。

1917 年 6 月 30 日，他的军队开到北京城外，本人就进城到江西会馆戏场听戏去了。他是来调停黎段纠纷的，是位“和事佬”，装出一副超然悠然的样子，一直听到子夜 12 点钟。回到寓所，这里却是一幅紧张肃杀的景象。士兵荷枪实弹，严阵以待；参谋人员进进出出，频繁部署；谋士和幕僚正在聆听一位广东口音的人讲话，他就是戊戌变法的领袖、保皇党的首脑康有为。

张勋当即命令他的“辫兵”把京津临时警备总司令王士珍、副司令江朝宗和陈光远、以及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湖“请”来，突然宣布道：“本帅此次率兵入京，并非为某人调解而来，而是为了圣上复位，光复大清江山。”接着他告诉众人，今日傍晚，他已进宫面圣，召开了“御前会议”，决定明晨请皇上复位。议罢厉声问道：“诸位尊意如何？”王、江、陈、吴四人被这突如其来的事件弄得心惊肉跳。王士珍壮着胆子问道：“各省及外交部接洽过吗？”张勋回答：“外交确有把握。冯国璋、陆荣廷均表赞意，并有电来催。各省督军也一致拥护。”王士珍等默默无语。张勋又说：“我志在必行。你们同意，则立开城门，放我兵马进来。否则请各归布置，决一死战！”王士珍等面面相觑，不敢再说什么。张勋遂下令打开城门，5000“辫子兵”全部进城。接着，张勋穿上蓝纱袍，黄马褂，戴上红顶花翎，带领康有为以及王士珍、江朝宗、陈光远、吴炳湘文武官员，乘车进宫。此时已是 7 月 1 日凌晨。

7 月 1 日凌晨 3 时左右，于 1912 年 2 月 12 日宣布退位、如今才十一二岁的溥仪在瑾瑜两太妃和太保世续、师傅陈宝琛等人的护导下，来到养心殿召见张勋一干人等。张勋见小皇帝坐上了龙椅，便立即甩开马蹄袖，领着众人匍匐在地，向溥仪行三跪九叩首大礼。接着由张勋奏请复辟，嘟嘟囔囔地说：“（五年前）隆裕皇太后不忍为了一姓的尊荣，让百姓遭殃，才下诏办了共和，谁知办得民不聊生……共和不合咱的国情，只有皇上复位，万民才能得救……”溥仪按照陈宝琛的指点表示谦让说：“我年龄太小，无才无德，当不了如此大任。”张勋立即赞颂：“皇上睿圣，天下皆知，过去圣祖皇帝（指康熙）也是冲龄践祚嘛。”溥仪便连忙按照陈宝琛的嘱咐说：“既然如此，我就勉为其难吧！”于是，张勋、康有为等人又跪拜在地上，高呼万岁，王士珍等人也只得跪下随口欢呼。

凌晨 4 时，张勋派清室旧臣梁鼎芬等人带着小皇帝赐封黎元洪一等公的诏书和康有为预先代写的“黎元洪奏请归还国政”的奏折，五更叩开总统府的门，要黎元洪在奏折上签字。黎元洪听明白了梁鼎芬的来意后，分外惊愕，

知道自己上当了，前门才赶走段祺瑞那只狼，后门却引来张勋这只虎，便严辞拒绝说：“总统的职位，乃出国民委托，不敢不勉任所难。若复辟一事，乃是张少轩（张勋字）一人主张，恐中外未必承认，我奈何敢私自允诺呢？”梁鼎芬恐吓说：“先朝旧物，理当归还。公若不肯赞成，恐致后悔。”黎元洪索性闭上眼睛，不予理睬。梁鼎芬无法，只得悻悻而去。第二天，黎元洪通电住在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代任总统职务，逃到东交民巷日本使馆区避难。

7 月 1 日早晨，北京街头警察挨家挨户命令悬挂黄龙旗。停业五年多的黄龙旗店又重操旧业，但一时供不应求，许多人家只好用纸糊一面龙旗应付。而那些早就盼望清室复辟的王公贵族、遗老遗少则弹冠相庆，兴冲冲地聚集在皇宫门前等候觐见“皇上”；没有朝服的人就急忙到旧衣铺去抢购朝服，没有发辫的人就到戏装店定做用马尾制作的假发辫，他们穿上长袍马褂，晃着真真假假的大辫子招摇过市。

张勋复辟集团的倒行逆施立即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复辟当日，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愤然离开北京南下上海。当时在教育部供职的鲁迅冒雨到教育部提出辞职以示抗议。时在上海的孙中山闻讯后极为愤慨，立即发表讨逆宣言，6 日偕同一批同志乘军舰南下，计划到广州组织武力讨伐张勋。全国各地尤其是南方各大省会召开万人大会，各家报纸发表大量文章，一致声讨张勋。

真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张勋复辟，曾与段祺瑞密谋。谁知一俟把黎元洪赶下台后，段祺瑞便在天津发表讨张的通电和檄文，组织起讨逆军，自任讨逆军总司令，4 日在马厂誓师出发，5 日正式开战，12 日拂晓攻进北京城内。“辫子兵”一触即溃，在讨逆军的两路夹攻下，有的举起白旗投降，有的剪掉辫子扔掉枪支逃命。此时北京的街道上丢弃的发辫俯拾即是。“辫帅”张勋满怀被段祺瑞利用、出卖的怨恨，仓皇逃到荷兰使馆躲藏起来。当日，只做了 12 天“北京皇帝”的溥仪再次宣布退位。14 日，段祺瑞返回北京，重新担任国务总理，掌握了政府实权。段政府礼仪性地去迎接黎元洪重新担任总统，黎元洪回到家里通电全国引咎辞职。住在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被请到北京代行大总统职务。段祺瑞政府虽然做了一下表面文章，对张勋发了通缉令，但因张勋手里捏着他和督军团同意复辟的把柄，所以一直没有缉拿的行动。

1917 年 8 月 14 日，段祺瑞政府通电对德、奥宣战。

五四运动

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北洋军皖系军阀段祺瑞执政，政局不时动荡，政治更加黑暗，社会各阶层普遍滋生出悲观失望情绪。保皇党人康有为利用这种情绪，大肆攻讦共和，攻讦辛亥革命。《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撰文严辞驳斥。他指出，政治的混乱黑暗现象并非“共和本身之罪”，而是受到了“阻力”；武人像“北洋派张勋等”，学者像“保皇党人康有为等”，就是最大最强的阻力。酿成政治黑暗的原因，“不唯阻碍改革者之武人学者是诛，而归罪于谋改革者酿乱，则天壤间尚有是非曲直之可言乎？”

陈独秀以及《新青年》其他作者就是这样站在时代思想前沿，批驳反动谬论，为辛亥革命辩护的。《新青年》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竭力把“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请进中国来。他们推进文学革命，提倡

白话文，反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抨击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政策。

《新青年》在 1915 年创刊以来，就受到广大青年的喜爱。随着发行量的增长，影响日益扩大，以至形成为一个有历史意义的文化思想运动。这个文化思想运动，以发生于 1919 年 5 月 4 日的北京学生爱国运动命名，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 年 1 月，美、英、法、日等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也是战胜国之一，也参加了和会。北洋皖系军阀段祺瑞控制的北京政府代表在会上要求取消 1915 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直接收回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然而，巴黎和会漠视中国主权和战胜国地位，非法决定德国在山东的特权由日本继承。

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努力彻底失败的消息由 5 月 2 日的《晨报》公开之后，丧权辱国的悲愤情绪在全国上下如火山爆发，似海涛奔涌。3 日夜晚，北京大学校园内一片沸腾，一千多名本校学生和外校学生代表聚集在法科礼堂共同商讨行动方案，会议气氛悲壮激昂。有个学生当众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字。会议最后决定第二天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4 日下午 1 时左右，北京 10 多所学校的 3000 多名爱国学生齐集天安门，人人手举小旗，写着“还我青岛”、“保我主权”、“诛卖国贼曾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等内容的标语。这三个人在段祺瑞的指使下，为了向日本大借款，签署了一系列出卖国家主权的协定、合同和换文、照会。在全民一致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呼声中，人们对这三个卖国贼口诛笔伐是理所当然的。

这天中午，皖系军阀政府总统徐世昌在中南海总统府内大摆筵席为刚从日本回国的章宗祥接风，作陪的是国务院总理钱能训和曹汝霖、陆宗舆。正在他们举杯投著觥筹交错之时，爱国青年学生在天安门集会的消息传来。徐世昌随即下令京师警察厅妥速解决，不许游行。席散之后，陆宗舆先行离去。大约在下午 2 时半左右，曹汝霖邀约章宗祥一同乘车回到了赵家楼自己的住宅。这时，京师警察厅估计学生会到曹宅示威，派了三四十名警察前来保护。但警察长对曹汝霖说：上头命令，文明对待。

学生们在天安门举行集会之后，一起来到了外国使馆所在的东交民巷，向各国驻华使馆递交说帖，请求他们说服自己的政府在和平会议上援助中国。随后，学生们退出东交民巷，浩浩荡荡地向曹汝霖的住宅进发。游行队伍来到赵家楼胡同时，曹宅的大门已经紧闭。学生们一边愤怒喊着口号，一边向曹家院墙里抛掷写有标语的小旗。忽然砰地一声，大门被撞倒。学生们蜂拥而入，呼喊着搜索曹汝霖。可是不见曹汝霖的踪影，只有他的小老婆苏佩秋在客厅里应酬。学生们追问她，曹汝霖在哪里，苏佩秋只是回答说，他出府未回。其实躲在狭小的箱子间里，不敢露面。学生们找不到曹汝霖，极为愤怒，有人放起一把大火，曹宅顿时浓烟滚滚，火光冲天。躲在曹家又小又黑的地下锅炉房里的章宗祥担心迟误会葬身火海，立即冲了出来，企图溜走，终被学生发现。愤怒的人群喊叫着，咆哮着围了上去，挥拳踢脚，将他痛打一顿，直到他趴在地上不能动弹。随后，警察总监吴炳湘亲率大批人马赶到，有的为曹宅扑火，有的将章宗祥抬送医院，有的抓人。当天有 32 名学生被捕。

5 月 7 日，皖系军阀政府释放了被捕学生，但他们为曹汝霖、章宗祥、

陆宗舆的卖国行径百般辩解开脱，悍然宣布要在对德和约上签字，并于 25 日对学生运动下达了一道措词强硬的命令，禁止集会、游行、演说、散布传单，否则实行镇压。

政治形势的急剧恶化，激起了声势更为浩大的斗争浪潮。6 月 3 日，北京各校的学生继续上街演讲，警方根据总统徐世昌 5 月 25 日的命令，逮捕了 170 多名学生，监禁在北京大学法科校舍。4 日，学生们仍旧上街演说，警方出动马队冲撞学生和听众，并逮捕了 700 多人，法科校舍容纳不下，又把马神庙理科校舍用作临时监狱。5 日，学生们再次冲破阻挠，走上街头，分路演讲，北京中等以上学校联合会向全国各界发出宣言，坚决要求罢免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指出不除国贼就无法挽救国权。这一天，虽然皖系政府迫于形势，释放了被捕学生，撤走了包围北京大学的军警，但其暴行早已激怒了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上海爆发了伟大的六三运动。

当 6 月 3 日、4 日北京军警大规模逮捕学生的消息传到上海后，上海的学生纷纷罢课，以示声援，并分头动员工界罢工，商界罢市。5 日，许多商店关门罢市了，门前贴着“不诛卖国贼不开市”、“要求政府夺回青岛”等标语。在一家书局门前贴着一副对联：“罢课救亡，罢市救亡，我两界挺身先起；民心不死，民国不死，愿大家努力进行。”从这天起，上海纺织、机器、印刷、电车、汽车、码头、轮船、烟厂等行业的工人也陆续罢工了，尤其是沪宁铁路工人从 10 日起开始罢工，使得沪宁线处于瘫痪状态，把上海的学生罢课、商店罢市、工人罢工的“三罢”斗争推向了全国。

段祺瑞政府，被迫释放了被捕学生，撤去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职务，并于 6 月 28 日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中国有了共产党

1920 年 1 月下旬，北京城里寒气袭人。一天，北京大学的两位教授李大钊和陈独秀经过一番精心乔装，乘坐骡车秘密离开北京，朝天津疾驰而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李大钊，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率先接受和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办《每周评论》，是五四运动的实际领导者。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自 1915 年 9 月主编《新青年》起，提倡新文化；1918 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宣传马克思主义。半年前的五四运动期间，即 1919 年 6 月 11 日，他和李大钊等人在北京“新世界”商场前散发《北京市民宣言》时被捕，9 月 16 日才保释出狱，至今还遭北京军阀政府监视。因天津周恩来等领导的觉悟社邀请他们两人去讲演，所以想出乔装打扮的办法摆脱军警监视，一起去天津。

半年前席卷全国的五四运动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初步结合的伟大成果。经过五四运动的实践锻炼，在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已经成熟。当时共产国际驻天津通讯社的一名成员正准备会晤中国的先进分子，李大钊、陈独秀正好跟他会面，共同讨论了在中国建党的问题。天津事毕，李大钊回到北京，陈独秀则于 29 日到达上海，分头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

这年 3 月初，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人来华。4 月，维经斯基、马迈耶夫、波林、库兹涅佐娃和具有俄共（布）党籍的旅俄华侨杨明斋等一行到达北京。这时，俄共（布）党员萨赫扬诺娃、斯托扬诺维奇分别从海参崴、哈尔滨来到北京同维经斯基一行会合。他们首先通过在北京大学的俄籍教员柏烈伟和伊凡诺夫介绍，会见了李大钊，并与五四运动的骨干人员举行了多

次座谈，讨论了建党问题。然后经过李大钊介绍，维经斯基、库兹涅佐娃、萨赫扬诺娃和杨明斋到上海会见了陈独秀，商谈建党问题。从此，共产主义组织在各地纷纷建立。

8 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李启汉、赵世炎、陈公培、沈玄庐、俞秀松等人在上海建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不久，邵力子、沈雁冰、沈泽民等人也加入上海小组。同月，去日本留学的施存统与周佛海在东京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10 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在北京大学李大钊的办公室内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参加者还有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张太雷、何孟雄等。同月，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刘伯垂、张国恩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2 月，王烬美、邓恩铭、王翔千、王复元等在济南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2 月 29 日，陈独秀应粤军陈炯明邀请到广州出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1921 年 3 月与谭平山、陈公博、查植棠等在广州又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4 月，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同周恩来、李富春、刘清扬在巴黎建立了共产主义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至此，召开一个全国代表大会，把分散在各地的革命组织统一起来的问题提到了共产党人的面前。

1921 年 6 月 3 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马林乘意大利轮船来到中国上海。与此同时，受国际工会联合会驻赤塔远东书记处代表斯穆尔基斯派遣的弗兰姆堡，由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来接替维经斯基工作并接受了赤色职工国际委托任务的尼科尔斯基也先后到达上海。马林、尼科尔斯基与李达、李汉俊取得了联系，通过交谈了解到中国共产党筹建的情况后，建议“ 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 ”。随后，李达开始发信给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各派两代表到上海开会。在北京的李大钊，在广州的陈独秀，都积极支持上海的意见。

经过五十天紧张筹备，7 月 23 日晚上 8 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三号李汉俊的哥哥的家中开幕。出席会议的代表十二人，他们是湖南的毛泽东、何叔衡，湖北的董必武、陈潭秋，山东的王烬美、邓恩铭，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广东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会议原定由陈独秀主持，因陈独秀未能出席，就推举张国焘主持会议，毛泽东、周佛海任记录。张国焘向大会报告会议的筹备经过，说明此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会议应当具体讨论和解决的各种问题，首先是制定党的纲领和实际工作计划。马林、尼科尔斯基在会上先后讲话，由李汉俊、刘仁静即席翻译。代表们商讨了这次会议的议程和任务。此后几天，大会交流各地建党经验，选举起草委员会起草党的纲领和各项文件，大会进行讨论。预定 30 日晚上开会通过党纲等项文件，选举中央领导机构后闭幕。

7 月 30 日晚上 8 点多钟，会议刚刚开始，突然有个穿便衣的男人闯进了会场，迅速环视着围坐在餐桌四周的与会人员。作为房屋主人的李汉俊立即问他：“ 你找谁？ ”“ 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 ”那人连连道歉退了出去。大家判断那人是跟踪而来的侦探，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赶快疏散。李汉俊和陈公博两人留下。代表们离开会场十几分钟后，两辆满载巡捕和密探的汽车就开到了李公馆门前，将公馆团团围住。几个法国警官跟随中国密探闯进了

室内，搜查了一个多钟头，没有找到任何证据。盘问李汉俊和陈公博，回答没有丝毫破绽。警官和密探一无所获，悻悻而去。从李公馆疏散出来的会议代表们旋即会聚到李达家里，研究会议新址。最后大家决定，到浙江嘉兴去租条船在南湖上开会。

7 月 31 日的嘉兴南湖烟雨茫茫，一条游船悠悠荡进静谧的湖心。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最后议程正在这条船上悄悄进行：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选举产生了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三人组成的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局；推选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下午 6 时，会议闭幕，代表们低声而有力地呼喊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解放万岁！”中国历史在这呼喊声中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的：“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巨款买来“大总统”

1923 年 10 月 10 日，北洋直系保定派军阀头目曹锟就任以 1350 万元巨款贿选而来的大总统职位。

曹锟在清代末年任袁世凯北洋第三镇统制。辛亥革命后历任北洋军第三师师长、直隶督军、直鲁豫三省巡阅使。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与其部属吴佩孚同为直隶军阀头目。1922 年 4、5 月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直系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奉系军阀张作霖。5、6 月，吴佩孚逼迫原皖系安福会扶上台的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辞职，6 月 11 日，重新拉出黎元洪为代总统，9 月，操纵组成了吴佩孚嫡系多居要职的“洛派内阁”（因吴佩孚驻兵洛阳而得名）。此后，直系明显地分裂为洛阳派和保定派（因曹锟驻兵保定而得名）。保、洛两派分家后，曹锟、吴佩孚二人争当总统。曹锟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抢先采取先驱逐黎元洪、后贿选的策略以攫取总统职位。

1923 年 6 月上旬，曹锟利用流氓组成“公民团”，在天安门集会，要求黎元洪“即日下台”；嗾使冯玉祥、王怀庆率中级军官 300 人到黎元洪宅第索饷，声言要冯军入京维持秩序。6 月 13 日，黎元洪被迫出走天津。

《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选举会必须有参、众两院三分之二的议员出席才能召开。当时的国会议贝共 870 名，总统选举会的法定出席人数至少应有 580 名。为了抵制这次选举，当时在广州的孙中山大元帅府派人到北京活动，欢迎议员们南下广州；占据浙江的军阀卢永祥派人到天津设立议员执行处，以每月发给 300 元薪金动员议员南下上海完成宪法的制订工作；一年前败退关外的张作霖也撤走了东三省议员；这样，议员们纷纷离开北京南下北上。这时候，直系官僚便利用公民团和军警劝阻议员出走，准备在 6 月 19 日国会开宪法会议时实行逼选。但是议员们拒不出席，逼选不成。为了把出走的议员们拉回北京，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帮曹锟出了个贿选的主意。6 月 23 日，曹锟秘密建立了大选筹备处，下设财政、交际、外交，文书等股。规定议员投曹锟一票，价 5000 元，总统选出后一日领款，对于出力大的，另予特别票价。8 月 24 日，吴景濂假借国会名义，利用预备名目，非法决议：两院每星期开常会时，出席议员均由国会预备费内支给 100 元。每次开会时发给出席证，然后领取出席费。每个议员每月可领出席费 400 元。同时还根据大选中的地位和作用分别论价行贿。王家襄一派得到 16 万银元，王家襄才重新负起参议院议长责任；吴景濂一手包办贿选，得款 40 万元；秘密支给各政团

首领 20 万元；各省议员头目、政团头目各得特别酬劳费二、三万元不等；一般议员发给 5000 元支票，在曹锟当选后兑现。许多议员只要钱财，不顾人格，又陆续返回北京。在 9 月 10 日的预选会上，竟有 500 余人出席。 10 月 1 日，发出票价 5000 元的支票 570 余张。然而还是不足法定出席人数。曹锟此时一门心思要当大总统，而且决心在 10 月 10 日辛亥革命纪念日举行就职典礼仪式，定于 10 月 5 日举行总统正式选举大会。为了凑足大选法定出席议员人数，临时决定即使不给曹锟投票但出席会议者也发给 5000 元支票。为了确保议员们出席选举大会，还密派专人在北京宣武门外校场 5 条 13 号组织了一个“ 暗察处 ”，探员日夜分班，跟踪监视督促强迫议员出席会议。

10 月 5 日这天，北京全城军警宪兵一齐出动，荷枪实弹封锁会场，监视议员，议员们走进会场就失去了自由。上午 8 点半，吴景濂走进会场清点人数，见签到者寥寥无几，心里凉了一截，便宣布正式开会时刻不定，什么时候签到人数够了什么时候开始。等到 11 时 40 分，签到的不足 400 人。吴景濂急得坐立不安，立即派可靠的议员出去，每人至少要拉一个议员到会。挨到下午 1 时 20 分，签到的议员 590 名，这才摇铃开始投票。下午 4 时，唱票完毕，曹锟靠着钱财和枪杆以 480 票当选为总统。

曹锟贿选的丑恶行经激起了全国公愤。选举当天，上海各家商店门前悬挂白旗表示抗议。选举过后，全国许多地方纷纷举行抗议集会和示威游行。6 日，上海市民在天后宫举行大会，与会者 60 余个团体，2000 余人一致决议通电中外，否认曹锟为总统。出走到上海的参、众两院议员 171 人联名发表宣言，声讨曹锟贿选之罪。7 日，杭州浙江省教育会通电：曹锟行贿应从严惩治；受贿议员应依律处罪；通电各国驻京公使，勿再贷款、售械给曹锟政府，助我内乱。8 日，孙中山在元帅府召开会议，议决通电讨曹。他指出，曹锟的贿选，是“ 文明之国家所认为奇耻大辱者也 ”，“ 故中国人民认曹锟之当选总统，为一种篡窃叛逆行为，在理在势，皆须反对而讨伐之 ”。他希望各友邦与中国人民一致反对曹锟的贿选。11 日，广州议员开会讨论，一致通电否认曹锟贿选的总统，并请孙中山立下明令，声讨问罪。13 日，广州工学界在教育会开国民大会，议决：声讨曹锟，惩治受贿议员；宣言中外，否认贿选；请孙中山出师北伐。广大群众咒骂曹锟为“ 贿选总统 ”，受贿议员为“ 猪仔议员 ”，国会为“ 猪仔国会 ”。杭州、芜湖的学生捣毁了当地“ 猪仔议员 ”的家宅。

曹锟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当了一年总统。1924 年 9 月 18 日，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10 月 19 日，直系将领冯玉祥回师北京，发动政变，23 日软禁了曹锟。11 月 2 日，曹锟被迫宣告退位。至此，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中央政权告终。

“ 二七 ”大罢工

中国共产党自她诞生那天起，就以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形象，始终走在中国工人运动的最前列。

1921 年 8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便在上海组织成立了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并出版《劳动周刊》，指导全国工人运动。随后又在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设立劳动组合书记部分部，作为领导各地工人运动的机关。从此，工人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以 1922 年 1 月 13 日开始至 3 月 6 日胜利结束的香港海员大罢工为起点，全国出现了第一次罢工高潮。为了加强对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的领导，1922 年 5 月 1 日，

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173名，代表12个城市，110多个工会，20多万名会员。代表中除共产党员外，还有国民党、无政府主义者及无党派人士。这次大会对推动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和统一起了重大作用。

1922年5月初，英美帝国主义支持的直系军阀吴佩孚打败了日本支持的奉系军阀张作霖，占领了京津一带，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亲日派的交通系内阁虽然倒台，但在铁路上有着根深蒂固的势力。吴佩孚为了利用共产党把交通系势力赶出铁路，便通电宣称“保护劳工”。李大钊借机通过他的老同学、吴佩孚的副官白坚武向吴派内阁的交通总长高思洪建议，向各路派密查员调查交通系势力。这个建议被采纳，共产党员何孟雄、张昆弟、安体成、陈为人、包惠僧被派往京绥、津浦、京奉、正太、京汉铁路，公开身份是交通部的密查员，实际上是中共北方委员会的特派员，在5条铁路上秘密领导工人运动。此后，8月24日至26日的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10月4至12日的山海关京奉铁路铁工厂工人罢工，10月27至28日的京绥铁路工人卧轨罢工，12月15至26日的正太铁路工人罢工都取得了胜利。到1923年初，京汉铁路全线已经成立16个铁路工会，有3万多名会员。各地工会要求建立全路的统一领导机构，筹备会决定于2月1日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因为吴佩孚宣布过“保护劳工”，所以筹备工作是公开进行的，在报纸上登了大幅广告，向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报告了成立大会的时间和地点。赵继贤将此事报告了吴佩孚。

吴佩孚系清末秀才，1906年为北洋军第三镇曹锟部管带，1917年升至陆军第三师师长。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先后任两湖巡阅使、直鲁豫三省巡阅副使。这期间，京汉铁路是他直接控制的交通线路，他部队的军饷来源，很大一部分是靠截留京汉铁路的收入。1922年8月24至26日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胜利，每人每月增加3元工资，使吴佩孚每月减少收入6万元，因此他对工人罢工恨入骨髓。眼下，他自以为政权已经稳固，决计丢掉“保护劳工”的假面具了。得到赵继贤的报告后，他一方面命令赵继贤准许工人如期召开大会，借以欺骗麻痹工人；一方面命令驻郑州的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鹏、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严禁大会召开，部署武力镇压。赵继贤秉承吴佩孚的旨意，对大会的召开表示支持，向筹备处赠送锦旗致以祝贺。而在1月28日与会代表和来宾到达郑州的当天，吴佩孚却派人到总工会筹备处发出警告：吴大帅有令下来，禁止工人在郑州开会。30日，吴佩孚发电报给总工会筹备处，叫派代表到他驻军的洛阳去协商开会的事。当天，5名工人代表到了洛阳，吴佩孚却拒不见面。经过反复交涉，到了傍晚时分，吴佩孚的一个副官才出来通知，次日早上8时会谈。可是第二天早上8时，出面的只是吴佩孚的副官白坚武进行敷衍和恐吓。代表们非常气愤，坚决要求和吴佩孚面谈。这时，吴佩孚才亲自出来，说自己一向是保护劳工的，不过郑州是个军事区域，不能开会；再说赵继贤报告这件事后，自己已下命令制止开会，作为军官怎能收回成命？以后保护你们的日子还多。最后他眯起眼睛显露杀机说：“你们若是非开会不可，我可没有办法了。”

5名工人代表立即返回郑州。为了维护工人的权利，代表们决定2月1日按期开会。

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在河南郑州召开成立大会。这天清晨，郑州全市戒严，军警林立。当130余名各地工人代表及来宾以军乐为前导，

手执红旗和各处工会赠送的匾额，从住地向大会会场普乐剧园进发时，荷枪实弹的军警即蜂拥而上，将他们紧紧包围，强行阻拦，不准进入会场。双方相持约两个小时，经反复交涉，军警仍然蛮横地禁止工人代表和来宾前进。全体代表来宾义愤填膺，忍无可忍，便不顾生死，冲破军警包围，闯进会场。大会主席当即宣布开会，说明总工会宗旨，并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会场上爆发出雷鸣般的高呼声：“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这时，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亲自带领军警冲入会场，强令大会解散。工人代表和与会群众同军警相持到下午 4 时，才宣布散会，冲出会场。但代表、来宾们回到住所，发现这里也被军警包围，总工会会所被捣毁。军警还不准给代表和来宾们提供饮食，强令他们出境。为了还击反动当局，当晚，京汉铁路总工会决定于 2 月 4 日中午举行全路总罢工，并决定将总工会暂时移到武汉江岸办公。2 月 2 日，总工会发表罢工宣言，要求撤革赵继贤，查办黄殿辰，退还郑州总工会会所，赔偿大会损失，送还大会一切匾额礼物，并由地方官赔礼道歉。2 月 4 日，京汉铁路工人在“争自由，争人权”的口号下举行全路大罢工。从上午 9 时开始，不到三个小时，在两千多里的铁路线上，客车、货车、军车一律停开，京汉路全线瘫痪。2 月 6 日，武汉各工团代表和江岸一万多名铁路工人举行集会游行，高呼“全世界的劳动者联合起来”、“打倒军阀”等口号。

声势浩大的京汉铁路总罢工沉重地打击了各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各国的驻华使团立即要求北京军阀政府尽快武力镇压。汉口的英国领事也于 6 日召集湖北省督军萧耀南的代表和外国资本家举行联席会议，策划镇压办法。这样，吴佩孚更是有恃无恐，下令进行大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2 月 7 日下午，湖北省督军府参谋长张厚生派人到江岸的京汉铁路总工会，要工会派代表到扶轮学校谈判复工问题。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等代表前往扶轮学校同张厚生面谈，提出先撤退军队再谈判复工。张厚生一口拒绝，并威胁说必须马上复工。代表们看出事态严重，应该设法脱离险境，就对张厚生说，要回去商量。下午 5 时，扶轮学校响起紧急集合的军号声，没过一刻钟，1000 多名军警包围了总工会。扶轮学校又响起了冲锋号，军警们迅速冲进总工会和各厂区，疯狂逮捕工会负责人和工人群众。林祥谦等 10 余人被捆绑到江岸火车站。当时正是数九寒冬，林祥谦被扒光上衣捆绑在电线杆上。一个军官带着几个身背大刀的士兵走到林祥谦面前，要他下令复工。林祥谦斩钉截铁地说：“上工要总工会下命令。我的头可断，工是不上的。”军官命令士兵在林祥谦身上砍了数刀，林祥谦强忍剧烈疼痛，高呼：“头可断，血可流，工不可复！”疯狂的刽子手残酷地砍下了他的头颅。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秀儿子林祥谦壮烈牺牲。这时候，当时名叫项德龙的项英带领 100 多名工人纠察队员冲进车站营救被捕工人，军警开枪射击。绑在电杆上的工人和部分纠察队员中弹牺牲。共产党员、二七大罢工组织者之一的施洋律师当晚被捕，他在法庭上与敌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5 日在武昌英勇就义。就义时，他身中三弹仍连呼三声：“劳工万岁！”2 月 7 日，京汉铁路沿线的长辛店、郑州、信阳等地都发生了军警镇压罢工工人的事件。在这次惨案中，前后 44 人惨遭杀害，300 余人受伤，60 余人被捕，1000 多人被迫流亡或被开除。

京汉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得到了全国工、学各界乃至共产国际的广泛支

持，一直坚持到 2 月 9 日。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工团联合会为了保存力量，准备将来更大的斗争，发出文告劝导工人忍痛复工。从此后，全国各地的工会组织除了广东、湖南尚能保存并可公开活动外，几乎全部被迫停止活动或转入地下。工人运动暂时进入低潮。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从这次斗争的失败中认识到，仅仅开展罢工斗争，革命是无法胜利的。从此，共产党人竭尽努力促成国共合作。

国共首次同携手

1922 年 8 月 29 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会根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提议，在杭州西湖举行特别会议，听取马林传达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讨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的问题。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以及马林和翻译张太雷。对于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李大钊表示同意，张国焘坚决反对，陈独秀则顾虑重重，会上发生了激烈争论。

原来 1921 年 6 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特别强调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并决定筹备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10 月前后，共产国际远东局通知中共中央和马林，要求中国共产党和各革命团体派代表参加。为了争取孙中山派代表参加这个会议，12 月 23 日，马林在国民党元老张继和共产党员张太雷的陪同下，到广西桂林会见了正在这里组织北伐的孙中山。之后，马林从桂林来到广州进行考察，多方面接触国民党人。此时正值香港海员大罢工，马林正好碰上港英军队拦截枪杀徒步返回广州的罢工工人的“沙田惨案”发生，他亲自了解到了国民党许多要人声援、资助香港罢工工人的情况。1922 年 3 月，马林一回到上海就向中共中央提出建议，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把国民党改造成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但正被第一次全国工人运动高潮鼓涌着的陈独秀、张国焘等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只看到国共两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的区别，而忽视了民族民主革命目标的一致，不同意马林的建议。陈独秀甚至抢在马林回共产国际报告工作之前，于 4 月 6 日写信给当时在共产国际远东局工作的维经斯基，申述不同意加入国民党的理由，请他代向共产国际汇报。7 月上旬，马林回到莫斯科，写成《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其中写到他对中国国民党的认识和国共合作的建议。18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正式决议在中国实行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建议。8 月初，马林陪同苏俄驻华全权代表越飞再度来华，带来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对已于 7 月中旬正式加入共产国际的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国共产党应以独立的姿态与国民党合作。

这次杭州西湖特别会议上的争论，是 3 月以来争论的继续。通过争论，陈独秀表示服从共产国际决议，多数人表示尊重共产国际的指示，接受加入国民党的主张。会议决定劝说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

早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不久的 1918 年 7 月，孙中山就曾致电列宁和苏维埃政府：“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斗争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1920 年 4 月上旬，中国报纸全文发表苏俄政府 1919 年 7 月 25 日的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止中俄不平等条约，将帝俄政府以掠夺手段向中国取得的各项权利一律无偿交还中国，对此，孙中山同全中国人民一样对俄共（布）领导的苏俄政府由衷欢迎。1921 年 12 月下旬，马林到桂林会见孙中山，进行了多次交谈，曾建议中俄联盟，国共合作。孙中山当

时虽然犹豫未决，但为以后的进一步商议打下了基础。1922 年 4 月下旬，孙中山从广西回到广州，马林也到广州参加在这里举行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又以苏俄全权代表身份与孙中山会谈。孙中山表达了自己对苏俄的友好感情，表明打算与苏俄建立联系，并允许共产党员和社青团员加入国民党。5 月上旬，孙中山下令北伐。正当北伐部队兵分三路直取江西的时候，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竟然同直系军阀吴佩孚暗中勾结，于 6 月 15 日深夜发动叛乱，悍然炮击大总统府。孙中山不得不于 8 月 10 日离开广州，14 日避到上海。回想起辛亥革命后十一年来自己领导的“二次革命”、“护法运动”都告失败，眼下国民党又纪律涣散无所作为，他忧心如焚，一筹莫展。正在这时，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23 日，李大钊从北京来到上海会见孙中山，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种种问题。24 日，越飞从北京派遣一名军事随员到上海求见孙中山，策划合作事宜。25 日，马林作为越飞的代表，在上海再次与孙中山会谈，孙中山欣然接受他的多项建议：与苏俄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改组国民党；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以实现国共合作。

就在这时，中共中央杭州西湖特别会议之后，李大钊再次到上海会见孙中山。孙中山对李大钊十分尊敬，当时邀请他加入国民党。李大钊欣然同意，为了避免日后发生误解和矛盾，他坦然地说：“我是第三国际的一个党员……”没等他说完，孙中山立即爽快地表态：“这不打紧，你尽管一方面做第三国际的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于是，李大钊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主盟最先加入了国民党。接着，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张国焘等一批共产党人也以个人身份陆续加入国民党。

从 1922 年 9 月上旬起，孙中山着手进行改组国民党的准备工作。9 月 4 日，他亲自主持会议研究改组计划，指定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九个人组成国民党改组委员会。11 月 15、16 两日，他连续召集会议研究起草国民党改组宣言及党纲、党章。1923 年 1 月 16 日，孙中山组织的军队赶走了陈炯明，夺回了广州。17 日，越飞到达上海，与孙中山进行了多次会谈，26 日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1 月下旬，国民党重新推选中央干部。共产党人林伯渠被推举为总务部副部长，协助孙中山办理改组事务。2 月，孙中山回到广州，改组的准备工作逐步展开。3 月 1 日，孙中山组成临时政府性质的大元帅府，在苏联政府驻广州代表鲍罗廷的具体帮助下加快了国民党的改组步伐。5 月 1 日，他接受苏联提供的 200 万金卢布援助作为活动经费，8 月中旬派蒋介石为团长，张太雷、沈玄庐、王登云等为团员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到苏联考察党务和军事。10 月 25 日，孙中山委托廖仲恺、邓泽如在广州召开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讨论改组计划；同时委托于 9 月聘请的政治顾问鲍罗廷执笔起草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和《党纲》、《党章》草案。11 月 12 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这篇《宣言》，公布了这两个“草案”。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正确决策遭到了国民党右派的反对和破坏。1923 年 11 月 29 日，邓泽如、林植勉等 11 人以国民党广东支部的名义上书孙中山“弹劾”共产党，孙中山一一进行了批驳。呈文说：国民党“组织法及党章、党纲等草案，实多出自俄人鲍罗廷之指挥”，“唯探闻俄人替我党订定之政纲政策，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孙中山对此批语：“此稿为我请鲍君所起，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之为汉文，陈独秀并未与闻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呈文又说：政纲政策中“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标

语”，“则我党永无获得国际上同情之一日”，“务使国中实力派因此而与我党决裂，使我党陷于孤立无援之地。此陈独秀共产党对于我党阴谋之纲领也”。孙中山对此批语：“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尝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吾党。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及受屈之国家及受屈之人民耳。”12 月，孙中山邀请李大钊到广州帮助工作。

1923 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工人运动处于低潮之后，共产党的主要负责人陈独秀虽然认识了国共合作的必要性，但转而产生了右倾思想，认为“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独立性此时是鬼话”，甚至提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6 月 12 至 20 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主要议程是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会上着重批评了张国焘等怀疑国共合作的“左”倾观点，肯定了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改造国民党的可能性。同时也批评了陈独秀等的右倾观点,决定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 11 月 24 至 25 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三届一中全会，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 5 月给中共中央指示信的精神，进一步解决“三大”尚未涉及的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问题、农民的土地革命问题和在政治上改造国民党的问题。12 月 25 日，中共中央向各地方党组织发出通告，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积极帮助国民党改组。这时候，李大钊已经到达广州，帮助孙中山筹备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4 年 1 月 20 至 30 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主持会议。实际到会的 165 名代表中，有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瞿秋白、林伯渠、于树德、王烬美、李维汉、李立三、夏曦等 23 名。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瞿秋白和鲍罗廷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22 日大会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由于少数反对国共合作的人在会上制造障碍，推迟了《章程》的表决。28 日，又有人提出明文规定“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的提案，意在反对共产党的“跨党”。为此，李大钊以北京代表名义发表《意见书》说：“我们加入本党……是想国民革命运动而有所贡献于吾党”，“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那种对共产党人的“猜疑防制，实为本党发展前途的障碍，断断乎不可不于本党改造之日明揭而扫除之”。廖仲恺等多数代表支持李大钊的声明，指出共产党之加入国民党，“是本党一个新生命”，“是与我们同做国民革命工夫的”。结果，大会否决了不得“跨党”的提案，通过了新党章。这次代表大会正式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把国民党改造成了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大会选举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24 人，其中有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 3 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17 人，其中有共产党员毛泽东、张国焘、韩麟符、于方舟、林伯渠、沈玄庐、瞿秋白 7 人。1 月 31 日，孙中山主持召开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组织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即中央党部。会议推选的 3 名常务委员中有共产党员谭平山；在确定的 7 名中央部长中有两名共产党人：谭平山任组织部部长，林伯渠任农民部部长。

至此，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正式告成。国民革命迅速出现了一个崭新局面。

冯玉祥驱逐溥仪离故宫

1924 年 9 月中旬，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经过两年多时间积极备战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乘直、浙军阀齐燮元、卢永祥之间的江浙战争激烈进行的时

机，挑起了第二次直奉战争。10 月 19 日，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联合援军第二路司令胡景翼秘密回师北京，在京畿警备副司令孙岳的策应下，发动北京政变，22 日夜晚到 23 日清晨，没费一枪一弹便占领了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将自己和胡景翼、孙岳的部队定名为中华民国国民军，不仅把“贿选总统”曹锟赶下了宝座，而且把退伍清帝溥仪赶出了故宫。

11 月 3 日，国民军将原故宫景山的守卫部队缴械，集中到北苑听候改编，引起清室极大的惶恐。清室便暗中与外界联系，谋求对策。少数保皇党人见北京局面混乱，也乘机活动。一时间，清帝复辟的谣言纷纷四起。警备总司令鹿钟麟得知这些情况后，立即报告冯玉祥和摄政内阁的代理国务总理黄郛，并且指出，驱逐溥仪，须从速进行，如若迟延，恐生变故。于是，黄郛连夜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将 1912 年 2 月 12 日清帝宣布退位时南京临时政府与袁世凯共同拟定并公布的《关于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加以修改并讨论通过，同时筹组清室善后委员会，以处理溥仪出宫后的有关事宜。

原优待条件中写有清帝退位后尊号不变，民国政府待以外国君主之礼；国民政府支付清帝岁用 400 万两；清帝退位后暂居宫禁，侍卫人等照常留用；王公世爵仍其旧等条款。1915 年 12 月 12 日袁世凯称帝时，清室惶恐不安，准备让出故宫，迁往颐和园。为了安抚清室及散处各地的前清遗老，袁世凯于 16 口在原优待条件文本上亲笔签批‘所有优待各节无论何时断乎不许变更容当列入宪法”等字。袁世凯如此回护清室，为封建复辟留下了一条祸根。1917 年 7 月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等北洋政府头目都照样维护清室“小朝廷”，遂使故宫成了国中之国。在故宫里，溥仪仍旧发布“上谕”，仍用宣统年号纪年，遗老遗少仍行跪拜大礼。民国总统每当新旧接替，新总统还要派遣专使以对外国君主之礼向溥仪递交“国书”。1922 年 12 月 1 日溥仪结婚，迎娶仪仗队出神武门经东华门在北京街道上吹吹打打。军警宪机关派来骑、步兵 2000 多人壮威保护，所经街道实行戒严，马路两边人山人海。北洋政府及外籍人员参观，每人领一枚铜质徽章才可通行。3 日上午举行“受贺礼”，溥仪接见外国使节后，又坐上宝座接见曹锟操纵的代总统黎元洪派遣的致贺专使，贺礼红帖上竟写着“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赠宣统大皇帝”。凡此种种，使国内外舆论哗然。

眼下京城流播清室复辟谣言，如不及时采取果断措施，不仅会使局势更加混乱，而且会使冯玉祥陷入政治被动局面。黄郛主持修改后的清室优待条件是：“一、大清宣统皇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一切权利。二、自本条件修改后，民国政府每年补助清室家用 50 万元，并特支出 200 万元开办北京平民工厂，尽先收容旗籍贫民。三、清室按照原优待条件，即日移出禁宫，以后得自由选择居住，但民国政府仍负保护责任。四、清室之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民国酌设卫兵妥为保护。五、其一切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当归民国政府所有。”紧急内阁会议将这个清室优待条件通过后，当即决定由北京警备总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会同社会知名人士李煜瀛前往故宫执行。

5 日早晨，鹿钟麟、张璧、李煜瀛会商执行步骤。张璧说：“这是一件大事，需要带多少军警？”鹿钟麟说：“军警各 20 名就够了。”商议就绪，先将故宫军警布置妥当。并将电话线割断后，就率领军警各 20 名进神武门。每通过一道门，就分派军警监视原故宫的值岗卫兵，不许走动。鹿钟麟、张璧、李煜瀛 3 人径直前往溥仪的住所。

这时清室正在开“御前”会议，由内务府大臣绍英出来迎接。鹿钟麟拿出国务院通过的修改优待条件给绍英阅览，并告知来意，请他转达溥仪立即移出宫外。绍英虽然惊慌失措，但是仍旧故作镇静，并指着李煜瀛说：“你不是故相李鸿藻的公子吗？何忍出此？”李煜瀛笑而不答。绍英又指着鹿钟麟说：“你不是故相鹿传霖的本家吗？为什么这样逼迫我们？”鹿钟麟回答说：“你要知道，我们来此执行国务院的命令，是为了民国，同时也是为了清室。如果不是我们，那就休想这样从容了。”绍英又说：“我大清入关以来，宽宏为政，没有对不起百姓的事，况优待条件尚在，怎么能够这样办呢？”鹿钟麟反驳说：“你这是替清室说话。可是，满清入关以后的‘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老百姓是永远忘不了的。况且张勋复辟，颠覆民国，优待条件早为清室所毁弃。当时全国军民一致要求严惩复辟祸首，到现在还是一个悬案。最近摄政内阁成立，各方又纷纷提出惩办复辟祸首的要求，群情愤激，就要直接采取不利于清室的行动，现在宫内外已布满军警，其势汹汹，就要动手，如果不是我们劝阻他们稍停片刻，现在就出了乱子了。”

绍英不得已，才进去转告溥仪。但是往返数次，仍然希望有所转圆。鹿钟麟见事情不能迅速解决，于是大声对随从人员说；“告诉外边，事情还在商量，先不要开炮放火，再延长 20 分钟。”溥仪听到这话，胆颤心惊，立即答应迁出故宫，随即交出印玺，收拾私物，在鹿钟麟、张璧、李煜瀛的监视保护下，。一同离开紫禁城，到后海甘水桥他父亲载沣的醇亲王府故宅居住。宫中太监、宫女都任其自由迁出宫外，回到民间。至此，大清皇帝不复存在了。

溥仪被逐出宫，清室的宗亲旧臣们如丧考妣，痛哭流涕。连北京大学的年轻哲学教授胡适也在当天致函摄政内阁外交总长王正廷对政府“提出几句抗议的话”，认为这是“欺人之弱，乘人之丧”，“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还亲赴醇亲王府向溥仪表示慰问，声称这“是东方的野蛮”。住在天津的段祺瑞第二天也致电冯玉祥表示大为不满。

但是废除溥仪尊号，令其出宫一事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和社会舆论的普遍赞扬。溥仪迁出故宫的第二天，北京全城悬挂五色国旗进行庆贺。社会名流章炳麟致电黄郛等人，誉为“第一功”。孙中山也于 11 日致电冯玉祥，认为“复辟祸根既除，共和基础自国”，并接受冯玉祥 10 月 25 日、11 月 1 日的两度电请，于 11 月 13 日离开广州，绕道日本北上，12 月 4 日到达天津，不料当晚肝病发作，31 日扶病入京。1925 年 3 月 12 日，这位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驱因肝癌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

被逐回醇亲王府故宅的溥仪，在前清遗老和帝国主义分子的诱惑下，于当月 29 日逃往东交民巷日本公使馆；1925 年 2 月 24 日又由日人护送潜往天津，寓居日租界的张园。北京知识界组织的“反对优待清室大同盟”，25 日发表宣言指出，倘溥仪有扰乱国民之事，日本须负相当责任。事实上从这时起，溥仪已堕落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为在我国实施侵略计划而储备的重要工具。

北伐战争

北京政变后，在奉、皖系军阀和国民军三方共同扶持下，成立了以皖系头子段祺瑞为总执政的北京临时执政府。他同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勾结在一起，到处压迫国民革命运动，屠杀工人群众，封闭民众团体，摧残人民的自由。

中国军阀的特色是以帝国主义列强为后台，拥兵殃民，扩充地盘，横征暴敛，互相厮杀，使大半个中国处在最黑暗的统治中。国共合作建立的广东国民政府就成了中国国民革命唯一的根据地。

1926 年 1 月，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努力下，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共产党员占代表人数五分之一，大会选出的 60 个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有李大钊、毛泽东等 17 人。在这次大会上确定了反帝反军阀的北伐方针。中共中央于 2 月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确定党的任务是全力领导和支持北伐战争，“不仅是在广东作军事的准备，更要在广东以外北伐路线必经之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处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虽然在以后的 3 月到 5 月，发生了一些国民党右派和投机革命的资产阶级政客针对共产党人的叛逆事件，但全国工农运动在共产党掌握之中，仍在迅猛发展，北方军阀又威胁着广东革命，资产阶级右翼力量还不足以控制革命的进程，在全国人民高呼北伐的声浪中，他们或收敛，或伪装，仍然留在统一战线之中。

在中国共产党推动下，5 月，国民政府派遣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从广东肇庆出发，向湖南挺进，并派第七军一部分增援。6 月 5 日，国民政府召开会议，颁布出师北伐动员会，并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 月 1 日，国民政府发布北伐宣言。7 月 9 日，十万北伐军分三路从广州誓师出发，北伐战争正式开始。

北伐军出征时分为八个军，其中李济深任军长的四军、李宗仁任军长的七军、蒋介石任军长的一军、唐生智任军长的八军四个军军力最强。北伐军集中第四、第七、第八三个军首先正面主攻湖南、湖北，以图打倒对广东政府威胁最大的吴佩孚。

在湖南战场，北伐军受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群众的全力支持，他们组织运输队，侦察敌情，担任向导，甚至组成武装组织直接配合北伐军作战。北伐军在湖南势如破竹，进展神速。7 月 10 日，第四军开始进攻醴陵，担任左翼进攻的叶挺独立团在工人、学生组织的平民救国团和农民武装队的协助下，在泗汾桥附近与两千余敌人激战 6 小时，攻占泗汾桥，扫除了外围敌人。同时，十二师和十一师一部也占领沈潭、楚东桥，在铁路工人的配合下，切断株萍路，完成对敌包围，醴陵旋即被迅速攻占。醴陵既丢，长沙失去屏障，守敌叶开鑫弃城逃走，湖南省工团联合会组织两千余人的保安队，12 日迎接北伐军进驻长沙。8 月 19 日，北伐军第四、第七两军发动平江战役，第四军担任主攻。独立团和四军另一部渡过汨罗江，沿山间小道迂回包围敌人，出其不意地全线出击。当北伐军发起总攻时，“农民军即大举帮同围攻，冒弹冲锋，勇猛登山，……毙敌甚多”。敌溃不成军，第五十混成旅旅长陆澐兵败自杀，北伐军占领平江。8 月 21 日北伐军由农民作向导，从平江北乡渡过微水，直抄敌人重兵布防的南攻北守的要地岳阳背后，敌军猝不及防，在北伐军前后夹攻下，全线溃败。22 日，岳阳攻克。至此，仅一个半月，北伐军穿越湖南，进入湖北作战。

进入湖北，北伐军锋头直指武汉。吴佩孚急忙率领部分主力，星夜赶到武汉坐镇，决心死守鄂南门户汀泗桥。汀泗桥是粤汉线上的天险，三面环水，一面背水，只西南端有一线铁路通行。吴佩孚在此布置精兵二万余，修筑坚固的防御工事，组织大刀队临阵督战，要与北伐军在此决一死战。8 月 26 日，北伐军第四军六个团向汀泗桥发起进攻。由于地形不利，加之敌军炮火猛烈，

四军伤亡极大，一天一夜攻击未果。27 日，叶挺独立团请战获准，在当地农民引导下，抄小路插到敌军右翼，占领制高点。独立团战士如下山猛虎，浴血奋战，冲过铁桥突破了敌人的坚固阵地。北伐军各路部队乘势左右配合、前后夹击，守敌全线动摇，一片混乱。吴佩孚令大刀队斩杀退缩不前的旅、团、营长多人也无济于事，他只好随溃兵退逃贺胜桥。独立团乘胜追击，神速地拿下了咸宁城。

吴佩孚退守贺胜桥，妄图挽回败局。他下令将一个临阵脱逃的旅长杀了，把头悬在桥上，以此督战。28 日，北伐军开始进攻贺胜桥。经过两天异常惨烈的拉锯战，30 日凌晨，北伐军开始总攻。叶挺独立团一马当先，数度肉搏战后，最先突破敌人防线。在北伐军左、中、右三路的包围夹攻下，敌军开始退却。吴佩孚急红了眼，见到败退下来的军官，就让执法大刀队在阵前斩首，一颗颗人头挂上贺胜桥头。败退士兵见此，索性向执法队冲杀过来。吴佩孚见大势已去，跳上火车溃逃武汉。

9 月 1 日，北伐军兵分三路向武汉三镇进军。左路第八军攻汉阳；右路第七军取汉口；中路第四军直扑武昌。左路军占领汉阳附近的黑山后，汉阳炼钢厂工人与之配合，迫使敌刘佐龙部宣布起义，6 日汉阳克服。7 日，右路军在汉口工人、市民配合下占领了汉口。武昌是吴佩孚派三万余主力把守的军事重镇，敌人妄图“依洪山之险，作困兽之斗”。中路北伐军从 3 日至 6 日，组织敢死队多次进攻武昌，敌人依仗高墙重炮，负隅顽抗，不少优秀的北伐军官兵牺牲在武昌城下，其中包括叶挺独立团的许多共产党员。北伐军在久攻不克的情况下，依靠粤汉铁路工人和矿山工人的协助，一面采用地道攻城法，一面以重炮轰击，于 10 月 10 日再次总攻武昌城。独立团冲锋在前，率先攻入城内，占领蛇山炮台，守敌纷纷投降缴械，刘春云等敌军主帅被活捉。武汉三镇被克复，吴佩孚败走信阳，从此一蹶不起。

与此同时，北伐军第二路二、三、六军在江西战场与孙传芳的主力作战。赣南赣西被很快占领，而在赣北、南昌、德安、九江等地，北伐军与孙军主力发生激战，其中以南昌争夺最为激烈，北伐军两进两出，得而复失，江西战场形成对峙局面。武昌攻克后，北伐军第四、第七军主力移师江西。北伐军重兵压境，孙传芳内部分化；浙江省长倒戈，江西前线的浙军被迫调回；福建的孙军内乱，孙传芳后方动摇。11 月 2 日，北伐军在江西战场发起总攻，只七天，孙传芳主力在江西战场被歼殆尽。11 月 8 日，北伐军再克南昌，孙传芳潜逃南京。

由于孙传芳在江西的失败，浙江的倒戈，福建敌人内部分崩离析，倒戈的倒戈，逃跑的逃跑，北伐军第三路一军不战而下福州。随后，北伐军主力于 1927 年 1 月转向江苏、浙江、安徽作战。24 日，占领南京。同时，北伐军东路军抵达上海附近，敌海军宣布反正，北伐军占领松江。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于 3 月 21 日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打垮敌上海防守军毕庶澄部，彻底结束了直鲁军阀在上海的统治。至此，北伐军占领了长江以南半个中国，北伐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血腥的背叛

北伐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形形色色的军阀，最终矛头则是指向帝国主义的在华势力。国民政府建立伊始，便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否定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种种特权。这引起帝国主义列强十分仇视。在中国革命运动达到高潮时，他们从后台跳出来，直接以武力镇压中国人民

的革命：1926 年 9 月，英国军舰向到达武汉的北伐军开炮；英国军舰闯入广州内河，派兵登陆，抓捕工人纠察队，向广东国民政府挑衅；9 月 5 日，英帝国主义在四川制造骇人听闻的“万县惨案”，打死打伤中国军民五六千人；1926 年 1 月，英国水兵在汉口江汉关用刺刀对付庆祝北伐胜利的集合群众，酿成惨案。同月，英国水兵又在九江枪杀声援武汉人民的中国工人。愤怒的中国人民忍无可忍，强行收回了这两地的英国租界。英帝国主义恼羞成怒，立即派遣大批军舰来华。美、法、日、意、比、荷、西七国，也把军队和舰艇开到上海。集结在黄埔江的外国军舰一时达 125 艘，军队 3 万余人准备随时登陆，大有重演八国联军侵华之势；1926 年 3 月，北伐军占领南京。英、美、日、法、意等帝国主义国家军舰，竟开炮轰击市内和平居民，造成死伤 2000 多人的大惨案。

帝国主义列强一面在中国制造一连串暴行，血腥屠杀中国人民，武装干涉中国革命；一面开始处心积虑地寻找在中国的代理人。这个人让他们找到了，他就是蒋介石。

蒋介石名中正，原名瑞先，学名志清，浙江奉化人。他早年就学于北洋军阀的保定军官学校，留学日本时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依附沪军都督陈其美。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确定三大政策时，他伪装拥护，骗取了孙中山的信任，1923 年 8 月被派往苏联考察学习，1924 年 5 月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1925 年 8 月 20 日廖仲恺被刺后，他乘处理廖案之机攫取了广东的军政实权，接连就任广州卫戍司令、新组编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涉嫌廖案的粤军首领许崇智被逐出境后，蒋介石又把许崇智的军队解散、收编，归他的第一军指挥；在 1926 年 1 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二届一中全会上，“一大”时连代表资格都没有的蒋介石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和常务委员，后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监。在北伐战争开始时，他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 1926 年 7 月 9 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举行北伐誓师典礼的当天，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成立，由蒋介石制定、国民政府颁布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规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出征动员令下后，即为战争状态，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民、财政各部机关均须受总司令指挥。至此，蒋介石实现了他集军、党、政权于一身的图谋。

蒋介石为了彻底实现其军事独裁统治的野心，希望得到帝国主义、买办阶级的支持。早在 1926 年 8 月 24 日，他在长沙举行的外国记者招待会上就曾讲过：他是一个国民党党员，不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在广州时就把布尔什维克清除了；他立意保护商业和外国人——明确表示了他反共反苏的政治态度和主张。因此，1926 年冬，蒋介石的总司令部进入南昌以后，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北洋军阀政府官僚、买办阶级政客、国民党右派人物纷纷麇集南昌，出入他的司令部，为他出谋献策。英美支持的江浙财团，以提供巨额资金为诱饵，换取蒋介石投靠英美帝国主义。双方一拍即合，蒋介石迅速“向右转”。

蒋介石要投靠英美帝国主义，就必然要和坚决反帝反封建的中国共产党分裂，就必然要背叛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其实，蒋介石的反共倾向早已在北伐战争前就已暴露出来。1926 年 3 月，他曾策划了“中山舰事件”，污蔑共产党要暴动推翻国民政府；事隔不久，他又抛出了“整理党务案”，排挤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让一批右派占据了领导岗位。很多有远见的共产党人如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看出了蒋介石的祸心，一再主张迎头痛击，并组织自己的武装，以防不测。

可是，中共领导陈独秀却害怕反击会惹恼国民党而退出统一战线。他主张忍耐退让，对蒋介石的挑衅一味妥协，终于使蒋介石等人的气焰越来越嚣张，酿成惨祸。

从 1926 年底开始，反共的歪风就刮了起来。打伤打死工人，烧毁工会办事处，查封农会的事一起接一起，而共产党人手无寸铁，猝不及防，很多人倒在血泊中。一时间，“蒋总司令万岁”，“打倒赤化分子”等口号在各地喊响。

大规模的屠杀是从 1927 年 4 月 12 日在上海开始的。北伐军能够占领上海，还是因为共产党人领导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才顺利成功的。而蒋介石一进上海，却要拿工人开刀。原来，他已经决定公开反共了。这天凌晨 3 点，在白崇禧的指挥下，大批军警和流氓包围袭击了上海各处工会和工人纠察队驻地，封闭工会，缴了纠察队的枪械，枪杀数十人，受伤 200 余人。13 日，20 多万工人罢工，10 万人在青云路广场集会，抗议蒋介石的暴行，要求发还枪支，肃清反革命。会后，他们高呼口号到宝山路的二十六军二师司令部请愿。当队伍走到宝山路附近的时候，从四面的弄堂里突然跑出来一队队全副武装的士兵，用步枪和机关枪对准群众扫射起来。

霎时间，工人们一批批倒下了，后面的队伍很长，无法后退。天下着雨，工人的血和着雨水，流在地上，宝山路成了一条血河……士兵们又冲上前用枪托打，刺刀刺，对赤手空拳的工人大打出手。

这以后，白色恐怖遍布全城，大批工人领袖、共产党员被逮捕杀害。三天之内，就有 300 多人被杀，几千人失踪。蒋介石就这样踏着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的鲜血，走向了独裁的统治道路。

“四·一二”大屠杀以后，蒋介石立即着手组织了南京政府。南京政府发布的第一号命令，就是通缉鲍罗廷、陈独秀等 190 余名知名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

汪精卫一直跟蒋介石不和，1926 年 11 月，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元老派力主在武昌建都，蒋介石则坚持在南昌，后又坚持在南京建都。宁汉两派在长江对峙，大有火并的架式。4 月 2 日汪精卫从德国回到上海，郑重表示：“我站在工农方面！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

并且一再重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不可改变。

“四·一二”以后，以汪精卫、唐生智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通过决议，开除蒋介石党籍，免除他的各种职务，并通电讨蒋，在 20 日誓师继续北伐，同时向南京进攻。

汪精卫的“进步”表现迷惑了中共领导人陈独秀。陈独秀否定了毛泽东等人关于武装工农群众、制止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正确主张，对反革命的进攻节节退让。但是，不久，汪精卫的反共面貌也露出来了，开始限制工农群众运动并排挤共产党人。

7 月 15 日，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下令驱逐、逮捕、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反革命大屠杀使长期对峙的蒋介石、汪精卫终于找到共同点。蒋介石说：“凡是可以杀的一律杀！宁可错杀，不可错放！”汪精卫说：“捉一个杀一个。宁可枉杀一千，不可使一个漏网！”“四·一二”到“七·一五”，宁汉由分裂到合流，大江南北被淹没在革命者的血泊中。

在国民党内部，当时只有宋庆龄、何香凝（廖仲恺夫人）、邓演达等极少数人坚决反对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叛变行径。宋庆龄庄严宣布，脱离国民政

府，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党“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

从此，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的朋友，变成了“非法”，转入了地下活动。各地反共势力都举起了屠刀，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被逮捕杀害。北方的军阀张作霖也与蒋介石配合，逮捕了李大钊，并在 1927 年 4 月 28 日绞杀了这位革命先驱。著名的共产党创始人和领导者陈延年、蔡和森、邓中夏、向警予、罗亦农、彭湃、恽代英、萧楚女、赵世炎、邓恩铭等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等，也先后被捕遇害。

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在蒋介石之流的血腥背叛中，惨遭失败。

南昌枪声

1927 年 7 月 31 日深夜，位于南昌市中心的江西大旅社，灯火通明，热闹异常。全副武装的工人、国民革命军军官和士兵进进出出、风风火火，看似熙熙攘攘，实则紧张有序。他们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醒目标记——脖子上系着一条红领巾。工人们搬出一箱箱轻重武器，列队分发，在红旗导引下，冲进夜幕中。

1927 年 7 月，武汉国民党的公开反共，表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各阶层人民的革命统一战线最终地破裂了。跟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紧密相联系的大资产阶级，篡夺了国民党的领导权，实现了反革命的大叛变。被革命吓慌的民族资产阶级，附和了反革命。昨天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者被看成了同盟者，昨天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和工农大众被看成了仇敌。一时反革命的阴风横扫全国，把中国人民重新推入灾难的深渊。

7 月下旬，正当蒋介石全力巩固其南京政权时，中国共产党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南昌发动一次起义。这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军队多集中在九江和南浔线上。他们是武汉政府东征讨蒋时来到这里的。而南昌的国民党军队只有朱培德的三个团，约六千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军事委员会书记周恩来为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进行起义的筹划和领导工作。7 月 25 日，周恩来在陈赓伴随下由武汉秘密地抵达南昌，住在朱德的寓所。朱德，字玉阶，四川仪陇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15 年在云南参加反对袁世凯称帝复辟的起义，屡建战功，当了护国军的少将旅长。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他毅然抛弃少将军衔和旅长官职，到上海、北京等地寻找中国共产党。而后赴德国，习军事。1922 年在德国认识了周恩来，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6 年底，他根据党的指示，到南昌任军官教导团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长。7 月 27 日，周恩来在南昌大旅社召开前敌委员会，成立了武装起义的总指挥部，具体部署了起义的计划。7 月 28 日，周恩来亲自找贺龙谈话。贺龙，字云卿，湖南桑植人。当时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他的民国初年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英雄事迹，到处传扬。北伐战争时任师长，作战勇敢，威名日著。周恩来向他传达了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关于立即举行起义的决定，并代表前委任命贺龙为起义军代总指挥。又任命叶挺为前敌代总指挥，刘伯承为参谋长。叶挺是北伐军独立团团长，占领武昌后被升为二十四师师长。刘伯承辛亥革命时代从军，1926 年 5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时任军长。起义前夕到南昌，协助前委草拟了起义计划。

此时，由共产党掌握的，能够参加起义的部队有：叶挺指挥的第二方面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贺龙指挥的第二方面军第二十军，均驻九江；朱德指挥的第五方面军第三军军官教导团和南昌公安局的两个保安队驻南昌；第

二方面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由周士第任团长的七十三团和王尔琢任参谋长的七十四团，驻南浔铁路马回岭车站。总兵力共三万余人，在前委书记周恩来的指挥下，已以东征讨蒋名义全部集结到南昌。

在集结起义部队的过程中，叶挺、贺龙部队的南移引起了汪精卫的警觉。7 月 24 日，汪精卫和孙科、朱培德先后从武汉跑到庐山，与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密谋对策。朱培德准备通知贺龙、叶挺到庐山开会，趁机解除他们的兵权，张发奎则以第二方面军名义严令贺龙、叶挺两部集中于德安，企图加以聚歼。25 日，刚刚参加共产党、在第四军任参谋长的叶剑英察觉了这个阴谋，立即与叶挺、贺龙密商对策，决定既不去庐山开会，也不去德安集中，而将部队直接开往南昌。

就在起义的一切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只等总指挥一声令下时，却义碰上了内部的反复。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张国焘两次从九江电告前委，阻止起义。30 日早晨，他和恽代英等亲自到达南昌。在前委紧急会议上，张国焘坚持己见，说拉不过来张发奎就不得起义。由于张国焘的干扰，起义只得推迟。直到 31 日早晨，前委紧急会议继续进行，正当激烈争论的时候，贺龙、叶挺接到了张发奎的通知：命令他们率部返回九江；张发奎将于第二天即 8 月 1 日亲到南昌。在此紧迫情势下，会议决定 8 月 1 日凌晨 4 时起义。当天下午 5 时 30 分，各部队分别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传达这一决定。当天傍晚，贺龙发现自己军中的副营长赵福生已到朱培德驻南昌指挥部的一个团长处告密。他向前委报告了这一突发事件，前委当即决定：从当夜 9 时起，南昌全城戒严，起义时间提前两个小时。

8 月 1 日凌晨 2 时，起义开始。一时间，南昌城里枪声四起，大炮轰鸣，人呼马嘶。贺龙的第二十军一、二两师向旧藩台衙门、大士院街、牛行车站等处守敌发起进攻；叶挺的第二十四师向松柏巷天主教堂、新营房、百花洲等处守敌发起进攻。经 5 个小时的激战，全歼守敌 3000 余人，缴获各种枪械 5000 余支。头天晚上，朱德利用自己曾在滇军任过旅长的关系，按照前委的安排，在“嘉宾楼”请留守南昌的滇军两个团的正副团长赴宴、打麻将，直到起义开始便将他们俘虏。1 日下午，驻马回岭的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七十四两团在聂荣臻、周士第率领下参加起义，在德安歼灭敌追击部队，于 2 日拂晓开到南昌与主力部队会合。接着，起义部队在周恩来主持下进行了整编。部队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由贺龙任代理总指挥，叶挺任代理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长，郭沫若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军，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兼任、党代表廖乾五；第十一军军长叶挺兼任，党代表聂荣臻；第九军副军长朱德，党代表朱克靖。从此，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

南昌起义，使国民党反动派的各个集团大为震惊。南京的蒋介石、武汉的汪精卫都立即调兵遣将“讨伐”起义军。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8 月 3 日至 6 日，起义军先后撤离南昌，取道临川、宜黄、广昌南下，计划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27 日，南下部队打败江西壬田的敌军，进占瑞金。30 日，又攻克会昌，大破蒋介石的嫡系钱大钧部，毙伤敌人甚多，俘官兵 900 余人，缴获 1000 多支枪械和其他许多军用物资，这是起义军南进途中的一个大胜仗。

但在以后转战广东、福建的过程中，屡受挫折，部队损失很大。尤其是进军潮州、汕头的战斗遭受失败，使起义部队力量更加分散。其中一部分部

队在朱德、陈毅率领下，退出广东，转战闽赣，进入湘南，进行游击战争。

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为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武装斗争打响了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正式诞生了。

星星之火

1927 年 8 月上旬的浏阳文家市一带，气焰嚣张的反动民团，到处捕捉被他们认为有“赤化”嫌疑的工农群众和青年学生。这天，他们扣留了一个穿着农民破衫，却留着长发，面带书生气的高个儿男人。民团士兵一时辨别不了他的身份，索性把他和其他被抓的人一块儿押到浏阳县城去。高个儿男人装出走不动的样子，拖在最后面。走到一个四周长满深草的池塘边，他摸出两块银元分给两个押解的民团士兵，请求他们让他歇歇脚，并给他们展示自己磨烂了的脚趾。民团士兵放松了警惕，到前面的树荫下去歇凉，一回头，不见了高个儿男人的身影。民团士兵以为他跑了，四处追了一阵没追着，又强迫当地农民和他们一起在附近一带搜索。其实高个儿男人就藏在池塘的深草里，搜寻的人几次几乎从他头顶上踩过，竟没发现他。直到夜暮降临，民团才沮丧地走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个从他们手里机智逃脱的高个儿男人就是正为组织秋收起义到处奔走的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

南昌起义后，中共中央在汉口举行了“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改组了党中央的领导成员；确定了以武装斗争坚持革命的正确路线。会后，党中央派毛泽东到湖南领导秋收武装暴动。8 月 16 日，中共中央改组了湖南省委。8 月 18 日，毛泽东参加了改组后的湖南省委会议，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讨论和制定了秋收起义计划，成立了秋收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秋收起义的目的，是要彻底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政权；为此，党应当用主要力量来领导武装斗争，用枪杆子推动土地革命。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又决定集中力量发动湘东、赣西各县的起义。

湖南省委会议后，毛泽东和毛泽民、潘心源从长沙到安源。8 月下旬，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暴动地区党的负责人和军事负责人王新亚、蔡以忱等，具体部署了起义计划。决定将中国共产党掌握的湘东、赣西一带武装力量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总指挥卢德铭，师长余洒渡，副师长余贲民。下辖三个团。第一团团长钟文璋，以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为骨干，和平江农民义勇队、湖北崇阳农民自卫军组成，驻江西修水。第二团团长王新亚，党代表张明山，以安源矿警队为骨干，和安源工人纠察队，萍乡、醴陵、安福、莲花农民自卫军组成，驻安源；第三团团长苏先骏，党代表潘心源，以浏阳工农义勇队和原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一部组成，驻铜鼓。三个团合计兵力约 5000 人。当时，还有第四团，团长邱国轩，由原夏斗寅残部组成，在起义中叛变。安源军事会议还决定了起义进军的路线。起义部队的行动计划和进军路线是：一团由修水出发进攻平江，发动平江农民暴动，夺取平江后再向长沙发展。二团自安源进攻萍乡、醴陵，与醴陵、株洲的农民暴动相结合，对长沙取包围形势。三团自铜鼓出发，向浏阳进攻发动浏阳农民四乡暴动。各路得手后，以长沙工人暴动为内应，相机攻克长沙。

1927 年 9 月 9 日，震动全国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了。

起义军分三路。第一路即第二团，九月九日在安源起义，12 日攻克醴陵，

15 日顺利地占领了浏阳城。但因主要领导人（王新亚）骄傲轻敌，未及时撤出浏阳城，结果敌人从长沙、株洲增援，起义部队陷入重围严重失利，在突围中损失三分之二。第二路即第一团，9 月 9 日从修水向长寿街、平江进发，胜利地占领了平江龙门厂。这时收编在起义部队中的土匪邱国轩部叛变，向起义军袭击，使一团腹背受敌，牺牲 100 多人，战斗失利，遂向浏阳方向转移。第三路即第三团，9 月 11 日在毛泽东亲自指挥下，向浏阳白沙镇进发，首战告捷，12 日又占领东门市，连战皆捷。14 日唐生智所部两个团分两路夹攻，起义军受到部分损失，遂分三路向浏阳上坪方向转移。

各路起义部队遭到挫折后，一部分失散了，一部分不坚定分子离开了部队。毛泽东当机立断，决定各路起义部队到浏阳文家市集中。9 月 19 日，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小学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议，讨论部队的进军方向问题。毛泽东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形势，认为占领中心城市已不可能，主张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把革命工作的重点转向敌人统治势力薄弱的农村去，而余洒渡等却否认敌强我弱的形势，顽固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的意见。会议经过讨论，大多数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决定起义部队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军。

9 月 20 日，工农革命军 1500 余人从文家市出发，开始了向井冈山的战略进军。29 日，转战到江西永新县的三湾村，部队已不足 1000 人。由于组织不健全，党不能切实掌握部队，雇佣军队的影响严重存在，加上作战失利，连续行军，斗争艰苦，部队减员严重。为了巩固这支新生的军队，毛泽东在三湾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对部队进行了整顿改编，将部队缩编为一个团；在班、连、营建立党组织，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建立士兵委员会，在部队实行民主制度；对不愿留在部队的，发给路费遣散。在改编后剩下 700 人。10 月 3 日，部队到达宁冈县的古城。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总结了经验教训，着重讨论了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问题。

在这之前，井冈山地区有两支自发的农民武装，一支的首领叫袁文才，一支的首领叫王佐。10 月 6 日，毛泽东在宁冈的大仓村会见了袁文才，说服他跟工农革命军联合。毛泽东赠给袁文才部百十条枪支，并留干部帮他练兵；袁文才则资助工农革命军 700 块大洋，帮忙筹建医院和留守处，并亲自写信给王佐，劝说他也同工农革命军联合。7 日，工农革命军到茅坪，设立了医院和后方留守处。随后，毛泽东率领部队沿湘赣界的罗霄山脉南下，且走且战，行程千里，于 27 日到达井冈山的中心茨坪。从此，就以茨坪、大小五井、茅坪等村庄为根据地的指挥中心和后方，而到井冈山周围的永新、宁冈、遂川、茶陵、于县、桂东、莲花等地不断开展游击战争，扩大根据地。到 1928 年 2 月，秋收起义部队恢复建立了井冈山地区的中共党组织，建设了正规军、赤卫队、暴动队等军事组织，相继建立了工农兵政府，将袁文才和王佐领导的两支地方武装改造编成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为创立井冈山根据地奠定了基础。2 月 18 日，工农革命军一、二两团在赤卫队和群众的支持下，一举攻占宁冈的新城，首次歼敌正规军一个营，俘敌 300 余人，粉碎了国民党朱培德军的第一次“进剿”。3 月，井冈山地区开始了土地革命。

早在 1927 年 10 月上旬，秋收起义部队到达茅坪不久，毛泽东就派何长工去寻找湖南省委和湖南特委打听南昌起义部队的消息。中旬，何长工找到了湖南省委，12 月，到韶关犁铺头会见了朱德、陈毅。而这时，南昌起义部队早被敌人打散两个多月了。原来 9 月 18 日，从长汀出发的南昌起义部队通

过闽粤边界后，出敌不意地占领了广东的大埔、松口、三河坝地区，前委即进行分兵：由朱德率第九军团和第二十五师留守三河坝；总指挥部率主力继续向潮州、汕头进军。9 月 23 日、24 日，主力部队分别占领了潮州、汕头，前委又进行分兵：以第二十三军第三师率两个团和政治保卫处警卫团留守潮州、汕头；参谋团率主力继续西进，计划攻取惠州。这时，两广军阀李济深、黄绍纮调集重兵，对已分成四处的南昌起义部队分头发起进攻。9 月 28 日至 29 日，进发惠州的部队在分水村的战斗中伤亡官兵 2000 余人，无力再战，退到普宁县的流沙镇同首脑机关会合。10 月 3 日，南昌起义前委在流沙镇召开会议，与会者有周恩来、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张国焘、贺龙、叶挺、刘伯承、聂荣臻、郭沫若等二十余人。会上，周恩来总结了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并确定了今后的行动方针：武装人员向海陆丰撤退，作长期革命的准备；非武装人员不愿留的，就地分散；革命委员会则去掉国民党的头衔，分散各省活动。当天下午，起义军主力走到乌石圩遭敌人伏击，第二十军的第一、二两师已过乌石圩，而总指挥部和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则被敌军割断，终至溃败。这时，身患重病的周恩来力撑危局，安排起义军领导人由海口转往香港、上海等地。留守汕头的起义军在击退敌人后，西进乌石圩、与主力会合。10 月 3 日下午遭伏击时，经过激战，一部分冲出重围，进入海陆丰地区，与当地农民起义武装相结合。留守潮州的起义军英勇抗击敌人的进攻后，四五百人突围到饶平。留守三河坝的起义军在朱德、陈毅的指挥下于 10 月 3 口胜利突围，在饶平附近与潮州突围的部队会合，总共约 2500 人，迅速退出广东进入湘粤赣边区开展游击战争。

10 月下旬，朱德率领部队到达江西安远天心圩。此时队伍思想混乱，大量官兵离队，朱德着手进行整顿。他在全体军人大会上讲了革命必胜的道理后激情地说：“ 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愿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 ”陈毅也激励大家说：“ 只有经过失败考验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 ”此后经过几次整顿，部队虽只 900 余人，但士气旺盛，团结一致，革命坚决。这个月部队到达江西信半时，朱德、陈毅从中共赣南特委处得知毛泽东带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11 月间在崇义、上犹地区打游击时，便派毛泽覃前往井冈山与毛泽东联系，12 月就在韶关的犁铺头迎接到了毛泽东派来的何长工。

1928 年 1 月，何长工回遂川向毛泽东报告会见朱德、陈毅的情况时，朱德、陈毅的部队已由韶关开往湖南宜间，在中共湘南特委，宜章、彬州、资水、永兴、耒阳县委及五县农军的配合下，于 1 月 21 日发动了著名的“ 年关暴动 ”。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暴动武装便改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并组建宜间农民自卫军。3 月，毛泽东、何挺颖等率工农革命军前往湘南，4 月下旬，听说湘南暴动失败，毛泽东立即派毛泽覃与朱德、陈毅联络，并将自己所率的部队分为两团，从左右两翼堵住追敌，掩护朱德、陈毅率领的主力部队 2000 余人及湘南农军 8000 余人转移。4 月 28 日，两支英雄的部队在江西宁冈的砻市胜利会师。5 月 4 日，砻市广场人声鼎沸，红旗招展，隆重举行会师大会，正式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政治部主任陈毅，参谋长王尔琢。全军下辖三师九团，总兵力约万余人。不久根据中共中央 6 月 4 日来信的指示精神，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

这颗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经过此后五六年时间的迅猛发展，便形

成了蔓延全国的熊熊燎原之势。

皇姑屯事件

1928 年 4 月 5 日，新军阀蒋介石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在徐州誓师，对以张作霖为首的北方旧军阀举行“第二次北伐”。9 日，第一集团军发起全线进攻。30 日，各路蒋军对济南发起总攻。这天夜晚，张宗昌率残部弃城北逃。5 月下旬，蒋军已逼近京津地区。盘踞北京的“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见大势已去，在 6 月 2 日发出“出关通电”，宣布退出北京回东北。

张作霖早年在日俄战争中曾为日军效劳，后当上奉军首领，把日本帝国主义当作靠山，但他又让英美帝国主义在东北享以种种特权，平时同他们也有来往，其用意昭然若揭：逐渐摆脱日本人的控制。对此日本人早已不满。

在张作霖打算撤兵回东北之前，日本人就紧锣密鼓地开始实施抛弃张作霖、进而直接控制东北的阴谋。他们首先劝他“隐退”，遭到张作霖的拒绝。接着威胁说，日军要解除他的武装。与此同时，日本人四处调兵遣将，抓紧控制东北各战略要地，等待时机下手。

张作霖离京回东北，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佐已经为他布下“必死之阵”，在距沈阳一公里半的皇姑屯火车站附近的桥洞下放置了三十袋炸药及一队冲锋队。尽管张作霖行前曾接到部下的密报，说“老道口日军近来不许人通行”，希望多加防备，张作霖也三次变更启程时间，以迷惑外界，但他并未料到会有此杀身之祸。

6 月 3 日晚 6 时，张作霖离开北京大元帅府，乘坐由奉天迫击炮厂厂长沙顿驾驶的在英国制的黄色大型钢板防弹汽车，奔往火车站。随行的有靳云鹏、潘复、何丰林、刘哲、莫惠德、于国翰、阎泽溥、张作霖的六姨太太和三儿子张学曾、日籍顾问町野和仪我等人。张作霖的专车 22 节，是清朝慈禧太后用过的“花车”，装饰非常华丽，他乘坐的 80 号包车在中间，包车厢后是餐车，前边是两节蓝钢车，里头坐着潘复、刘哲、莫德惠、于国翰等人。专车前面还有一列压道车作前卫。晚上 8 时，专车从北京车站开出。深夜，列车风驰电掣地开到山海关车站，黑龙江督军吴俊升专程在这里迎候。

4 日清晨，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很早就起了床，登上住房屋顶用望远镜朝三洞桥瞭望。5 时 23 分，当张作霖乘坐的专车钻进京奉（北京至沈阳）铁路和南满（吉林至大连）铁路交叉处的三洞桥时，日本关东军大尉东宫铁男按下电钮，一声巨响，三洞桥中间一座花岗岩的桥墩被炸开，桥上的钢轨、桥梁炸得弯弯曲曲，抛上天空，张作霖的专用车厢炸得只剩一个底盘。吴俊升炸得血肉模糊，头顶穿入一个大铁钉，脑浆外溢，当即死亡；张作霖被炸出三丈多远，咽喉破裂；日籍顾问仪我满面是血，抱头大叫；校尉处长温守善被埋在碎木下面；周大文炸破了手，六姨太太炸掉了脚趾头；莫德惠也受了伤。

奉天省长刘尚清闻讯赶到现场组织救护。张作霖被送到沈阳“大帅府”时已奄奄一息，军医官抢救无效，于上午 9 时 30 分左右死去。死前张作霖对卢夫人说：“告诉小六子（张学良的乳名），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我这个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沈阳。”说完就死去了，时年 54 岁。

炸车后不久，日本人先后制造了奉军军车脱轨事件和沈阳炸弹案，企图引起混乱。6 月 16 日，1 万 8 千余名日军士兵又在沈阳城南演习，竟然唱着“南满是我们家乡”的歌曲，暴露其占领东北的图谋。

为防止日军乘机举动，奉天当局决定对张作霖的死密不发丧，发表通电

称：主座“身受微伤，精神尚好”，“省城安谧如常”。大帅府邸依然灯火辉煌，烟霞阵阵。杜医官每日仍按时到府上班，填写病案。厨房每日三餐仍按时送饭进去。家人一律不啼哭，不戴孝。日方天天派人“慰问求见”，都被“婉言谢绝”。主持家政的五夫人浓妆艳抹，与前来窥探虚实的日本太太们从容周旋。同时，奉天当局下令全城戒严以稳定局势。由于日军不知道张作霖是否毙命，未敢贸然行动。直至张学良潜回沈阳，才于 21 日公布张作霖死讯。

东北易帜

日本关东军作战主任石原莞曾向日本田中内阁提交一份所谓《解决满蒙问题方案》，说解决满蒙问题是日本生存下去的唯一途径，依靠满蒙的开发，日本的景气自然恢复，失业者也能得到救济。

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的日本人，抓紧其占领东北的步骤。

张作霖被炸时，张学良在河北前线督师，准备对付阎锡山军队的进攻，得知父亲死讯后，他于 17 日化装离开北京，19 日回到沈阳。他与奉军元老张作相商量后，决定于 21 日为张作霖发丧。

发丧时，日本政府故作镇静，假惺惺地派特使林权助前来吊祭，还想乘机拉拢张学良，鼓动张学良在东北独立，建立一个在日本控制之下的独立王国。林权助对张学良说：“满蒙是日本有特殊权益的地方，我们和你必须加强合作。”

为了彻底扭转东北的危难局面，张学良于 7 月 4 日就任东北保安总司令，并打算同南京国民政府和谈。他想试探日本的态度，便让热河的汤玉麟于 7 月 19 日不挂北洋政府的五色旗，而改悬挂南京国民政府青天白日旗。这一天，日本驻奉天领事林久治郎果然找上门来转交了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的警告信。

张学良感到日本政府欺人太甚，国耻家仇不禁涌上心头。

日本并不就此善罢甘休，当后来张学良派莫德惠、王家桢为正副专使到日本祝贺日皇登基大典的时候，日本总理大臣田中义一对莫、王二人说，日本将全力支持张学良东北独立，要莫、王二人当“开国元勋”。

在关内，北伐军已进踞平津，全国大部分地区已经统一在青天白日旗下。8 月 9 日，蒋介石派方本殷到沈阳，劝张学良改五色旗为青天白日旗。8 月 13 日，美国驻华大使马克谟亲自到沈阳，与张学良的代表杨宇霆在美国领事馆里谈判，支持张学良归顺南京，实现全国统一。

张学良已经认识到日本的侵略野心，早就渴望祖国统一，就派出邢仕廉、王维宙、徐祖治三人到北平（这个时候，南京政府已把北京改为北平）商谈在东北易帜、归顺南京政府的问题。东北代表提出：南京政府承认东三省自治，享有人事及其他支配权，南京势力不能直接伸入东三省等作为易帜条件。经过两个月的往返交涉，双方终于达成协议。

10 月 8 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决议任命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28 日，张学良召集的奉天会议决议维持保安司令政策，以不在东北设国民党党部为条件而改旗易帜。12 月 29 日清晨，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东三省自即日起“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统治热河的奉系军阀汤玉麟列名张学良的“易帜”通电，正式宣布从同日起，热河省悬挂青天白日旗，归属南京国民政府。30 日，南京政府根据张学良的推荐，任命汤玉麟为热河省政府主席。31 日，南京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

早在 6 月 15 日，南京国民政府就发表了《统一宣言》，改北京为北平。事实上直到此时——1928 年 12 月 29 日，才勉勉强强弄了个表面统一。

“九·一八”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第二个秋天，一个萧瑟的夜晚。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副司令，年仅 30 岁的张学良，在妻子于凤至和秘书赵一荻的陪同下，前往北平中和戏院观看朋友梅兰芳主演的《宇宙锋》。可是，著名京剧艺术家的精湛表演并没有扫除张学良心中的不安和郁闷。

几天前，南京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要张学良在石家庄会面。两人的专车停靠在一起后，张学良上了蒋介石的车。面临日本政府的侵略行为，蒋介石命令少帅尽可能避免发生任何冲突。蒋介石认为：我们不还手，让他打，在国际联盟里好说话。

张学良时刻担忧着东北领土的完整，担忧着东北父老乡亲的安危。

果然，戏没散场，沈阳发生了事变！

留守沈阳的公署参谋长荣臻打来了紧急电话。他说，是夜 10 时 30 分，沈阳北部柳条沟村（离沈阳 5 华里处）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被炸毁，日本驻中国东北境内的关东军诬称是中国军队为了破坏铁路，企图制造列车颠覆事件，袭击日本守备队而为。于是，日军以此为借口，在铁路被炸不到 5 分钟，突然向中国东北军第七旅的驻地北大营发动炮击和进攻。北大营第七旅王以哲旅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官兵达一万多人，由于被迫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的命令，竟被日本 500 人一举击溃。一夜之间，沈阳全市党、政、军各机关、兵工厂、飞机场、银行等全被日军占领，所有警察、宪兵被缴械，沈阳全市陷落。

日军占领了东北重镇沈阳。同日又占长春、鞍山等 20 座城市，掠地千里。一周之内，辽宁、吉林两省丢失，至 1932 年 2 月 5 日，东三省全部沦陷，三千万东北人民变成日本帝国主义的奴隶。

据日本大阪的《每日新闻》报导，自柳条沟事件后一年多的时间里，被屠杀的中国军民达 2 万多，损失 200 亿元。东三省航空处 300 余架飞机被掠夺一空，金库现金 7000 万悉数洗劫。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挑起侵华战争的开始！这也是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开始。

九月十九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发出布告。布告颠倒黑白，说什么“中华民国东北边防军之一队在沈阳西北的北大营附近爆破我南满铁路”、“袭击日本军守备队”。

事实是怎样的呢？ 9 月 18 日晚上 10 时左右，日本关东军派工兵炸毁了柳条沟村附近的一段路轨，反诬为北大营的中国兵所为。并且贼喊捉贼，在伪满洲国成立之后，还在柳条沟东的铁路旁竖了一块碑，碑上刻着该处即是“九·一八”中国兵破坏铁路的地点。（此碑在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时，被村民们砸了。）

日本政府就这样，自己一手制造了自己被伤害的假事实，来达到大举侵略中国的目的。从那时候起，一支凄切、哀婉、深情、悲壮的《松花江上》在爱国军民中传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九·一八’，‘九·一八’，从那个悲惨的时候，脱离了我的家乡，抛弃那无穷的宝藏，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1931 年 9 月 28 日，九·一八事变后十天，南京和上海的学生在南京国民政府门前集会示威，他们手举各式小旗，迫切求见蒋介石，要他立即出兵抗日。十一月底到十二月初，一万多名大中学生，不顾严寒，组成学生请愿团，从北平、汉口等各地云集南京。他们大声疾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者赶出去！这些学生从 12 岁到 16 岁，年龄不等，前后达 7 万多人次，他们如同一股浩浩荡荡的洪流，冲破军警的阻拦，汹涌翻腾在南京国民党党部、外交部、中央日报社、印刷厂和报馆四周，把抗日民主运动推向高潮。

愤怒的学生痛打了外交部长王正延。在中央军校他们大义凛然，严词责问蒋介石。

蒋介石见势不妙，不得不于 12 月 15 日宣布下野，暂避风头。

1932 年 3 月 9 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宣布脱离中华民国。被日寇强迫挟持到沈阳的溥仪担任执政，并由郑孝胥充当"国务总理"。次日，溥仪根据日本方面提出的名单任命伪"政府"的大官。 1934 年 3 月 1 日，伪"满洲国"改为"满洲帝国"，溥仪改执政为"皇帝"。"国务总理"改为"国务总理大臣"。

伪"满洲国"是个傀儡政权，其政治、经济、国防、交通及通讯都被日本人所控制，关东军司令官是伪"满洲国"的太上皇。日本通过它一手炮制的这个傀儡政权，在东北各地建立庞大的武装机构，推行"治安肃正"、"三光政策"，对东北实行残暴的军事占领。同时，在所谓"日满共存、日满一体"的口号下，对富饶的东北实行疯狂的经济掠夺。

二万五千里长征

蒋介石对日寇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而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却必欲消灭之而后快。

从 1930 年 12 月到 1933 年 2 月,蒋介石先后对江西红军根据地发动四次围剿，兵力从 10 万、20 万逐渐增加到 30 万。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领导红军巧妙地运用游击战或游击性的运动战，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等战术，给蒋介石以沉重打击，取得反围剿的胜利，根据地军民为之雀跃。

1931 年夏毛泽东在"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一词中写道：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这首词正是红军反围剿斗争那壮阔场面生动而形象的写照。

1933 年 10 月，不甘失败的蒋介石在德意美等国军事顾问参与策划下，纠集百万兵力，二百架飞机，自任总司令，发动第五次"围剿"。他们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将红军严密封锁包围，企图一举消灭红军。

红军有前四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中央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深入，各项建设取得很大成绩，经济实力有了明显增强。中央红军已发到 10 万人，民兵赤卫队也有 20 多万人。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抗日反蒋运动不断回升，蒋介石卖国投降政策日益孤立。在这种情况下，取得这次反"围剿"的胜利并非不可能。然而，当时中国共产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领导，排斥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意见，面对优势敌人，采取"全线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冒险战略，硬打硬拼。红军受挫后，又主张"全线防御"，以"堡垒

对堡垒”，这种保守主义的错误方针，让红军与敌人拼消耗，被动挨打，致使红军损失惨重，不断退守，中央根据地及其他根据地相继丢失。

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形势十分危急。1934 年 7 月 15 日，红军发表了《北上抗日宣言》，大多数人认为，北上抗日才是正确的出路。

1934 年 10 月，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共 8 万多人，从闽西长汀和赣南瑞金分二路出发，向西突围转移，开始了举世瞩目的长征。

长征开始后，“左”倾错误领导采取逃跑的做法，加上庞大的机关人员及大批物资，使红军行动迟缓，处处被动挨打。当时，国民党调集大批军队设置四道封锁线，又以重兵分三路前堵后追。英勇的红军战士经过苦战，突破三道封锁线，行军至湘江，面对四十万的国民党军队，“左”倾错误领导命令红军硬拼强攻，双方激战七天，红军渡过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但兵力已减少到三万人，形势十分不利。毛泽东根据蒋介石在湘西、武冈、城步地区布下重兵的情况，提出放弃去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这个建议得到周恩来等人的赞同。这样，红军取得主动，摆脱了绝境，12 月 18 日一举攻克黎平，部队在黎平整编后，向贵州腹地进发，接着强渡乌江，1935 年 1 月，红军攻占黔北重镇遵义。

遵义会议

1935 年 1 月，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长征初期的被动挨打，红军力量遭到的重大损失，加上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失败，使广大党员和红军士兵认清“左”倾领导的错误及其危害，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和出色的军事才能。他们迫切要求改组中央领导机构。

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张闻天、陈云、刘少奇、秦邦宪、邓发、何克全等。刘伯承、李富春、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批评和纠正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左”倾错误，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推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秦邦宪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由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

遵义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遵义会议的召开使全军将士精神大振，在毛泽东部署下：1935 年 1 月中旬，中央红军从遵义出发，一渡赤水，进入川南，准备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由于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张国焘不执行中央命令，不向南逼近而北攻陕南，使蒋介石能抽调重兵在川黔边境布防，阻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川、滇、黔、湘军阀也向中央红军逼近。为争取主动，毛泽东挥戈东指，红军二渡赤水，集中力量攻打贵州军阀王家烈，重占桐梓、娄山关和遵义，在运动中歼敌二十多个团。三月初，红军第三次渡过赤水，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实则折回贵州，在茅台附近四渡赤水，接着南渡乌江直逼贵阳。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令滇军驰援，红军主力却乘虚直插云南，逼近昆明。然后，红军出人意料地折向西北，在五月上旬强渡金沙江。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

以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声东击西，终于摆脱数十万敌军的围堵，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接着，红军沿着川康边境前进，顺利通过彝民区。以惊人的勇气飞夺泸定桥，抢渡激浪滚滚的大渡河，不久，又爬雪山、过草地，冲过腊子口，翻过岷山，进入甘肃。

在越过险峻的六盘山后，红军于 1935 年 10 月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红一方面军转战 11 个省，行军 25000 里，进行了 300 多次的战斗，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1935 年 6 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党中央决定继续北上抗日，但张国焘拒不执行，并率部分红军南下。10 月，竟另立“ 中央 ”，自封为“ 主席 ”，分裂党和红军。执行退却路线的红四方面军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攻袭击，不得不退守在西康甘孜一带，部队损失惨重。

1936 年 6 月，从湖南桑植出发长征的二、六军团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红二、红六军团改编为红二方面军。由于红四方面军的朱德、刘伯承和红二方面军的任弼时、贺龙的坚决斗争，陷于困境的张国焘在中央再三督促下，被迫取消伪中央，同意北上。同年 7 月，红二、红四方面军从甘孜出发，翻雪山、过草地，8 月到达甘南，10 月在甘肃会宁与前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会师。

红军三大主力的会师，宣告震惊世界的红军长征结束。

红军长征在世界战争史上留下空前的光辉一页，正像毛泽东后来说的，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红军长征结束，中国的抗日战争、乃至于中国的历史进程开始了新的局面。

抢过大渡河

长征自始至终经历着艰苦卓绝的斗争，有数不清的惊心动魄的悲壮故事，出现过大批名垂青史的英勇无畏的战士。飞夺泸定桥，抢渡大渡河，就是其中一曲气贯长虹的壮烈战歌。

红军渡过金沙江，顺利通过彝民区后，即发布《关于我军渡过金沙江后方针任务的训令》，《训令》指出，“ 渡过大渡河，进入到川西北地区，遂成为目前战略上的实际要求 ”。

大渡河是著名天险，大渡河两岸山高岭峻，谷深水急，险滩相接，要渡过河难如登天。当年，太平天国的勇将石达开就在大渡河一带被清军打败，饮恨万世。遵义会议结束不久，蒋介石即飞往重庆，策划对红军进行新的围攻。这次，蒋介石更是调集大军在沿河一带集结，利用各种自然条件严密设防，企图把红军消灭在那里，重蹈石达开的复辙。

按照中央的部署，中央红军从冕宁县泸沽分兵两路：主力经彝族地区冕宁县和县境大桥、拖乌等地向石棉县安顺场前进，抢渡大渡河；部分红军经越西县向大树堡和富林（汉源县城）前进，以迷惑和钳制通往雅安大道上正面的敌人。此外，派出部分红军阻击从西昌尾追之敌。

二十四日晚，先遣队红一团在团长杨得志、政委黎林率领下，占领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获渡船一只，控制了安顺场渡口。

当时，蒋介石以薛岳、刘湘等部南攻北堵，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大渡河南，刘文辉集中第二十四军主力由泸定桥至富林沿大渡河筑碉堡，阻止红军北进。刘湘用第二十军主力向雅安、汉源地区推进，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二十五日，占领安顺场的红一团十七名勇士组成渡河奋勇队，在火力

的集中掩护下，乘一条小船强渡大渡河。到下午五点半，第一团已渡过一个营及两个连，但浮桥因水流湍急，直到二十六日仍不能架成，大部队渡河受阻。这时，毛泽东到达渡口，见此渡河困难情况，当即开了个小会，决定红军迅速夺取泸定桥。红一师从这里渡河，到大渡河对岸，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从大渡河东岸北上向泸定桥进军。

安顺场到泸定桥约三百二十里，要求两天半赶到。毛泽东指出，这是一个战略性措施，只有夺取泸定桥，红军大部队才能渡过大渡河，才能避免石达开的命运。

接到命令后，沿大渡河西岸北进的先头团是王开湘团长、杨成武政委率领的一军团二师四团，他们在二十七日早晨从安顺场出发，一路边走边打，二十八日以一天走二百四十里的速度，二十九日早晨六点到达泸定桥西岸。

泸定桥东的泸定城驻有刘文辉一个团，桥头有重兵把守。桥是铁索桥，桥板已全部被拆掉，桥头、河岸筑有防御工事。另外有两个旅的敌军正在向桥头急进增援，企图阻止红军夺桥渡河。红四团在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领下到达泸定桥后，占领桥西，下午四时发起夺桥进攻，二十二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他们冒着敌人猛烈的火力，不顾身下奔腾咆啸的滚滚江水，攀踏悬空的铁索，一面铺门板，一面匍匐射击前进，于下午五时冲过桥去。由对岸来的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的红一师也赶到会合，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敌人被迫向天全方面撤退。红军共俘虏人枪各百余。随后，毛泽东、周恩来带的中央红军大部，从泸定桥上渡过了大渡河。

红军渡过大渡河，使蒋介石妄图利用这天险围歼红军的如意算盘落空，战略上陷于被动。而红军则以坚决迅速的行动，乘势北上，在天全击溃杨森六个旅，一举突破敌人在芦山一带的防线，直指终年积雪、道路险峻的夹金山。

西安事变

1936 年 12 月 4 日，国民党的 40 多位高级将领和政府官员聚集在古城西安。以后的一周里，他们时而全副武装在西关大操场阅兵；忽而又棉袄、长袍，在大饭店里猜拳嬉闹。他们是跟随着他们的头子蒋介石来此密谋对中国共产党的第六次大“围剿”。

不过，蒋介石却没有住到城里的高级宾馆里，他选择了离西安 25 公里远的幽静的东郊——临潼华清池，那儿有一座行宫式的古建筑“五间厅”。

位于骊山脚下的“五间厅”五开间，四周山色含黛，泉水潺潺，慈禧太后在西安避难时，曾在此休憩、沐浴。自然，蒋介石不是来这里休养的，他在这个行辕里召开了几次秘密会议，紧锣密鼓，正背着张学良和杨虎城，打着加速“剿共”计划实施的算盘。

12 月 12 日凌晨二时，凛冽的西北风呼啸着，天寒地冻，四周一片朦胧，喧嚣的西安街市已经沉寂。突然，东北军骑兵第六师白凤翔师长，第十八团列桂五团长、卫队营的孙铭九和王玉瓒分别登上汽车和摩托，沿着去临潼的路向东郊灞桥附近的十里铺急驰而去。

两小时后，临潼华清池二道门前，王玉瓒带领他的部下开始行动，他扣动扳机打响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第一枪。

仅在一个多月前的 10 月 31 日，蒋介石以避寿为名，在河南洛阳度过了他 50 岁的生日。蒋介石吹灭了生日蜡烛，宋美龄把生日蛋糕切开分发给为她丈夫祝寿的军政要员和他们的夫人们。

然而，在这貌似祥和的气氛背后，蒋介石对共产党的仇恨、对抗日救亡运动的压制却变本加厉了。上海、南京、无锡等地不少抗日救国的爱国人士被逮捕，连在国外的文人他都要通缉。震惊全国的“七君子事件”就是在这时由他一手策划的。显然，蒋介石在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政策上越走越远了。

蒋介石过生日前一周，也就是 10 月 22 日那天，他匆匆赶到西安，向张学良、杨虎城发号施令，命令他们向红军发起进攻。

张学良面对国难家仇，对打内战毫无兴趣。在他陪同蒋介石登上华山，举目东望时，思乡之情，油然而来，他悲愤交加，背了几年“不抵抗”恶名，窝了几年被国人误解的闷气在《华山》一诗中尽情而发泄：

偶来此地竟忘归，风影依稀梦欲飞，

回首故乡心已碎，河山无恙主人非。

由于东北军和西北军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蒋介石一向对他们采取歧视政策，他们的待遇不及蒋的嫡系部队的一半，蒋介石的毒计，是让他们在贫瘠的西北与红军互相残杀、两败俱伤，以达到既消灭红军又消灭非嫡系部队的目的。同时，蒋介石还派特务到这两个部队内部进行挑拨离间，妄图分化瓦解他们。

东北军和西北军在进攻红军中，都曾遭到沉重的打击。早在 1935 年上半年，红 25 军在陕南活动时，就消灭了西北军的三个多旅。同年 9—11 月，东北军的一一〇师、一〇九师也先后被红军歼灭。而蒋则在这两个师被消灭时立刻取消了其番号。北平冀察政务委员会负责拨付东北军的 70 万元军饷，宋哲元耍赖不发，蒋介石也置之不理。这又使东北军认识到，继续“剿共”只能消耗自己的实力，绝对没有出路。

1936 年春夏之交，东北军王以哲部一个团在陕北甘泉被红军包围数月，红军没有消灭他们而自动撤离，并劝告他们掉转枪口抗日收复失地。红军对被俘的东北军官兵优礼有加，亲如兄弟，对他们进行团结抗日教育，愿意回去的，就放他们回去，从此，他们更认识到红军是他们的好朋友，决心同红军联合抗日，这种道理也逐渐被西北军所认识。这样，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影响下，在红军前线政治工作的教育争取下，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广大官兵都赞成“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救亡口号，自动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尤其是东北军反响强烈，“打回老家去 ！”成了他们发自肺腑的心愿。

另一方面，自从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就开始向东北军宣传团结抗日的道理。1935 年 11 月，1936 年 1 月 25 日，以毛泽东为首的红军将领分别致书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和全体将士，表明自己愿与任何抗日队伍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主张。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张学良多次与共产党代表周恩来、李克农等直接接触，并达成联共抗日的停战协定。

到了 1936 年冬，蒋介石发觉西北局势变化，但他仍然坚持“剿共”政策，调动 260 个团的兵力，云集陕甘地区，准备对红军大举围攻，还准备撤换张学良、杨虎城，将东北军调到福建、西北军调到安徽，另派他的嫡系蒋鼎文为“剿共”前敌总指挥，胡宗南部到陕西边境，切断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的联系。蒋介石无视抗日大局和民族大义，颁发了对红军的总攻令。

12 月的西安，寒气逼人。然而，这是个经历“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纪念日的月份。9 日那一天，整个西安沸腾了，爱国青年学生和市民一两万人汇集到去临潼请愿的游行示威队伍中，他们愿为救国而牺牲的悲壮豪情，使

张学良激动不已。游行的学生群众自西安步行到蒋介石的驻地临潼，要求蒋介石答应抗日。行至十里铺，蒋介石布置军队，架设机关枪阻拦，并打电话给张学良、杨虎城，命令他们对游行的学生“格杀勿论”。张学良见局势严重，急乘汽车到十里铺，劝学生们回西安。群众高呼：“我们愿为救国而死，我们前进吧！”并有许多人当场悲愤号哭。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张学良看到这悲壮的场面，联想到自己的满腔救国热情被冷落、被拒绝，父死敌手，故土难回，大好河山满目疮痍，作为军人，本应浴血沙场，为国捐躯，效死疆场，如今却背上一个不抵抗将军的“恶名”！国恨家仇，一齐涌上心头，两行热泪不禁汩汩淌下。他用军衣拭了拭泪，镇定了一下，恳切地对学生说：“在一星期内，我准有满足你们心愿的事实答复你们！”

历史性的时刻来到了！

张学良和杨虎城决定扣留蒋介石，逼其抗日，救国家、民族于危难之中。

张、杨捉蒋的原则已定，即对行动细节作了具体部署。

12 月 11 日一天到当天晚上，张、杨部队都分别到达指定位置待命。11 日夜 12 时以后，张和他的高级军官们来到新城杨虎城的住所，进行指挥。

临潼方向的东北军由刘多荃、白凤翔指挥卫队团孙铭九部执行捉蒋任务，以华清池为中心设置包围圈。

凌晨 5 时，蒋介石已经起床，活动活动筋骨后正准备着装。当一阵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震碎了骊山的宁静时，只穿了单薄睡衣连袜子也来不及套的他，慌忙从后院墙头跳了出去。在院墙的另一面，他坠入一丈多深的一条乱石沟中，摔伤了腰和脚。在卫士的搀扶下，他好不容易地向后山爬去。

经过一番搜索，蒋介石在西绣岭虎畔石旁的一个小洞里被发现。

白凤翔和孙鸣九走上前去，看见蒋介石只穿一件睡衣，一只鞋，蜷伏在虎畔石后面，面色苍白，全身哆嗦。白、孙叫蒋起来跟着走，蒋介石起初怀疑是红军，问道：“你们是哪一部分军队？”白、孙答：“是东北军。”蒋介石骤然又神气起来了，表示不愿走，看样子走也有困难。白凤翔脱下自己的皮大衣给他披上，由孙铭九背下山来。走到汽车边，让他上车，他死也不肯上，白、孙勉强将他塞进车内，直驶西安。

与此同时，在西安城内，十七路军解除了军警机构的武装，接管了机场，并拘捕了随同而来的陈诚、卫立煌等数十名国民党高级军政要员。

事变发生后，张、杨提出了八项主张，通电全国，申明捉蒋理由。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三、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确实实行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与此同时，还采取了邀请中共代表参加谈判，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组织“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解散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等重大措施。

惯于发号施令、铁板着脸任意训斥部下的蒋介石，怎会想到在这么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他光着双脚、穿着单裤薄衣、抖动着掉了假牙的苍白的嘴，在他的士兵面前，弓下了腰，慢慢地从小洞里钻出来呢？

他也没有料到， 12 月 22 日，就在他读到《圣经》旧约中的一句话“耶和华现在做一件新鲜事，他将让一个女人保护一个男人”时，宋美龄坐飞机来到了他的身边。

在以后的几天里，中共代表周恩来到达西安，两党进行了谈判，蒋介石与周恩来的会见达成了停止内战的协议。

西安事变，顺天时、地利、人和。西安事变最终得到了和平解决，十年内战停止了，它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创造了条件。

但是，背信弃义的蒋介石，在张学良陪他到南京后，就扣留了张学良。同时，以资送出洋的名义，解除了杨虎城的兵权，后来也把他扣押。1949 年，将他全家杀害于重庆，连九岁幼女也未能幸免。

七君子事件

1936 年 5 月 31 日，宋庆龄、沈钧儒等人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 年 11 月 22 日深夜，救国会七位负责人，沈钧儒、李公仆、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1 月 24 日，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发出布告，宣布他们的“罪行”：“李公仆等自从非法组织所谓‘上海各界救国会’后，托名救国，肆意造谣，其用意无非欲削弱人民对于政府之信仰，近且勾结‘赤匪’妄倡人民阵线，煽动阶级斗争，更主张推翻国民政府，改组国防政府，种种谬说均可复按。”

沈钧儒等七人都是文化界知名人士。他们从事的抗日救亡活动，顺应民心，代表民意。国民党政府罗织的“罪行”，说到底无非只是“谬说”。以言论治罪本身违反法制，何况种种“谬说”未必可以“复按”。

消息传出，全国哗然。北平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李达、许春裳等 107 人；天津文化界、暹罗（今泰国）华侨文化界 200 余人；新加坡全体华侨纷纷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立即释放他们。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等世界名人也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抗议。

北平各大、中学校的学生听到这个消息，特地罢课两天，派出 5 名代表赴南京请愿。12 月 12 日，北平学生举行大示威，高呼“争取爱国自由、释放爱国领袖”等口号。全国许多报纸把他们称为“七君子”，把他们的案件称为“爱国无罪”案。

按照国民党政府法律规定，侦讯时间以两个月为限，必要时可以延长两个月。沈钧儒等七人一身正气，光明磊落，国民党办案人员侦无可侦，讯无可讯，只得延长羁押两个月。1937 年 4 月 4 日，也就是法定侦查期满的最后一天的晚上八点钟，检查官才炮制出了“起诉书”。这个“起诉书”洋洋数千言，东拼西凑地捏造了“十大罪状”。邹韬奋愤怒指出：“故意罗织，入人以罪。”曾任律师的沙千里感慨地说：“我们万不料侦查了四个月之久，起诉书理由竟然如此空洞、歪曲，真是污辱了国家，污辱了神圣的职务。”

“起诉书”出笼，立即引起全国人民的愤怒抗议。宋庆龄、何香凝和各界知名人士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发表“救国入狱运动宣言”，向全世界庄严表示：“中国人民决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夫，爱国的中国人民决不只是沈先生等七个，而有千千万万个。中国人心不死，中国永不会亡。”宋庆龄亲自率领爱国人士，携带写给国民党苏州高等法院的文件，直赴苏州高等法院“请求羁押”入狱，与七君子一道坐牢。国民党政府无可奈何，十分尴尬。

1937 年 6 月 10 日，国民党政府悍然开庭，公开审理此案。那天，法院门口挤满了人群，前来瞻仰七君子风采，对他们表示敬意。法院当局见事不

妙，贴出布告，改公开审讯为不公开审讯。沈钧儒等七名“被告”一致表示：这个案子根本没有秘密审讯的必要，如不公开审理，他们就拒绝答话。他们的律师向书记长传达了他们的意见，同时表示：如果当事人个个缄默，律师也将保持缄默，不发一言。

他们的律师都是来自上海的著名律师，全都是自愿前来进行义务辩护的。因此每人都有三名律师，总共 21 人，组成一个律师团。他们不仅要为“被告”个人进行辩护，更重要的是为保障“爱国无罪”而斗争，为全国人民争取爱国的自由。法院当局无法审理，只得答应“被告”要求，把“被告”家属和新闻记者放进来。

“起诉书”又臭又长，全然建立在诬陷、歪曲的基础上，因此破绽百出，不堪一击。

沈钧儒等七人于 1936 年 11 月 22 日被捕入狱；1936 年 12 月 12 日爆发了“西安事变”。他们不可能与张学良、杨虎城“联络接洽”。“起诉书”却无中生有地把西安事变列为他们的“罪状”之一。法院当局借口救国会曾于 11 月间致电，吁请张学良出兵援助绥远抗战，诬陷他们“勾结军人，图谋轨外行动”，“酿成巨变，国本几乎动摇”。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发表通电提出八项主张，其中第三条为“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这就构成了彼此“勾结”的“证据”。这可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沈钧儒头一个受审，他义正辞严作了回答：“我们发电报给张学良，是为绥远事件共同抗日，同电还给国民政府和傅作义、宋哲元，希望他们一起督促中央抗日。至于拿西安事变的责任加在我们身上，我本人很奇怪，应请审判长传张学良作证。”

邹韬奋也据理进行驳斥。他指着电报说道：“这个电报内容明明说希望张学良‘请命中央援绥抗日’，并非叫他进行‘兵谏’，并同时还打了同样电报给国民政府和傅作义，为什么不说勾结国民政府？为什么勾结国民政府不管，而单问张学良？”

辩护律师接着说：“起诉书中所谓‘勾结’，所谓‘互相联络’，是什么意思。这是双方的事，现在只问单方，怎可判罪？所以无论如何，非向张学良调查不可。”

这无异给法院当局将了一军。西安事变中，蒋介石表示“宽恕”张学良、杨虎城，“既往不究”，可是张学良陪同他返回南京，蒋介石就把张学良软禁起来。怎会让张学良到苏州法院“作证”呢？

审判闹剧演不下去了。不久，爆发了“七七事变”，国民政府于 1937 年 7 月 31 日释放了这七位爱国领袖。

芦沟桥枪声

1936 年 3 月，日本广田内阁上台，立即决定以扩军备战为核心的国策。他们加紧增兵中国，频繁演习，策划对中国的侵略战争。

1937 年 7 月 7 日夜晚 10 时多，宛平城外发出几声枪声，中国守军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二一九团官兵立即警觉起来。没过多久，在高高的城墙外，来了几千日本兵，他们妄称，有一名士兵失踪，赶快打开城门让他们进城搜查。

自打入夜以来，中国官兵已经休息，枪声不会在城内发出，如果让日军进城作什么搜查，一定会骚扰得小城人心惶惶。经过中日双方的交涉商量，决定共同派人员进行调查。

第二天凌晨四时，由中队长清水节郎率领的驻丰台日军河边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约 600 人不顾双方正在协商的事实，径自包围了宛平县城，一阵枪击后，猛烈炮轰芦沟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七芦沟桥事变。

三个月前，日本政府已制订了一些策略和方针，加快了侵华战争的步伐。到了 6 月间，日军在天津的以河边正三为旅团氏的第四旅团，已驻扎在北平、天津、塘沽、秦皇岛和山海关等重要地区，在北平东北方向形成了巨大的威胁。与此同时，在北平北面，伪蒙军已虎视眈眈，西北方向，又被保安队牢牢盘踞着。

为了使北平陷于孤立而后沦陷，位于北平西南仅 15 公里的宛平县，成了日军日夜觊觎的必争之地。而县城西门外永定河上的芦沟桥，则是北平通往南方的咽喉，这就是两个多月来，日军常在芦沟桥附近搞军事演习的原因。他们要在这里不断伺机向中国军队挑衅，寻找得以占领芦沟桥，进而侵略中国的借口。

8 日白天，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亲自在芦沟桥前线指挥部队作战，团长吉星文带领的二一九团士兵警惕地守卫在芦沟桥头的石狮旁。突然间，日军射来一排子弹，排长申仲明不幸牺牲。愤怒的官兵，面对强占阵地的数百名日军，仇恨的烈火熊熊地燃烧。他们挥舞着手中的大刀，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搏斗。这一战，双方伤亡都很惨重。守桥的两个排战士，几乎全都壮烈牺牲在无言而又愤怒的石狮子边。

当日夜晚，忍无可忍的宛平驻军，组成了突击队，在一人多高的青纱帐中，悄悄向日军方向移动。又是一阵你死我活的厮杀，在突击队员的大刀起落里，突击队员们用鲜血和生命收复了失地。

但是，在以后的几次战斗中，二十九军将士虽然英勇作战，顽强抵抗，却由于日军以三路重兵围攻，加上三、四十门大炮，四十架飞机的疯狂轰炸，而我方未能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副军长佟麟阁阵亡了，一三二师师长赵登高牺牲了，平津沦陷。

芦沟桥事变后，蒋介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中日战争开始了。他在 7 月 9 日给二十九军军长的手令上表示：“ 决心全力抗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 ”，中旬还在庐山表示“ 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不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但是事变之初，他的态度仍然是动摇不定的，他还希望由冀察地方行政当局出面，尽可能与日本军方代表协商和平解决。只要不到最后时刻，就采取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

再说宋哲元，作为直接接触敌军的军长，在指挥部队抗击日军侵略的战斗中是很英勇的，他并不甘心屈服于敌人的淫威。7 月 25 日，日本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向他发出最后通牒，让他的部分部队撤至长辛店和永定河西。他拒绝了。

宋哲元军官兵的英勇战斗，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和爱国团体的慰问和支持，还得到了海外侨胞的热切声援，从而又更加鼓舞了抗日前线的将士。

但是，宋哲元与蒋介石也发生过矛盾。1929 年 10 月，他曾经通电讨蒋，被国民党中央和政府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对待抗日，他很果断，“ 九·一八 ”事变后，他通电全国，表示“ 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 ”；对日交涉中，他表面亲善，实际敷衍，“ 绝不屈服 ”。1933 年 3 月，他率部抗日获喜峰口大捷，被称为“ 自‘ 九·一八 ’以来北方战场首次之胜利 ”；但是，在这些出色的战斗背后，宋哲元希望的是保存自己的实力，因此军事上缺乏充分的

准备，但求维持现状。因此，面对日军的强硬攻势，终以平津失守而结束。

随之而来的是 8 月 13 日，日军向上海市区猛烈炮轰，淞沪战役爆发，11 月 11 日，上海沦陷；12 月 9 日，日本政府又发出向南京总攻击的最后通牒，13 日南京失守；紧接着，芜湖、扬州、滁县和杭州，又相继被日军占领。

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战争开始了。

芦沟桥畔的枪声，揭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也是最早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战场。

7 月 8 日，事变第二天，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实行全民族的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通电要求南京国民政府，立即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立即动员全国海陆空军，立即肃清汉奸卖国贼分子，准备应战。

中华民族联合抗战、同御外侮的神圣使命迫在眉睫。为此，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和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作了极大的努力。从 1937 年 2 月中旬到 9 月下旬，国共双方经 6 次谈判，蒋介石因急于要红军出征作战,终于 8 月 22 日正式发布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任命朱德为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叶剑英任参谋长。

9 月 22 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国共两党合作宣言。至此，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平型关大捷

1937 年 9 月 25 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伏击日本侵略军板垣师团的二十一旅团，歼灭敌人 1000 余人，击毁敌人汽车 100 多辆和马车 200 多辆，缴获战马 50 余匹，步枪 1000 余支，轻重机枪 20 余挺以及大量的弹药和其它军用物资，这就是闻名中外的平型关大捷。

这次战役是在全国抗战开始不久，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侵华日军长驱直入的情况下进行的。

1937 年 7 月底，平、津陷落以后，日军继续增兵，气焰十分嚣张。在华北，日军分四路发动进攻，到 8 月下旬，沿平绥线西犯和沿平汉线、津浦线南犯的日军已占领南口、张家口，保定、沧州即将陷落，整个华北危在旦夕。

八路军各师进抵山西之时，正值蒋介石、阎锡山的 20 万军队丢盔弃甲败逃之际。沿平绥线西犯的日军已于 9 月 13 日占领大同，打开了晋北的大门。紧接着，阳原、蔚县、涞源等县相继失守。蒋阎军队已退至平型关和雁门关一线。当时，日军十分骄横，其侵略矛头直指归绥、包头，企图一举拿下太原。为达此目的，日军又兵分两路，向晋北和晋东进犯，一路进攻雁门关，一路进攻平型关。因平型关地势险要，日军出动了精锐的部队板垣师团。

为打击日军的嚣张气焰，配合国民党部队守住平型关、雁门关及长城各口，稳定华北战局，八路军总指挥部命令一二〇师驰援雁门关，一一五师向平型关急进，伏击来犯之敌。

9 月 24 日，一一五师指战员，冒着倾盆大雨，开进指定地点，隐蔽待命。25 日清晨，敌板垣师团二十一旅团 4000 余人，大摇大摆地向平型关开来，好似一条长蛇，游进我军伏击圈。我军利用有利地形，向日军展开猛烈攻击。

日军坂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虽然陷入狭窄的包围圈，但他们武器精良，军事技术训练有素，个个顽固和凶残，战斗十分激烈。尤其在争夺东北方向的制高点老爷庙时，双方短兵相接，白刃肉搏，六八五团和六八六团的战士们打得非常英勇。有的连队一场战斗后只剩下 10 多人，有的战士带着浑身伤

痕，刺死了 10 多名日军后，拉响了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终因飞机、大炮等优势火力在肉搏战中不能充分发挥它们的威力，加上八路军战士的浴血奋战，1000 多名日军被歼灭，老爷庙下的战斗以我军的胜利而结束。

南京大屠杀

在江南战场上，日军占领上海后，便向南京进攻。11 月 20 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政府机关都搬到了武汉。蒋介石在其高级将领会议上，主张死守南京，并以唐生智为城防总司令，率 15 万军队留守。

12 月 1 日，东京大本营下令组成华中方面军（由上海派遣军和第十军编成），以陆军大将松井石根为总司令，下辖谷寿夫第六师团、中岛第十六师团、牛岛第十八师团、末松第一一四师团等四个师团。同日，大本营下达敕令：“ 华中方面军与海军协同，攻占敌国首都南京。 ”松井石根依恃其海空军的优势，兵分三路向南京进犯，突破长江下游的国民党防线，企图逼迫蒋介石订立“ 城下之盟 ”。

11 月 28 日，国民党军慌忙撤出第二道防线，至 12 月 5 日，南京已陷于敌人三面包围之中。12 日，雨花台失守，总司令唐生智丢下大批军队渡江北逃。蒋介石扬言死守六个月的南京，只守了六天就丢掉了。日军侵占南京后，在松井石根的直接唆使下，从 1937 年 12 月到 1938 年 2 月中旬，对中国人民进行了长达两个月的血腥屠杀。

12 月 12 日傍晚，谷寿夫师团首先攻陷中华门。第二天清晨，中岛、牛岛、末松三个师团相继侵入南京，都驻军城内。他们在各区游窜，见人就杀，见房乱烧。“ 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地污辱了这个城市 ”，“ 日军单独地或二三人为一个小集团在全市游荡，实行杀人、强奸、抢劫、放火 ”，“ 中国人像兔子似地被猎取着，只要看见哪一个人一动就枪杀 ”，开始，日军用机枪、步枪向手无寸铁的难民扫射，向难民投掷手榴弹。中山南路、中山北路、中央路，两边的街巷顿时血肉横飞，鲜血、尸体掩盖了路面。接着，在下关、中山码头等处，对难民、伤民用集体枪杀、焚烧和赶入江中淹死等多种残酷的方法进行大规模杀害。据掩埋尸体的红十字会会员说，1937 年 12 月 15 日 1 时，我国已放下武器的军警人员 3000 余名，被集体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密集扫射，全部饮弹殒命；12 月 16 日下午 6 时，聚集在华侨招待所的 5000 余难民，被日军送到中山码头，双手反绑，排列成行，用机枪扫射后弃尸江中。18 日夜，日军将被俘军民 57000 余人，全部用铁丝两个一捆扎住，排成四行，驱赶到下关草鞋峡，用机枪扫射，一些倒在血泊中尚能呻吟挣扎者，被乱刀砍戮，然后浇上煤油焚烧，把残骨遗骸投入江中。日本空军对准驱入江中的难民扫射，尸体浮满江面，鲜血染红了江水。

日军对南京居民不分昼夜地滥杀，花样之多，死状之惨，是历史上罕见的。他们实行“ 清街运动 ”，环城屠杀、活埋、火烧、水淹无不用其极，仅紫金山下，一次就活埋了 3000 人。在日军司令部的纵容下，一些日军以砍头、劈脑、浇镪水、切腹挖心、挖眼割鼻取乐，他们甚至剖开孕妇腹部、挑出胎儿作“ 玩具 ”。日军官竟以此为“ 娱乐 ”、“ 鼓舞士气 ”，举行“ 杀人竞赛 ”。日本大阪的《每日新闻》和日本英文报纸《日本广宣报》连续刊登了日本军官在南京展开杀人“ 锦标赛 ”的消息，以炫耀“ 武功 ”和“ 膺惩支那 ”的“ 光荣 ”举动。在一个月内，南京约有 30 万人被杀害，全市三分之一的房屋被烧毁，使城内尸骨纵横，瓦砾成山。

丧心病狂的日本兵在任意大屠杀的同时，还对中国妇女肆意奸淫，日本大使馆门口、公墓里、大街上成了他们发泄兽欲的场所。遇到妇女，上至 60 岁的老人，下至八九岁的幼女，无一放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 在占领后的第一个月中，在南京市内发生了 2 万左右的强奸事件。 ”

日军在南京疯狂的烧、杀、抢、掠、奸，使昔日繁华的中国首都，变成了一座死城，一片废墟，一个堆尸场。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创造了现代史上最残暴的纪录。在远东军事法庭审理此案时，甚至纳粹德国的驻华使馆也不得不供认：“ 犯罪的不是这个日本人，或那个日本人，而是整个的日本皇军。……它是一副正在开动的野兽机器。 ”

日本军国主义妄图用这种极端野蛮、极端残酷的屠杀政策来征服中国，动摇中国人民的抗日信心。但是，具有优良御侮传统和民族气节的中华民族是吓不倒的，日军的暴行只能激起中国人民更加同仇敌忾、抗战到底的决心。

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花了三周时间，对“ 南京大屠杀 ”一案进行审理，清算了日军的罪行。1948 年 12 月 23 日黎明，松井与其它六名战犯一同被绞死。另一名刽子手谷寿夫也被引渡给中国政府，在南京雨花台执行枪决。

台儿庄战役

1938 年 3 月 10 日，刚刚在山东省汤头镇驻扎了 5 天的日本侵略军，开了 20 多辆战车，60 辆装甲车，10 多架飞机，载了 30 多门大炮，气焰嚣张、不可一世地向西南方向的鲁南重镇临沂发动进攻。

这支侵略军是北线日军左翼板垣征四郎率领的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长坂本顺的队伍。这八九千步兵加上四五百名骑兵是来完成夺取临沂的使命的。他们企图夺得临沂后，再往南占领台儿庄，与第十师团会合，然后夺得徐州，进逼国民党临时政府所在地武汉。

此时的形势十分严峻。三个月前，也就是 1937 年的 11 月 12 日，历时三个月的淞沪战役刚刚结束。蒋介石在那次战役中自兼第三战区司令官，调动了 70 多个师，70 万人的兵力，与日本的 12 个师团，海空军、特种兵部队 30 万人进行了旷日持久的阵地战。战斗极为激烈，双方伤亡都很惨重。武器装备明显落后的我爱国官兵的牺牲精神令人感叹不已。李宗仁回忆说：“ 淞沪之战，简直是以我们的血肉之躯来填入敌人的火海。每小时的死伤辄以千计，牺牲的壮烈，在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历史上，鲜有前例。 ”

由于蒋介石指挥不当，策略失误，上海沦陷了。

接踵而来的是 12 月 13 日南京失守，震惊中外的日本军队在南京的疯狂大屠杀，30 多万中国军民被虐杀。日本侵略军强奸、抢劫、纵火、刀劈、枪刺，无恶不作，手段之残忍骇人听闻，就是日本法西斯的盟友希特勒德国的外交官也因此把日军称作是一个“ 兽类的集团 ”。

南京的国民政府移到重庆，国民党中央和军事委员会移到了武汉。

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试图与北线日军中路部队矶谷廉介第十帅团在台儿庄会合，由左侧迂回包围徐州，进而占领武汉，以最终达到胁迫中国政府屈膝投降的目的。

然而，中国人民怎么会束手待毙？国民党第五战区的张自忠率领第五十九军会同临沂守军庞炳勋率领的第三军团第四十军等部队，3 月 17 日到 20 日，与敌人在汤头镇周围展开了生死之战，双方伤亡均多达 3000 多人。3 天后，敌人灰溜溜地装了 100 多辆车的尸体，并留下就地掩埋的七八百具遗骸，退到汤头镇北的莒县。日本侵略军在 23 日占领了临沂，再没有直接由临沂南

下，削弱了侵占台儿庄的力量。

台儿庄战斗双方投入大量兵力，我方参战的是司令长官李宗仁率领的国民党第五战区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池峰城的三十一师、黄樵松的第二十七师和汤恩伯的第二十集团军、孙桐萱的第三集团军等 20 多个师共约 12 万兵力，日本侵略军参战的是第二军矶谷廉介的第十师团濑谷启第三十三旅团和第一军第五师团的坂本旅团主力等两个师团约 3 万兵力，双方在台儿庄展开了一场为时两个月的拉锯战。

台儿庄位于徐州东北仅 30 公里，小小的城镇，战略位置却十分重要。3 月 23 日开始，日军向台儿庄发起进攻，27 日占领了镇子的东北角，4000 多名敌人仗着飞机和 20 多门大炮 20 多辆战车，几乎把台儿庄的车站和煤厂炸成废墟。我们的守军与敌人争夺每一寸土地。双方多次发生肉搏，血战了几天几夜，28 日台儿庄的西北角又被日军突破。第二天日军占领了镇子的东北部。

形势似乎在急转直下，在台儿庄前线亲自督师的李宗仁，根据当时双方力量的布局作了新的部署，一方面由池峰城的三十一师和黄樵松的二十七师坚守镇子，在正面牵制敌人。同时，派出敢死队几次夜袭敌阵，有效地牵制了敌人的力量。另一方面，由汤恩伯的第二十集团军在外线由东向西猛攻，而孙桐萱的第三集团军则在北侧向南大举反攻，经过激战，终于在 4 月 6 日和 7 日，分别把濑谷部队和坂本支队赶出了台儿庄。

台儿庄战斗，我国军民战斗得英勇顽强。为了夺回一座房子，守住一条小巷，不惜牺牲数十人，甚至一个连、一个营。有的街面上手榴弹的碎片竟达十厘米之厚。中国军队歼敌 1 万 1 千多人，自己伤亡 1 万 9 千多人。

台儿庄战斗，中国军队的战略方针正确。整个战斗是阵地战与运动战结合，并且还有临沂一战和台儿庄西北方向滕县一战的成功配合。津浦路南段的守军又挡住了南线日军北上，粉碎了日军南北夹击的美梦。

台儿庄战斗，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骄横气焰，使他不敢再轻视中国军民，它告诉世界人民，中国人民的必胜信念和战斗意志是任何暴力都无法摧毁的。

在日本侵略中国期间，武装先进的日军飞机的空袭是疯狂的，相比之下，中国军队武器落后并且缺少训练。一味凭着部队的主力去硬拼硬杀，不注意保存实力，没有全面游击战争的配合，我方会有许多无谓的牺牲。再加上国民党军队派系之间的矛盾，某些指挥官不该有的戒备心理，往往导致中国军队在一个个的大战役中失利。台儿庄战役虽然取胜了，却没能使以后的徐州会战取得更有效的成果。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在 1938 年 2 月下旬的一天，性能落后的中国空军在台湾的台北上空，击落过四架日机。同年 5 月 19 日，中国一架大型单翼飞机飞临日本上空散发了许多传单。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代表董必武、边章五和李涛前往空军司令部向他们表示慰问并赠送了题写着‘德威并用，智勇双全”和“气吞三岛威震九州”两面奖旗，作为“我空军初次远征日本纪念”。

然而，无论如何，1938 年，对中国军民来说，是灾难深重的一年，历史的脚步走到这里显得格外沉重。

汪精卫卖国求荣

1938 年 12 月 18 日，在重庆珊瑚坝机场一群人面色阴沉地簇拥着汪精

卫、陈璧君夫妇，登上了飞往昆明的飞机。从此，汪精卫沦为一个不齿于国人的千古罪人。

汪精卫（1883 年—1944 年），浙江山阴人。曾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又参与过成立广州国民政府。1932 年 1 月，他出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1921 年他曾经支持孙中山联共改组，负责笔录了孙中山口述的《国事遗嘱》，但是在“九·一八”事变后，他开始向日本侵略军妥协，竭力主张对内“全力剿共”，对外“中日提携”。

1936 年 7 月在国民党的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的妥协政策开始有些变化，而汪精卫却越来越明显地走上了叛国的汉奸之路。

1937 年 2 月，汪精卫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提交了一个坚持“剿共”方针的政治决议草案。这一年芦沟桥事变，抗战爆发，汪精卫却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周佛海，及历任国民党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院教授、江宁县县长等职的梅思平等几个汉奸，组织了所谓“低调俱乐部”，宣扬“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亡国论调。

1938 年 3 月，汉口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为了避免汪精卫策划谋反，给他封了国民党中央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等官位。

但是，封官加爵无法改变汉奸卖国贼的奴颜媚骨。汪精卫在企图说服蒋介石卖国议和失败之后，私自派代表与日本政府秘密来往并且策划叛逃。

1938 年 11 月 20 日，梅思平与高宗武秘密潜入上海，同日本人举行了一个“重光堂会议”，私自签订了卖国投降书——《日华协议记录》。《记录》里规定了共同防共、中国承认满洲国和日本人在华居住营业自由等原则。这些败类的多次密谋，为汪精卫叛逃和自立朝廷作出了具体的安排。

12 月 18 日，汪精卫乘蒋介石召集年轻中央委员训话之际，借去昆明讲演为由，正式逃离重庆。

汪精卫等人飞到昆明的当晚，与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谈话，要挟他为他租一架飞机。第二天，以汪精卫为首的 10 多人，正式走上了卖国之路。他们通过越南河内，转辗香港。12 月 29 日，汪精卫由香港新闻媒介《南华日报》公开发表他发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和蒋介石的电报，要蒋介石“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1940 年 3 月 30 日，汪精卫集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日本政府一手操纵下，到南京成立了一个伪国民政府，自任主席。

自从 1938 年 10 月以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武汉、广州，他们对中国军队的“以撤退代替进攻”的策略十分头疼。战区拉得越长，日军战斗力就越差，带给他们的困扰也越多。他们开始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新花招。为了便于统治中国，便打着“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旗号，高唱“和平”的新调，竭力寻找代理人，扶植伪政权，达到“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卑鄙目的。

汪精卫部开始活跃起来，他响应日本侵略者的召唤，展开了一系列害国害民出卖主权、卖国求荣的汉奸活动。1939 年 5 月 31 日，汪精卫带领周佛海、高宗武和梅思平等人亲赴日本表示投诚诚意。6 月 6 日，他们的日本主子议决了“以汪精卫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8 月 28 日，汪精卫经过一阵拉党结派后，在上海“七十六号”特工总部礼堂匆匆召开了一天的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反共降日的决议，确定了具体的卖国政策。

这一年的 12 月 30 日，汪精卫又急急地与日本政府签订了卖国条约，这就是臭名昭著的日汪密约。条约规定：汪精卫承认满洲国，确定华北、华东、

华南某些地区由日军长期占领，伪政府各部由日本人监督，伪政府财经交通等实业由日本控制，甚至一切资源都由日本任意开发，禁止一切抗日活动。日本政府唯一要做的只是支持汪精卫为首的伪政权即可。

伪政权建立前后，汪精卫死心塌地地为日本侵华卖命。上海的“七十六号”，是汪伪政权的特工总部。阴森森的一幢楼里，汉奸政客特务人影憧憧。在这里，暗杀、绑架、栽赃、摧残各界抗日分子，无所不为，无恶不作，是活生生的一座人间地狱。1941 年春，汪伪政权积极配合日军在敌后根据地搞“清乡”，迫使当地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

汪精卫集团的卖国行为，激起了华夏子孙的无比愤慨。蒋介石迫于全国一片讨汪浪潮和给予制裁的强烈要求，在 1939 年元旦，召开国民党中央紧急会议，宣布决定将汪精卫“永远开除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3 月 20 日，国民党军统特务潜入汪精卫藏身的河内西北三岛旅馆准备一枪结果了这个叛贼的狗命。不料事不凑巧，他的机要秘书曾仲鸣夫妇却当了他的替死鬼。

这一下，汪精卫吃惊不小，不敢再在河内滞留，4 月 25 日，他乘坐小船逃出越南，5 月 6 日到达上海，将自己置于日本宪兵的严密警戒之中。

从汪精卫的叛国行为公开到 1944 年 11 月在日本病死，时间并不算很长，但他的卖国求荣的无耻行径却遭到善良、正直的中国人民的一致唾骂，汪精卫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同室操戈相煎急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走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呵！给你自由！
我渴望着自由，但也深深知道
人的躯体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期待着，那一天
地下的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和热血中
得到永生。”

这是新四军军长叶挺被国民党扣押在狱中时写的一首《囚歌》，时值 1942 年 11 月 21 日。诗中痛斥敌人的无耻和残忍，卑鄙和凶恶，充分表现了一位共产党人崇高的人格，坚贞的气节。其心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叶挺是在 1941 年 1 月 13 日前往第三十二集团军总部与总司令上官云相谈判时被扣押的。叶挺所率领的新四军，前身是红军的主力，长征后留在长江南北的江西、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浙江和安徽等 8 个省 13 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他们出色地在中国南方坚持了 3 年的游击战争。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后，1937 年 10 月，中共中央与国民党达成协议，统一整编军队，这部分革命力量被整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新四军以叶挺为军长，项英为政治委员兼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政治部副主任。这以后的两年里，遵照中共中央“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在反击日本侵略军的大“扫荡”中，取得了多次战斗的胜利，歼灭敌人无数，并缴获了许多战利品。

但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虽然在对待共产党的关系上，与汪

精卫的坚持反共有所不同，西安事变后，也提出了一些与中国共产党的要求相接近的政策，但是他们的反共立场却从未放弃过。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前夕，也就是 1937 年 2 月 10 日，中共中央致电会议，诚心希望两党合作，但在 11 天后的会议上，国民党却通过了《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决议案中对中国共产党的诬蔑、中伤和歪曲随处可见，只是迫于当时国内外形势，在政策上有所转变，才初步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1939 年 1 月 21 日。武汉、广州已经失守，日本帝国主义停止了对中国正面战场的进攻，对国民党、蒋介石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的侵略方针，把军事打击的重点转移到解放区，把注意力集中到积极反共上来。国民党当局对日妥协、积极反共的倾向也日益明显。在 21 日到 30 日重庆召开的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上,国民党制定了在抗战上只是发动有限度的攻势和反击的《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通过了《整理党务》的决议案。

决议根据蒋介石的讲话，决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并详细研究如何与共产党作“积极斗争”的方法。会后还散发了《异党问题处理办法》、《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反共秘密文件。

1939 年 6 月至 1940 年 3 月，国民党进犯新四军、八路军驻处和防地，杀害无辜的战士、伤员和家属数百人，并骚扰陕甘宁边区，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毛泽东严正表明共产党的态度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第一次反共浪潮在八路军的胜利反击并主动与国民党谈判达成休战协议中被击退。

然而蒋介石的“溶共、反共”之心日趋急切。国际上，由于法西斯力量越来越猖獗，美、英、苏在财政、军火上加强了对中国的增援，有利于抗日的各种因素开始出现。国民党却因此加紧了防共、反共的活动。

从 1940 年 7 月起，国民党除了限制八路军、新四军防地外，还克扣新四军的军饷和武器。10 月 19 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的名义，命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限期撤到黄河以北。

1941 年 1 月 4 日晚上，中国共产党在揭露国民党新的反共阴谋的同时，在坚持抗战作些让步的思想指导下，决定皖南的新四军由叶挺率领，离开他们的驻地泾县的云岭村启程北移。

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北风凛冽，寒雨彻骨，路途泥泞，战士们行军艰难，行程有所延宕。

早在一个多月前，蒋介石已经处心积虑地想利用这次安排的北撤和缩编，伺机消灭新四军。他几次密令部署围攻之事。1 月 6 日，新四军 9000 余人途经茂林准备稍事休息，早已埋伏在此的国民党 7 个师、8 万多人的兵力对他们加以拦击。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下达“活捉叶挺奖十万元，活捉项英、袁国平各奖 5 万元”的手令。

经过 8 昼夜的激战，新四军虽英勇顽强，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损失极为惨重：3000 多人壮烈牺牲，4000 多人被俘，突围者仅 2000 余人。叶挺被扣押，项英被叛徒杀害，袁国平身负重伤而殉难。

这就是国民党发动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这也是抗战以来他们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叶挺被捕后，先后被囚在江西上饶、湖北恩施、广西桂林和四川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集中营。

皖南事变后的 1 月 17 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撤销

新四军番号，并发出把叶挺军长革职交军法审判的命令。消息传出，中共中央在 1 月 18 日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揭露了反动派的阴谋。国民党左派宋庆龄等联合致电蒋介石，制止内战祸国行为。中外各界爱国人士和侨团纷纷致电，抗议蒋介石的罪行。周恩来连夜写下“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悼词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挽词，挽词登载在《新华日报》上，引起广大爱国人士的共鸣。

1 月 23 日，中共中央果断地任命了新编新四军将领。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并将原来的 4 个师扩充到 8 个师。

第二次反共高潮以蒋介石丧失人心而告终，国共合作维持下来了，抗日战争得以继续进行。

叶挺（1896 年—1946 年），广东惠阳县人。保定军官学校六期毕业生。1922 年任孙中山卫队团营长。1924 年加入共产党。1925 年任国民党第四军参谋处长，北伐时任独立团团长，升任为第二十四师师长兼武汉卫戍司令。1927 年 8 月 1 日举行南昌起义任十一军军长，任同年 12 月广州起义的总指挥，皖南事变前任新四军军长。抗战胜利后出狱，一出狱即致电中共中央请求恢复党籍，三天后被批准。一个月后（4 月 8 日），在返延安途中，不幸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因飞机失事而遇难。

百团大战

1938 年 10 月，武汉、广州相继失守，日寇为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正扬言要进攻昆明、重庆、西安，逼蒋介石投降，迅速结束侵华战争。同时，在日军占领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武装所开辟的抗日根据地日益强大，给了敌人沉重的打击，极大地牵制了日军的进攻步骤，为此，日军为了弥补兵力不足，开始实行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诱降，同时，日伪军不断地向敌后抗日根据地大搞“囚笼政策”，进行蚕食。1938 年 12 月 2 日，日本参谋总长载仁奉日本天皇敕令给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和第二十一军司令官下达命令，确定侵华日军以主要兵力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确保占领区，促使其安全，以坚强的长期转攻的阵势，努力扑灭抗日的残余势力。”并且具体规定确保重要地点的治安和主要交通线。

日军为了达到他们的目的，采用了所谓的“囚笼政策”，进而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他们利用占领了的城市，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加上密密麻麻的封锁沟和封锁墙构成网状，对解放区军民进行压缩包围，然后玩弄分进合击、铁壁合围、梳篦拉网、捕捉奇袭、反转电击和辗转抉剔等手段，企图削弱和消灭敌后抗日武装力量，甚至实行极其野蛮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

我敌后抗战军民为了影响全国战局，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争取使根据地联成一体，决定发动百团大战，这次战役的计划由朱德、彭德怀、左权三人签发，共有 104 个团参加战斗。

百团大战从 1940 年 8 月 20 日至 12 月 5 日，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 8 月 20 日至 9 月 10 日，中心任务是交通总破袭，重点则是正太路。由于进攻的突然和八路军的英勇作战，战役一开始就取得了重大胜利，正太线沿线路轨、车站、桥梁、涵洞、水塔等全部破坏，敌伪重要据点如娘子关、阳泉、定县、高碑店等都被攻克。华北敌人燃料重要基地井陉煤矿遭受严重破

坏。同蒲、平汉等铁路被切断，几条主要公路也被破坏，使华北主要交通陷于瘫痪。八路军并在阳泉西南狮脑山战斗中，重创敌军；在榆社西北双峰战斗中，基本上歼灭了敌三十六师团永野大队。

第二阶段从 9 月 20 日至 10 月初，中心任务是扩大第一阶段战果，继续破袭交通线，重点是消灭交通线两侧和深入我根据地之敌伪据点。全歼守敌两个中队，毙伤援敌 2000 余人。

第三阶段从 10 月 6 日至 12 月 5 日，中心任务是反“扫荡”。由于八路军对敌伪的沉重打击，敌寇为扭转局势，抽调了 3 万多兵力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报复扫荡，我军民不畏强敌，英勇顽强，毙伤敌伪 8000 余人。

一时间，正太铁路全线和同浦铁路部分地段，手榴弹、手雷、爆破筒声声如雷，一度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军陷入了我军勇猛的围袭之中。人民战争的威力坚不可摧，在八路军总部，副总指挥彭德怀面对着频频传来的捷报，兴奋得不能自已。

战斗结束，经历大小战事 1824 次，毙伤日伪军 25790 人，俘虏日军 281 人，俘获伪军 18407 人，缴获枪支 5800 多支，炮 53 门，破坏铁路 470 公里、公路 1500 公里，破坏桥梁、车站、隧道 260 多处。正太铁路中断了一个月。

这场规模庞大的破袭战，打得很坚决。正如一二九师提出的口号所说：“对敌人不留一段铁轨、不留一根枕木、不留一个车站、不留一个碉堡、不留一座桥梁。”

这场轰轰烈烈的战斗，破坏了敌人进攻西安的计划，其来势之凶猛是敌人所未曾意料的。日本华北方面军的作战记录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此次袭击，完全出乎我军意料之外，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和巨款方能恢复”，“正太铁路破坏极为严重，规模之大无法形容。”

因为参与这次战斗的八路军有 104 团约 40 万人的兵力,彭德怀副总司令将这次破袭战命名为“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给了日本侵略军的“囚笼政策”和“扫荡作战”一个有力的回击，振奋了抗日军民的斗争意志，它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汇合成了推进抗战走向最后胜利的巨大力量。

中国远征军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加、澳、新等国相继对日宣战。已和日寇苦战四年多的中国政府，因种种外交上的原因，到这时才与美、英等国一道正式对日宣战。这标志着中国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集团的正式成员。

早在“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从它对华战争的总战略出发，在很短的时间内，相继封锁了除辽宁、青岛以外的全部中国海岸。中国的对外出口仅剩下抗战初期紧急打通的滇缅公路。大批美、英、苏等国及爱国华侨捐资的支援中国抗战的军用物资，由海上运到缅甸首都仰光，然后改用汽车通过滇缅公路运到昆明。滇缅公路实际上已成为中国抗战的输血大动脉。

日寇对这条抗战血脉动用大批空中力量轰炸封锁，妄图彻底绞断它。无奈缅甸在英国军队的控制下，加上中国军民坚韧不拔地浴血奋战，始终保持着滇缅公路的畅通。但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这条中国唯一的国际运输线面临着瘫痪的危险。珍珠港事件后，日军迅速攻占泰国，并涌入马来亚半岛，迫使英国节节败退。英国在东南亚的殖民地此时都处在日军攻击矛头的威胁下。英国要保住缅甸，必须依赖近邻的中国出兵。中国也想保住滇缅路的畅

通，不让自己的脖子被日军扼住，就得保证缅甸不落入敌手。于是中英双方在 1941 年 12 月下旬签订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根据协定，中国政府紧急调集第五军、第六军和第六十六军至滇西，组成中国远征军，准备入缅与英军共同防御。然而英军出于对自己殖民地的自私的防范心理，迟迟不让中国军队入缅。直到 1942 年 2 月，缅甸毛淡棉失守，仰光告急，英国人才着了慌，请求中国军队入缅。

中国远征军入缅，“盟军中缅印战区”成立，而这支联合军队从一开始就“各行其是”，英国将军、美国将军、中国司令都想做“老大”，这就不可避免地要犯“军令不一”的兵家大忌。

中国远征军一出国门，正值缅甸的英军兵败如山倒。2 月底，英军在缅甸仅有的两个步兵师中的第十七师，在仰光以南被日军歼灭。3 月 8 日，日军不费吹灰之力轻取仰光，缅甸门户大开，滇缅动脉的入口被堵塞。可以说，远征军入缅未放一枪，其全部作战意义已不存在，不战先败。但紧急开进缅甸的 10 万中国远征军依然忠实执行战区总司令部的统一部署，迎敌而上，集中兵力，击破正面敌人，进而协同英军，收复仰光，挽回败局。不想，中国远征军一次次的与日军的会战计划都演变成了帮助英军败兵撤退的“掩护战”。

3 月初，中国军队唯一的一支机械化部队五军二○○师急速赶到同古与英军协防，英军竟不待二○○师完成部署即仓皇而逃，“同古会战”变成了“同古保卫战”。二○○师孤军守同古。日军五十五师团在坦克、飞机、炮兵的配合下，猛攻同古。小小的同古被炸成了虚墟，日军连续几日的轮番进攻，丢下遍地尸体，却赶不走废墟中二○○师的一个士卒。二○○师师长戴安澜率先立下遗嘱：“如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以参谋长代之，参谋长战死，以某团团长代之。”全师将士自上而下，一并效法，决心与同古共存亡。25 日，日军五十五师团三个联队倾巢出动，三面围攻二○○师。26 日，日军切断二○○师的唯一退路，封死了包围圈。二○○师官兵与突进城来的日军展开短兵相接的搏杀，逐屋逐墙地争夺，双方伤亡惨重，日军终被赶出城外。但二○○师的浴血拼杀不能改变自己的可悲处境：本该配合作战的英军已逃得不知去向；已撤至中缅边境的美国空军志愿队也未如约前来接应；远征军主力因英缅方不能提供交通便利不能如期汇集；日军援兵五十六师团在仰光登陆。第五军军长杜聿明不顾美国将军反对，果断下令五军新二十二师迅速接应二○○师撤出同古。“同古会战”以二○○师付出重大牺牲、坚守阵地 12 天而告结束。

4 月初，盟军参谋团又制定了平纳满会战计划。这个计划可以说制定得圆满无缝。远征军第五军上下也磨拳擦掌，各就各位，按照部署布好了口袋，只等日军来钻。而英军此时又继续扮演“老爷”的角色，不但自己马不停蹄地撤退，还要中国远征军接替他们的防务，掩护他们逃跑。远征军不得不又一次充当给英军到处补漏的“保姆”。4 月 17 日，英缅军第一师及装甲旅共 7000 余人被日军包围在仁安羌，英军惊恐万状。远征军新入缅参加会战的六十六军新三十八师一个团星夜乘汽车赶赴仁安羌为英军解围，待他们以一个漂亮的歼灭战消灭了让英军陷入“重围”的日军后，发现这股日军不过一个大队，不足千人。经英国人这么一闹腾，“平纳满会战”又泡了汤。

让中国远征军陷入最后绝境的是“曼德勒会战”。在平纳满摆脱敌人包围圈的远征军主力退守曼德勒东北后，战区盟军统帅部决定：在曼德勒地区

集中中国方面 3 个军，英国方面 5 个师，共计 20 万人的优势兵力与日军会战。然而计划刚制定，吵闹就开始，美、英、中三方将领各执己见：美方主张将兵力部署在 300 公里长的公路沿线上；中方认为此部署犯兵力分散之大忌；英方则要远征军三个师西调，充当英军的后卫。在这吵闹中，日军五十六师团组成快速纵队，日行 120 公里，奔袭腊戍。腊戍是滇缅公路的中转站，囤积着大批待运中国的军火。腊戍又是十万中国远征军的归国之途，失了腊戍，便无退路。曼德勒会战随即变成了保腊戍，保退路之战。无奈日军大踏步向前，势如破竹。被迫西调去给英军作后卫的远征军主力急忙调头东进，已延误三天时间，日军已连过数关，于 4 月 27 日逼近腊戍。驻腊戍的远征军参谋团仓皇逃离。28 日防守腊戍的第六军军长甘丽初逃到国宾畹町。第六十六军也一溃千里逃入云南保山以内。远征军第五军及几个主力师兵陷绝境。

4 月 29 日，驻缅盟军三方指挥官举行最后一次联席会议，确定在敌人三面包围的形势下，盟军退到印度去。但在缅甸战场丢尽了脸的英国将军却在此时提出要中国士兵自报“难民”身份，入印“避难”。杜聿明将军当即愤而退场，他要带着远征军翻越野人山，回到祖国去，绝不去印度仰英国人鼻息。

5 月，杜聿明率远征军主力分四路退进野人山，演成了罕见的最为惨烈的大撤退。除六十六军新三十八师照史迪威将军命令转头向西入印度外，其余各部均在野人山里与饥饿、洪水、疾病、虫害为伍两个余月，陷入前进不能、后退不得的死亡地带。一路上，远征军官兵死亡累累，尸骨遍野，惨绝人寰。在野人山上被饥饿、蚊虫、热带疾病夺去生命的远征军官兵竟比在战场上阵亡的人数多出数倍。在昆仑关大捷、同古保卫战、及整个缅甸战场上让日军胆寒的抗日名将戴安澜，没有战死沙场，却在这吃人的热带森林里，伤口恶化，不治身亡。他的遗体随部队回到祖国，几经辗转，最后运到他的家乡全州安葬。国民政府在全州举行了包括全国各地代表在内的一万多人的追悼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送去了亲题的挽诗；周恩来在挽词上称戴安澜为“黄埔之英，民族之雄”。美国总统罗斯福授予戴安澜以军团功勋章，以表彰他在缅甸战役中的功绩。远征军部队被野人山夺去数万将士后，所余四万余人，一部分终于踏上祖国国土，一部分在森林中辗转两月，最后由先期入印的中国军队接应改道入印。至此，第一次缅甸战役以盟军全面失败告终。

1944 年，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均转入反攻态势。中缅印战区的盟军部队也开始进入反攻作战。退到印度去的中国远征军，在印度蓝姆伽由美军重新武装，整编为新一军和新六军，整训一年多后，面貌一新，重新投入缅甸战场后，其实力远远超出日军。在七个月的边打仗边修路的作战中，不仅修通了滇缅公路的分枝线——中印公路，而且屡屡以少胜多，重创日军，使日军官兵无法相信这就是两年前败退野人山的“草鞋兵”。1944 年 5 月，中国驻印军经过苦战终于兵临缅北重镇密支那城下，并偷袭拿下城外机场。17 日，美军航空兵利用这个机场，进行了两天的大规模空运，将中国驻印军的两个师和美军特遣支队空降至密支那城外。密支那一万余日军被围得水泄不通。围困两个月后，8 月初，中美联军发起总攻，日军守城司令切腹自杀，密支那被攻克。10 月，中国驻印军分两路向南推进，新一军和新六军似一把大钳，剪向中缅边境重镇、滇缅公路和中印公路的枢纽——南坎。

与此同时，退到滇西怒江一线驻防的中国远征军一部，加上紧急调集的

三个军，组成了“中国远征军 Y 军”（中国驻印军此时被命为“中国远征军 X 军”）。以二十万之众发起了怒江作战。5 月 11 日，中国远征军 Y 军二十集团军强渡怒江，站稳脚根后，作为攻击右翼，直扑滇西重镇腾冲。第十一集团军在随后渡过怒江，作为左翼沿滇缅路攻击前进。左翼集团碰上了日军重点防御的硬钉子——松山。6 月，松山战役打响，这场异常惨烈的攻防战，一直打了两个多月。远征军士兵以泣鬼神的牺牲精神，用自己的血肉之驱拔除日军一个又一个明碉暗堡，将这道被日军称为连麻雀也飞不过的“路障”扫除。在远征军 Y 军的前进道路上，每一处日军据点都是极难啃的“硬骨头”。6 月中旬，二十集团军攻击腾冲。历时三个月的苦战，万余守敌，仅十几人投降，其余全部战死或自杀身亡。同是 6 月，第七十一军和第二军开始攻打龙陵，鏖战三个多月，几经反复，伤亡两万余，毙敌万余，收复龙陵。11 月 20 日，远征军收复芒市。 1945 年 1 月 20 日，中缅边境重镇畹町被攻克。

此时，中国驻印军（X 军）已攻克八莫，并在远征军 Y 军攻克畹町的同时，占领了中缅边境缅方一侧的重镇南坎。两支远征军之间只隔着日军最后一个据点——芒友。 1 月 21 日，两支远征军东西会攻芒友，27 日芒友被攻破，中国远征军 XY 两军胜利会师，中印公路全线通车。在随后的两月中，中国远征军一路猛进，扫清了缅北各据点的日军，胜利结束了第二次缅甸战役。中国远征军在中缅战场作战四年，歼灭日军 16 万余人，为中国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抗战胜利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和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息息相关。1941 年 6 月 22 日，法西斯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发动侵苏战争，苏联的卫国战争开始。同年 12 月 7 日，日军偷袭美军在太平洋的军事基地珍珠港，8 日，美英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扩大了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人民的反日斗争结合起来了。1942 年 1 月，中、苏、美、英等 26 国在华盛顿签署《联合国家共同宣言》：宣布共同对抗德、日、意法西斯轴心国，至此，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正式结成，共同对付 1936 年 10 月、11 月结成的德、意、日国际法西斯集团。

随着战争的发展，1943 年 2 月 2 日，苏联红军取得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辉煌胜利，共毙俘德军 32 万余人，并挫败了德军在库尔斯克地区的反扑，8 月间，苏联红军开始了战略总反攻。

1942 年 10 月，英军也对侵入利比亚、北非的德意军队展开反攻。11 月，英美联军在北非登陆，1943 年 5 月，北非德意联军被迫投降。

1943 年 7 月，美英联军登陆西西里岛，9 月初，攻入意大利半岛，9 月 3 日，意大利巴多里奥政府与美英签署了停战协定，并于 10 月 13 日对德宣战。

同时，在德意占领下的法、比、荷、波等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也日益高涨。

1943 年是欧洲法西斯集团开始瓦解的一年。

在远东战场，日本法西斯也遭到了重创。1942 年 5 月，日军在大举进攻中途岛的战役中被美军击败，损失了 4 艘航空母舰和 250 余架飞机，此次战役，日军由攻势转为守势，此役成了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

1944 年春，日本为了挽救其军事上的不利态势，集中侵华兵力，又向中国战场发动了一场战略性进攻，这就是豫湘桂战役，此役日军虽然打通了中国大陆交通线，但未能挽救其迅速恶化的总态势。

1944 年春至 1945 年夏，我抗战军民乘日军抽调大量军力于太平洋战场和实施打通大陆交通线之际，向日军展开了局部反攻，在山东解放区、晋察冀解放区、晋冀鲁豫解放区、晋绥解放区等地不断出击，歼灭了大量敌军，收复了大片国土，据不完全统计，各解放区在 1944 年中，共对日寇作战 11300 余次，毙俘了近 20 万名敌伪军，攻克县城 47 座，收复了 80000 多平方公里的领土。1945 年，在中国共产党关于“削弱敌寇，发展我军，缩小沦陷区，扩大解放区”的号召下，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迅速发展成全面大反攻的主要力量。

1945 年 5 月 2 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8 日德国法西斯投降。正在节节败退的日本法西斯陷于孤立境地。1945 年 6 月，美军攻占冲绳岛，将战争引向日本本土。7 月 26 日，中、美、英三国联合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遭日本法西斯拒绝，并摆开了“本土决战”的架式。8 月 6 日和 9 日，美军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了两枚原子弹，造成了日本统治集团的恐惧心理，对日本法西斯投降起了一定作用。

8 月 8 日，苏联对日宣战，9 日，苏联红军和太平洋舰队，向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的日军发动了进攻，日军驻东北的关东军约有近 70 万人和 1000 架飞机，在苏联红军的凌厉攻势下迅速瓦解，我东北抗日联军也积极出动，配合苏军的战斗。

8 月 9 日，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号召全国军民大反攻，10 日、11 日两天，延安总部的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大反攻的命令和其他六道命令，此后，我 19 个解放区内的人民武装都向日伪军占据的城镇和交通线发起了猛烈反攻。

在此情况下，8 月 14 日，日本政府照会中、苏、美、英四国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8 月 15 日，日本天皇向全世界广播了无条件投降的《停战诏书》，9 月 2 日，在东京湾的美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日本投降签字仪式。至此，历经八年之久的中国抗日战争取得了最后胜利。

八年抗战，中国人民蒙受了重大的牺牲和难以计数的财产损失，终于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这是近百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斗争中所取得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极大地增强了全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这场战争也极大地锻炼了中国人民，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同时，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巨大牺牲和历史贡献，永远让我们引以为荣。

重庆谈判

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迫使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按盟国规定，中国战区的受降范围是：中国本土（东北归苏军受降）、台湾、越南北纬十六度以北地区。日军投降的总兵力有 1283200 人。伪军投降的总兵力有 60 余万人。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为了重建在中国的独裁统治，企图垄断中国战区的受降权，不允许曾经对抗日战争作出重大贡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参加受降。可是，这时国民党的几十个美械化师团还远在滇西、缅北的崇山峻岭中，要到达前线接受日伪军投降一时难以办到。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抢夺抗战胜利成果，南京国民政府一方面命令与之合流了的日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另一方面则加紧抢占战略要地，以阻挠解放区

军队收复失地。在美国武装力量的直接援助下，广州、长沙、武汉、南昌、九江、安庆、南京、上海、杭州、徐州、郑州、洛阳、青岛、济南、北平、天津、山海关、承德、赤峰、多伦、古北口、张家口、归绥、包头、大同、太原、石家庄，共二十七处战略要地，除张家口、古北口两处外，都被国民党军所抢占。新的内战严重地威胁着全国人民。

而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残酷战争的浩劫，迫切要求有一个和平民主的环境，重建家园，因而强烈期望国共两党之间“化干戈为玉帛，变斗争为团结”，携手共建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力量经过八年艰苦抗战，得到了迅猛壮大，在全国建立了 19 个解放区政权，拥有 10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 亿人民，120 万军队和 220 万民兵。

解放区的强大，中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在战后的反战情绪，不能不使蒋介石有所顾忌。同时，蒋介石还需要时间，把美械装备的中央军从西南大后方运到前线去，部署兵力，抢占战略要地。于是接受了政学系的献计，于 1945 年 8 月 14 日、20 日、 23 日，十天之内三次电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家大计”。

国民党错误地估计毛泽东主席不会去重庆。他们想假戏真做，制造空气，以便更有文章好做。可是出乎蒋介石意料，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早就洞察了美蒋反对派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对于这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了认真研究和反复思考，最后决定，由周恩来等陪同，毛泽东主席亲自去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

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同时毛泽东答复蒋介石表示前往重庆谈判的电报，也经新华社发到了重庆。宣言提出六项紧急措施，以奠定和平建国的基础。这些措施是：①承认中共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以便立即实现和平，避免内战。②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并给予他们以参加处置日本的一切权力，以昭公允。③严惩汉奸，解散伪军。④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办理复员，救济难胞，减轻赋税，以解民困。⑤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妨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⑥立即召集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

8 月 28 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与赫尔利、张治中同机飞抵重庆。毛泽东到达重庆，受到各界人民的欢迎。

重庆谈判，始终是一场严重尖锐的政治斗争。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到达重庆后，周恩来等即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等人对谈判的问题和程序进行了磋商。蒋介石对谈判并无任何准备，连一个方案也提不出来，只是派了几个代表来应付，妄图使谈判得不出结果，并把毛泽东在重庆拖住。8 月 29 日，毛泽东就同蒋介石的代表开始了谈判。在会议中，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代表竟然提出了“没有内战”的谬论。毛泽东和中共代表驳斥了他们的欺人之谈，指出，抗战八年，内战是没有断的，要说没有内战，是不符合实际的。这就揭穿了国民党妄图在“没有内战”的烟幕下积极准备打内战的阴谋。接着，毛泽东两度与蒋介石会谈，阐明中共关于解决国内问题的一贯主张。

中国共产党对于会谈抱有真诚的希望。9 月 2 日，毛泽东对谈判提出了八项原则性意见；3 日，周恩来等又对谈判提出了十一项方案。这些意见、方案，与 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的宣言》的主张相比，作了较大的让步，如承认国民党的政权和蒋介石的领导地位，不再要求召开党派会议及成立联合政府等。但是，蒋介石并不满足，他的目的是把共产党吃掉。9 月 4 日，蒋介石将自拟的《对中共谈判要点》交与国民党谈判代表。9 月 8 日，张群根据这个要点，代表国民党交出一份对共产党 9 月 3 日十一项谈判方案的具体答复。国民党代表在强调军令、政令必须统一的幌子下，一再要共产党“放弃其地盘”，“交出其军队”，声称只有这样，共产党在“国家的地位与国民中的声誉，必更高于今日”。国民党代表张群说得更明确，问题的症结倒是在军队，“就承认党派合作、平等而论，如中共不以军队为一党私有，则各党派团结合作，也是容易实现的。政治亦然，倘不与军队牵连一起，亦极容易解决。”直到 10 月 9 日蒋介石在和毛泽东单独会谈时，仍然坚持要求“中共改变对国内政策方针，放弃军队和解放区”。

谈判桌上的斗争，是与战场上的斗争互相配合的。蒋介石的和平骗局在谈判桌上被揭穿了，于是就在会谈之外策划内战，以此向中共施加压力，捞取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在毛泽东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即 8 月 29 日，蒋介石就密令重新印发了所谓《剿匪手本》，在其军队中实施反共内战的动员，又密令国民党反动军队大举向解放区进犯。

9 月底，蒋介石指使山西的阎锡山军队，结合收编的敌伪军 13 个师共 7 万人左右，向晋东解放区上党地区进犯。同时以 3 个兵团冲向东面的河北平原。刘伯承、邓小平率领 5 万部队从太行山出发，沿路又增加 5 万多参军的农民，在一个星期的战争中，共歼灭阎锡山部 3 万 5 千余人，俘虏国民党军队的军长 1 名、师长 12 名。这就是著名的上党战役。

傅作义在张家口碰了钉子，阎锡山在上党惨遭失败。蒋介石便大调军队，使内战更加扩大。以十多万国民党军，加上伪军，沿平汉线向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邯郸大举进攻。解放区军民自卫还击，一举全歼国民党军 7 万余人。这就是邯郸战役。

国民党在“谈”和“打”两个方面都未能占“上风”，蒋介石面对全国反内战的呼吁，为了缓和国内人民的情绪，并争取时间作军事上的重新部署，乃于 10 月 10 日被迫与中共代表签定了《国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其要点是：建立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坚决避免内战；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保证人民的民主自由，党派平等合法，实现地方自治；确定召开民主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等。但是，在关于国民大会问题、军队国家化问题、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及停止武装冲突问题上，双方并没有达成协议，将继续会谈。

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中共通过这一斗争，用事实证明了和平的诚意，揭穿了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从而争取了国内外广大中间力量的同情和支持。

胡宗南进攻延安

国民党在重庆谈判的前前后后就作了两手准备：一边假和谈，一边真内战。但在谈判中，国民党没能达到任何目的。在战场上，国民党军队虽然有美军支援，但也没能讨到什么便宜。总计自 1946 年 7 月至 1947 年 2 月，8 个月来国民党军共侵占解放区大小城镇 105 座,但其兵力却被歼灭了 70 余万

人。随着国民党占领区的扩大，战线拉长，其能够出击的机动力量大为减少，加上国统区内物价高涨，通货陷入恶性膨胀，国民党被迫放弃了全面进攻的方针，转为对陕北和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蒋介石又利用了黄河天险，要把他在 1938 年所决开的堤口堵塞，使黄河重入故道北流，流到解放区，使华北两支主要解放军陈毅所部和刘伯承所部之间，隔上一道水墙。他们认为刘伯承部被水所阻后，他们就可以抽调部队去进攻延安。

蒋介石在作了种种策划后，就把中共在南京、上海等地的代表逐出，命令胡宗南部进犯延安。

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为了实施对陕北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从 1947 年 2 月底开始，秘密调动在关中和晋南的嫡系部队，共 7 个整编师 20 个整编旅，向陕甘宁边区的洛川和宜川两地集结，准备从南线攻击延安。此外，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集团 4 个师 12 个旅，加上榆林邓宝珊集团 2 个旅，分别从西、北两线配合，驻西安的空军也协同作战。

3 月 14 日，胡宗南指挥所属部队，大举进犯陕北解放区。其右翼兵团整编第一军董钊部，由宜川经南泥湾、金盆湾向延安进击，并占领了延安西南地区。当时留在陕北解放区的西北野战部队只有 2 万多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直接指挥西北野战军转战陕北，实行诱敌深入的方针，在运动中寻机歼敌。19 日，国民党整编第一师第一旅首先侵占了中共中央和解放区军政领导机关所在地延安。

在战争中，占领对方首脑机关所在地，常常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国民党进攻延安，却什么也没有得到。

中国共产党疏散了延安的学校、医院、机关、居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的领导人在最后时刻撤离了延安，隐蔽在附近山中。彭德怀按中央军委制定的“蘑菇战术”，出色地组织了保卫陕甘宁边区的战斗。

胡宗南部在 3 月 19 日占领延安以后，人民解放军以小部分兵力诱敌主力进至安塞，而将主力部队隐蔽集结于延安东北的青化砭地区，待机歼敌。3 月 25 日，只用一个多小时，就将进入预伏圈内的国民党军三十一旅旅部和一个团全部歼灭，国民党旅长李纪云被活捉。

青化砭一战，国民党军发现西北野战军主力在延安东北地区，于是集中 2 个兵团 9 个旅，向延川、清涧“扫荡”，企图捕捉其主力而歼灭之，或逐其东渡黄河。西北野战军用一支兵力牵住国民党军鼻子走，主力却向相反方向潜伏待机。董钊兵、刘戡 2 个兵团 9 个旅在东北扑了空，又折向西，向瓦窑堡、永兵“扫荡”，再次扑空，此时，国民党军已被拖得人困马疲。4 月 14 日，其 135 旅由瓦窑堡向南行进至羊马河附近时，突遭西北野战军伏击，该旅旅部除少部分突围外，大部被歼灭。

羊马河战役后，国民党军事当局错误地判断西北野战军主力已“北窜”，并有东渡黄河的可能，遂令大部兵力跟踪追击。西北野战军利用国民党军的判断错误，以一部兵力伪装成主力，诱其北上，而集中主力秘密南下，突然包围国民党重要补给基地蟠龙。5 月 2 日发起攻击，4 月夜攻克蟠龙，守军第 167 旅及地方保守团约 7000 人遭伏击，大量物资被缴获。当国民党军回援时，西北野战军早已转移至安塞地区休整了。

胡宗南集团于 20 天内连续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次遭伏击，损失

了 1 万 4 千人，使国民党对陕北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受到严重挫折。

大决战

国民党撕下和谈的假面具以后，宣布“戡乱总动员”，向陕北和山东解放区大举进攻，但均遭重创。同时，东北及华北的军事局势也日渐危机，国民党上层人士忧心忡忡。

1947 年 6 月 30 日，国民党举行了中常会与中政会联席会议。蒋介石在会上作了《当前时局之检讨与本党重要之决策》的讲话，提出了“党团组织合并”与“戡乱总动员”两项政治决策。他指出目前已不宜再唱和谈高调，而应“采取全国总动员的方式，动员全国人力物力，以加强剿匪军事的力量”。他认为国民党目前组织混乱，特别是三青团“于党部之外，另立组织，另成系统”，必须“改革党务”，使“党团合并统一”，以适应全国总动员的需要。这两项决策的中心是以政治配合军事，体现了蒋介石“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剿共”策略。

然而这些都是蒋介石的如意算盘。经过一年作战，国民党军被大量歼灭，双方军事实力的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四个纵队，突破黄河天险，建立了大别山根据地；陈赓、谢富治兵团两个纵队和一个军分别由垣曲、洛海附近渡过黄河，向豫西进击，并建立豫、陕、鄂根据地；陈毅、栗裕率领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 8 个纵队突入鲁西南地区集结，并大量歼灭国民党军队。这三路南下的解放军，彻底突破了国民党军队的防御体系，同时，其他各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也转入反攻作战，使国民党军在战略上陷于被动。

为挽救国民党军队在各个战场上的劣境，从 1947 年底到 1948 年初，国民党军实行了分区防御的新战略，将整个军事战场分为南北两线。北线包括东北、华北两大区。南线包括大巴山以东、长江以北、黄河以南广大地区（华东、华中、西北），将这个地区划分为二十个绥靖区，每个绥靖区配置三至五个旅，分区围追堵截人民解放军。但是从 1947 年底至 1948 年夏，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发动更大的攻势，国民党军损兵折将，战略上陷入更大的被动。而与此同时，国民党在“行宪国大”上，围绕着总统和副总统的选举，导致蒋介石与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国民党陷入了政疲军殆、内忧外患的处境。而国统区内日益高涨的反蒋运动使国民党在政治上严重孤立。

在军事上，经过一年的“戡乱”作战，国民党军损失惨重，至 1948 年 6 月，计被人民解放军消灭正规军 92．5 个旅，93 万余人，总兵力已下降到 360 余万人，其中正规军 198 万人，能用于前线的仅有 170 余万人，被分割牵制在东北、华北、华东、中原和西北五个战场上。而人民解放军则已发展到 280 万人，已成为一支战斗力极强的军队。战局的变化和敌我力量的对比表明，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

决战分三个阶段进行：

1．辽沈大战。

在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冬季攻势的打击下，东北国民党军被迫收缩在沈阳、长春、锦州三个孤立地区，分别由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副总司令郑洞国、范汉杰指挥防守。

此时，中共东北野战军已拥有 12 个步兵纵队，1 个炮兵纵队和 17 个独立师，加上地方武装，总兵力达 100 万人，在数量上已占优势。他们在中共

中央军委的部署下，决定南下围歼卫立煌集团。

鉴于东北国民党军所处的绝境，蒋介石曾指示卫立煌以其在沈阳的主力部队打通沈锦路，撤至锦州。但卫立煌、廖耀湘等高级将领强烈反对，他们害怕国民党军一出沈阳，就会被歼灭在辽西走廊上，因此主张固守。

1948 年 9 月 12 日，林彪、罗荣桓率东北解放军发动攻击，首先奔袭北宁路，连克昌黎、滦县、兴城、绥中、义县，这一线的国民党军被分割在锦州、锦西和山海关三个地区，其中锦州守军六个半师被东北野战军严密包围。

锦州的被围，使东北国民党军面临全军覆灭的境地，蒋介石心急如焚，于 9 月 30 日率三军总司令以及高级幕僚飞抵北平，在华北“剿总”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调华北及山东的 7 个师由海路驰援辽西，汇同锦西、葫芦岛的 4 个师，组成东进兵团。10 月 2 日，蒋介石又飞抵沈阳，组成西进兵团，由廖耀湘指挥，火速援锦。蒋介石企图以东西对进来解锦州之围。但东进兵团受到解放军 8 个师的顽强阻击，西进兵团又被解放军的 3 个纵队钳制住。

10 月 14 日，东北野战军对锦州发动总攻，15 日，攻克锦州。范汉杰的 10 万余人全被歼灭。蒋介石赶紧派飞机到长春空投手令，命郑洞国火速率部向沈阳突围。但长春守军无心恋战，17 日曾泽生率 2 万 6 千余人起义，18 日新七军亦投诚；郑洞国被迫放下武器，长春遂告解放。

长春、锦州相继解放后，蒋介石为挽救败局，仍令侯镜如兵团与廖耀湘兵团继续对进，企图再占锦州；同时命令沈阳的第五十二军抢占营口，以使沈阳守军由海路撤退。但在解放军 8 个纵队的分割围歼下，这支由国民党主力新一军、新三军、新六军等为主的美式机械化兵团全军覆灭，兵团司令廖耀湘等多名高级将领被俘。

廖耀湘兵团被歼后，沈阳被东北野战军 3 个纵队又 5 个独立师包围。10 月 30 日，卫立煌逃离沈阳，沈阳守军已成惊弓之鸟。起义的起义，投诚的投诚。11 月 2 日，沈阳解放。

至此，辽沈战役结束。国民党东北“剿总”土崩瓦解，共计损失 4 个兵团、11 个军，共 36 个师约 47 万人，其中大部分是美械师，东北全部解放。

2．淮海战役

国民党军实行重点转移后，徐州“剿总”将其重兵集于徐州、郑州、济南三个战略要点，以保持津浦、平汉、陇海三条铁路。

1948 年 9 月 16 日至 24 日，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集中优势兵力，发动了济南战役，全歼王耀武部 10 万余人。10 月 20 日至 24 日，郑州、开封又先后被解放军攻克。蒋介石被迫收缩防御。这时，陈毅、栗裕率华东野战军 16 个纵队集结在徐州的北面和东面；刘伯承、邓小平率中原野战军集结在徐州西面，对徐州形成夹击之势。

开始，蒋介石对徐州的弃、守一直犹豫不决，直到 11 月初，才决定固守徐州，并调黄维第十二兵团进至太和、阜阳地区，相机东援。

11 月 5 日，国民党各部队由陇海路向徐州收缩。6 日，华东野战军对集结在陇海铁路东段新安镇一线的黄伯韬第七兵团 4 个军实施攻击，并迂回包抄。8 日，张克侠、何基沣率两个军在贾汪、台儿庄前线起义，使徐州大门洞开，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乘机插入，切断黄伯韬兵团退路，威胁徐州。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为保徐州，置黄伯韬兵团于不顾，这样，黄的先头部队 1 个师被歼，兵团司令部和 4 个军在碾庄地区被围；第 63 军也被歼。

黄伯韬兵团被围后，蒋介石立即调兵遣将支援黄伯韬。同时命令黄维兵

团由豫南经皖北兼程东进，支援徐州。

11 月 12 日，解放军对黄伯韬兵团发起总攻击。而援军却受到解放军的牵制。22 日，黄伯韬兵团在碾庄全线崩溃，所部 5 个军 12 万人悉数被歼，黄伯韬在突围时被击毙。徐州再次陷入孤立。

黄维兵团遵令北渡浍河向宿县进击，解放军采取中间退让，两翼包抄的战术，使黄维兵团突入其袋形阵地。蒋介石又命杜聿明率 3 个兵团侧击中原野战军以解黄维之围。12 月 4 日，杜聿明集团所部 3 个兵团又在青龙集、陈官庄地区受到华东野战军 11 个纵队的包围，救黄无望。蒋介石便命黄维自行突围，但黄维兵团粮弹俱缺，伤亡又重，部队不断向解放军投诚，已丧失了战斗力。15 日，黄维率部以东、西、北三面突围，所部被歼 12 万余人，黄维被俘。

杜聿明集团被困于陈官庄、青龙集后，给养发生困难，国民党军饥寒交迫，士无斗志。杜聿明决定翌年 1 月 10 日突围。但 1949 年 1 月 6 日，华东野战军发动总攻。10 日，杜聿明被俘，邱清泉被击毙，李弥逃脱，国民党 2 个兵团 20 万人被消灭。

整个淮海战役，国民党损失最精锐的机械化部队共 5 个兵团 22 个军，55.5 万人，另有两个兵团被击退。从此，国民党军已丧失大兵团作战能力，它的长江防线与京沪地区，全部暴露在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之下。

3．平津战役，北平和平解放

卫立煌集团在东北的覆灭，徐州国民党精锐部队在淮海被围，使华北傅作义集团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

但傅作义原想保存实力，经营西北，又错误地估计东北野战军刚进行过辽沈战役，至少需要三个月的休整才能入关作战。因此采取暂守平津，保持出海口的方针，将其所辖 4 个兵团 14 个军近 60 万人，收缩在以平津为中心，东起唐山，西至张家口的长达千余里的铁路线上。

东北野战军 80 万大军于 11 月下旬秘密南下，快速入关，向平、津、唐进逼，意在切断傅作义集团的海上退路；华北野战军为将傅作义嫡系部队吸引到西线，从 11 月 29 日起，以杨成武兵团对张家口实施包围。

张家口由傅作义嫡系孙兰峰第十一兵团四个师又两个骑兵旅防守。张家口外围据点被攻克后，傅作义急令其机动兵团第三十五军两个师、第一〇四军一个师由北平、怀来火速驰援，并企图歼灭华北野战军主力。但华北野战军杨得志兵团出现于涿鹿地区，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亦抵密云，北平暴露，傅作义又命第三十五军撤回北平，并命第一〇四军、第十六军向西接应。

12 月 6 日，第三十五军在空军支援下突围，但又于 8 日被杨得志兵团包围在新保安地区。接着，第十六军、第一〇四军主力也被歼。与此同时，东北野战军主力兼程南下，先后攻下唐山、汉沽、军粮城、杨村等城镇，至 21 日，北平、天津被东北野战军十二个纵队分割包围，傅作义集团孤守平、津、塘、新、张五个据点。

12 月 22 日，新保安遭受解放军强攻，第三十五军两个师一万六千余人被全歼。23 日，孙兰峰率第一〇五军等五个师及两个骑兵旅五万四千余人突出张家口向北逃窜，次日在张家口以北被歼，孙兰峰率少数骑兵逃往绥远。

1949 年 1 月 14 日，解放军对天津 13 万国民党军发动攻击，经过 29 个小时的激战，天津解放。

这样，北平城内几十万国民党军陷入欲逃不能，欲战无力的局面，傅作

义不得不考虑和平谈判。在兵临城下的情况下，傅作义终于接受了“离城改编”的条件，并签定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使北平这座历史文化名城避免了战火。1 月 21 日，傅作义召集华北“剿总”及军长以上人员会议，宣布北平和平解放，并将协议诸条公告全国。

1 月 31 日，傅作义所部 25 个师约 25 万人离开北平接受改编。2 月 3 日，人民解放军举行隆重的入城仪式，北平正式宣告和平解放。

平津战役以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 52 万余人的辉煌战绩而告结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三大战役以后，国民党军损兵折将，蒋介石“引退”以谢国人，李宗仁出面收拾国民党这个烂摊子，代任总统。李宗仁上台后，继续开展“和平”攻势，但其“就地停战”与“划江而治”遭到中共严厉拒绝。4 月 20 日谈判破裂。

在与中共谈判的同时，南京政府还企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挡人民解放军的攻势。蒋介石还企图利用和谈，在三到六个月时间内使国民党正规军扩充到 350 万至 500 万人。

1949 年 1 月 25 日，已经“引退”的蒋介石在溪口召见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共同策划长江布防。蒋介石决定把长江防线划分为两个战区，西线 15 个军约 25 万人由白崇禧指挥，东线 25 个军 45 万人由汤恩伯指挥。

针对南京政府的假和谈，真部署，人民解放军也积极准备渡江。4 月 20 日晚，国共和谈破裂。深夜，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强渡长江，国民党的东西防线全线崩溃。

解放军三路大军渡过长江后，解放了上海、南京。国民党政府迁往广州，内部四分五裂。蒋介石于 7 月 14 日由台北飞抵广州，16 日成立国民党非常委员会，自任主席，再次从幕后转到台前，公开指挥国民党残余力量以求最后一战。此时国民党虽仍拥兵 200 万人，但已成丧家之犬，不堪一击。人民解放军在华北、西北、东南、华南、西南及海南岛，痛击国民党军。

1949 年 9 月 21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协商，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会议选举以毛泽东为主席的 80 人组成的第一届政协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周恩来等 56 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9 月 30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闭幕。大会发表的宣言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10 月 1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举行首次会议，主席、副主席宣布就职。会议推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毛泽东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会议决定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施政方针。会议公告向全世界各国政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愿同任何外国政府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

同日下午，北京市各界群众 30 万人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开国大典。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着举行阅兵式，朱德总司令驱车检阅了部队，并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

于迅速肃清国民党残余军队，解放尚未解放的国土的命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中国 100 余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却不能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辛亥革命以来的 38 年，中华民国经历了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的统治，由于统治阶级投靠帝国主义，实行封建独裁专政，严重脱离人民，严重破坏和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把中国人民推入了贫穷、落后、受奴役、受欺凌的黑暗深渊。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走上独立、自由、和平、统一的道路，一个强盛的新中国在东方崛起。